



日本经济三十年史

专题史

从泡沫
到安倍
经济学

[日] 山家悠纪夫

著

王揆

译

負典編譯

UN-CANON

日本经济三十年史

从泡沫到安倍经济学

〔日〕山家悠纪夫 著

王揆 译

本书译自：山家悠纪夫《日本经济三十年史——从泡沫到安倍经济学》（「日本経済 30 年史——バブルからアベノミクスまで」，岩波新書（新赤版）1799，岩波書店，2019 年 10 月 30 日第 1 刷）。

本书由王揆翻译，負典編譯（translate@un-canon.com）整理；书中脚注均系译者所加，注末署“——译注”。

目 录

前言 / ix

第一部 1990 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概观

第一章 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有何变化 / 2

1 景气如何变动 / 2

始于景气下行局面的八十年代后半期 / 2

泡沫景气开始 (1986 年) / 3

“泡沫破裂”导致长期萧条 (1991 年) / 4

“改革”政策导致萧条到来 (1997 年) / 5

长期景气上行 (2002~2008 年) / 6

雷曼冲击引发景气下行 (2009 年) / 6

安倍经济学登场 (2013 年) / 7

景气的峰、谷与经济活动水平 / 8

2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8

1998 年以后, GDP 不再增长 / 9

实际增长率一度回升, 然而 / 10

连续两年负增长 (1998~1999 年) / 10

3 企业业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11

企业销售额三十年仅增 8% / 11

企业收益急剧扩大 / 12

附加值率上升, 劳动分配率下降 / 13

4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15

工资以 1997 年为峰值转而减少 / 16

正式员工减少, 非正式员工激增 / 16

差距趋于扩大 / 17

第二部 追踪三十年间的变化

第二章 泡沫的产生、膨胀与破裂（1985~1990 年） / 22

1 股价、地价的上涨与泡沫化 / 22

不断上涨的股价、地价 / 22

这是泡沫吗 / 23

日本银行的担忧 / 25

2 是什么催生了泡沫、又使其膨胀 / 28

预期的显著积极化 / 28

长期化的货币宽松 / 30

信用的显著增加 / 34

3 金融政策、金融监管的转变——走向泡沫破裂 / 36

金融政策的转变、股价泡沫的破裂 / 37

不动产融资管制的启动、地价泡沫的破裂 / 38

第三章 泡沫破裂后的七年（1990~1997 年） / 39

1 旷日持久的景气下行期 / 39

大型景气对策的实施——公定贴现率降至史上最低水平 / 40

泡沫期发生的事情 / 42

泡沫的反动萧条期发生的事情 / 43

日元升值的推进、进口的激增 / 44

2 1993 年 11 月以后，景气毕竟仍在走向回升 / 47

1997 年本是可以预期进一步回升的一年 / 47

3 金融破产的发生与不断高涨的危机意识 / 49

不良债权总额 40 万亿日元，也有金融机构陷入经营破产 / 51

“住专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 / 52

对财政的危机意识的高涨 / 54

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危机意识的高涨 / 56

第四章 桥本“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实施及其破产（1997~2000 年） / 60

1 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 / 61

2 “改革”带来的景气下行 / 62

亚洲货币危机的发生 / 64

股价下跌，并走向“金融危机” / 65

3 金融危机的爆发、“惜贷”“抽贷” / 66

- 金融危机的爆发 / 66
- “惜贷”“抽贷” / 66
- 战后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 / 69
- 4 修正“改革路线”带来景气回升 / 69
- 5 “理想在美国”，重回“结构性改革”路线 / 72
- “经济战略会议”的咨询报告 / 73
- 第五章 小泉内阁登场与“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2001~2009年） / 76
- 1 小泉“结构性改革”内阁的成立 / 77
- “没有结构性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再生” / 77
- 竹中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 / 78
-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活用 / 79
- 《基本方针》的制定 / 80
- 2 “不良债权处置”这项政策 / 82
- 为什么是不良债权处置 / 82
- 打上问号的“不良债权问题压低经济的机制” / 83
- 《白皮书》的说明是错误的 / 84
- 不良债权是什么①——其大半是对“活着的企业”的债权 / 88
- 不良债权是什么②——它是景气的函数 / 90
- 3 “攻势结构性改革”——“从官到民”，以及“管制改革” / 92
- 以“从官到民”、“小政府”为目标 / 93
- “官造穷忙族”的出现及其增加 / 97
- “管制改革”，让竞争原理发挥作用 / 99
- “结构性改革特区”的创设 / 102
- 财政·税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103
- “国债 30 万亿日元以下”几乎在所有年份都未能达成 / 104
- 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地方达成了，但…… / 105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 / 107
- 4 景气在出口主导下回升，但内需持续低迷 / 109
- 5 雷曼冲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结构性改革”的矛盾表面化 / 111
- 2007 年 7 月，政府与执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 / 111
- 沦为跛脚鸭的小泉后继三内阁 / 113

2008年9月，麻生“为了选举的内阁”成立，雷曼冲击恰在此时袭来 / 114

“什么都行”的“经济危机对策” / 117

“结构改革”催生出的“派遣村” / 121

第六章 “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第四、五章补论） / 123

1 “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 123

号称“为了再生日本经济”的政策 / 123

仿效英美的政策 / 125

回应财界（经济界）要求的政策 / 127

“应美国要求”的政策 / 130

再问，“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 133

2 “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 133

变为“即使景气好转，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 / 133

背景：企业间竞争激化与放松劳动管制 / 135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开始 / 136

企业收益显著增加，工资下跌 / 139

“从储蓄到投资”——家庭的钱并没有动起来 / 140

第七章 民主党政权的诞生与自毁（2009~2012年） / 144

1 鸠山内阁：从超过70%的支持率出发，到“至少也要迁到县外”未能实现而下台 / 144

讲述“理念”与“决心”的施政理念演说 / 145

“从混凝土到人”——2010年度预算 / 147

金融监管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金融顺畅化”法的制定 / 150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的挫折，内阁下台 / 152

被外务省官僚出示“伪造文件”而受骗？鸠山首相 / 152

2 菅内阁制定背信弃义的“新增长战略”，因上调消费税发言而自爆 / 153

“新增长战略”，走向“增长第一”路线 / 153

“财政运营战略”的制定=走向“财政重建最优先”路线 / 155

“上调消费税发言”与参议院选举败北 / 155

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的发生 / 156

3 野田内阁，为自公政权铺路？——“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 / 158

- “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 / 158
- 表明参加 TPP / 160
- 4 回顾民主党政权下的三年三个月 / 162
 - 景气一度回升，但受大地震与日元升值影响而低迷 / 162
 - 以不充分告终的派遣制度修订 / 165
 - 民主党政权为何自毁 / 166
- 第八章 安倍经济学：超宽松货币政策与第三轮“结构性改革”（2013～2019 年） / 170
 - 1 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三个特征 / 170
 - 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政策 / 171
 - 为企业服务的政策 / 172
 - 丢掉了人们的生活视角的政策 / 173
 - 2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①——围绕“大胆的货币政策” / 173
 - 为让日本银行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 / 174
 - “大胆的货币政策”的实施 / 175
 - 3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②——“机动的财政政策”“增长战略”及其他 / 177
 - 因财源等问题而放不出箭来的“第二支箭” / 180
 - “减税”与“放松管制”，内容丰盛的“第三支箭” / 181
 - ①法人税减税 / 182
 - ②创设国家战略特别区域制度 / 183
 - ③放松劳动管制（制定“役使方式改革”法） / 185
 - ④新设外国劳动者接收名额 / 186
 - ⑤致力于“社会（Society）5.0” / 188
 - ⑥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 / 189
 - ⑦上调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190
 - ⑧TPP、对美谈判等 / 193
 - 4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195
 - 景气已处于即将进入下降局面的状态 / 195
 - GDP 实际增长率六年间年均 1.0% / 197
 - 企业利润增至 1.7 倍，支付人工成本仅止于 1.05 倍 / 198
 - 5 安倍经济学失败了，但似乎仍将继续下去 / 199

增长率目标与物价上涨率目标均未能达成	／ 199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 200
安倍经济学为什么失败了	／ 202
6 今后的经济与人们的生活，会怎样？ 该怎么办？	／ 203
上调消费税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	／ 203
如何应对安倍经济学终结之时发生的问题	／ 204
如何才能改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	／ 207
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可能的	／ 209
第三部 如何看待日本财政	
第九章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不会变成希腊（第三至第八章补论）	／ 212
日本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然而……	／ 212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	／ 214
日本绝不会变成希腊	／ 216
财政重建，以及扩充社会保障等，都是必要的	／ 217
必须扩充贫弱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 218
财政健全化是可能的，扩充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可能的	／ 220
参考文献	／ 224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批判类著作	／ 224
“结构性改革”政策批判类著作	／ 224
安倍经济学批判类著作	／ 224
有关泡沫、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图书	／ 225
纪实报道、纪实作品等（海外相关）	／ 225
纪实报道、纪实作品等（日本相关）	／ 226
政府方面或政府相关人士等的著作	／ 226
自著	／ 227
其他	／ 227
结语	／ 228
版本说明	／ 232

前言

1990年，或者说1990年前后的那几年，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对日本经济，都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

先说世界经济。“柏林墙”倒塌是在1989年，“统一德国”成立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是在1991年。从1990年前后起，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一齐开始踏上市场经济化之路。另一方面，因“天安门事件”（1989年）而受挫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启动，也是在1992年。由此可见，1990年前后正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开始急速推进的时期。

而在这一潮流中，经济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扩散开来。

以“小政府”和“放松管制”为两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于英国（1979年撒切尔政权诞生）和美国（1981年里根政权诞生），还曾蔓延到新西兰（1984年朗伊工党政权诞生），但被欧洲各国广泛采用，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事。

其重大背景，无疑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圈的崩溃。由此，欧洲各国政府得以不再惧怕本国社会主义化，放手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式经济政策”）。更进一步说，或许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社会主义”这种自以为是的认定，让各国政府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原始资本主义式）经济政策”——实际上，战胜社会主义的（假如这世上真有胜负之分

的话)，并不是原始资本主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修正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福利国家型的资本主义……总之，对资本主义政府来说，一旦获胜，“修正”“福利”之类的外衣就再也不需要了，是不是这样呢？不要修正、不要福利的资本主义政策登场了。

在此，引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一段话。

今天，欧洲各国人民正站在自己历史的转折点上。这是因为，历经数世纪的社会斗争、为捍卫劳动者的人性尊严而进行的智识与政治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正受到来自正面的威胁。那些在各地同时或此起彼伏地、在全欧洲——不，在其他地区、乃至韩国——都日益高涨的社会运动，那些在并无真正意义上的联手的情况下相继发生于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的运动，尽管因领域不同、因国家不同而形态各异，但无一不是对怀着相同目标的政策的反叛。那个目标，就是破坏社会既得权益——无论别人怎么说，它都是文明最高贵的成果之一。社会既得权益，不应以“全球化”（即经济上、社会上落后的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的竞争力）为借口加以破坏；它是应当普遍化、应当推广到全世界、恰恰应当加以全球化的成果。有人说这是保守主义、是落后于时代，但没有什么比捍卫这种社会既得权益更自然、更正当的了。难道会有人以保守为由，去谴责对康德、黑格尔，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人类文化既得财产的捍卫吗？众多的人曾为之受苦、为之斗争的社会既得权益——即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同它们一样高贵而宝贵的成果。而且，它们并不是在美术馆、图书馆和大学里存活，而是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发挥着作用，规范着人们每天的生活。

（皮埃尔·布尔迪厄《市场独裁主义批判》）

从布尔迪厄的这番话可以看出，1990年（前后）以后的世界经济，可以把握为一个与此前时代相区别的时代：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肆虐的时代，同时也是与之对抗的人们——知识分子、劳动者、经济上的弱者——的抵抗运动同样展开的时代。

那么，日本又如何呢？

对日本而言，1990年（或1991年）首先是泡沫破裂之年。1990年，在日本，首先是股价的泡沫破裂了。前一年即1989年12月29日创下38915日元历史最高点的日经平均股价，进入1990年后转为下跌，同年年末跌至23000日元左右。次年以后跌势仍未停止，1995年跌破15000日元，2001年更跌至10000日元以下。从那时直到今天，虽有涨落，但月末值从未回升到25000日元以上。

另一方面，同为泡沫的地价也略迟于股价，以1991年初为峰值转为下跌。从国土交通省的公示地价（基准地价的总平均）来看，以峰值时（1991年初）为100，十年后（2001年3月末）跌至27，二十年后（2011年初）跌至25，直到二十三年后（2013年初）下跌才终于止住，而最近（2018年初的水平）仍为30。

随着泡沫破裂，景气也转为下行。景气的峰顶是1991年2月。自1986年12月起持续51个月的“泡沫景气”宣告结束，日本经济陷入了自1991年3月起长达33个月的长期萧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日本经济低迷时代的开端。“失去的10年”这个说法，后来又进一步被“失去的20年”所取代。而如今，日本经济正处在一种迟早可能被称作“失去的30年”的状况之中。

这样看来，可以说，1990年前后对战后日本经济而言，也是划时代的一年。

也就是说，可以认为：从战败的 1945 年到 1990 年（前后），是日本经济恢复、上升的时代；而从 1990 年至今，则转变成了日本经济跌落、衰退的时代。

当然，即使在 1945 年至 1990 年日本经济恢复、上升的时代里，也有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具有代表性的是：战后复兴大体告成、《经济白皮书》宣告“已经不再是战后”的 1956 年；以及七十年代前半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告别 1 美元 360 日元的时代（1971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1973 年）、更有公害问题迸发等等，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的根基大为动摇。

不过，尽管经过了这样几个转折点，截至 1990 年的日本经济总归是一路上行。从战后的废墟出发，到 1990 年，日本已成为 GDP 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也达世界第八位（IMF 统计）的经济大国。哈佛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还曾在《日本第一》（1979 年）一书中对它大加褒扬。

而使这一潮流发生逆转的——尽管重复——正是 1990 年。股价、地价下跌，GDP 虽晚了近十年，也开始减少（1998 年以后）。GDP 被中国超越、退居世界第三位，是在 2010 年。再看人均 GDP，虽说也有日元贬值使按美元换算的金额变小的影响，2017 年已跌落到世界第 25 位。

1990 年以后的日本经济，总的来看是在凋落，已在走下坡路——不能不这样看。

那么，谈谈本书。

在本书中，我想回顾一下 1990 年以后、已然“走了下坡路”的大约三十年间的日本经济。这是“泡沫破裂后的三十年”，是“消费税开征（1989 年）后的三十年”，也是“被称为平成（1989～2019 年）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首先是时期的划分：本书的立场，是把这三十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①1990年至1997年。泡沫破裂后的七年，包括由此陷入长期景气下行的时期，以及此后的景气回升期。在这一时期，景气下行长期化，尽管如此，经济也开始走向回升；而在人们的意识层面，“日本经济危机论”抬头，因此它也是为九十年代后半期以后的“结构改革的时期”（日本版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时期）做准备的。

②1997年至2009年。桥本龙太郎首相主导实施“六项改革”及其受挫的时期；然后是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以后，历经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各届内阁而延续下来的“结构改革”的时期，即所谓日本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展开的时期。

③2009年至2012年。从民主党政权的诞生到自我瓦解。

④2013年至2019年。从第二届安倍晋三内阁成立至今。这是“安倍经济学”的时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再次全面展开的时期。

本书的构成安排如下。

首先，概览本书所涉时期（1990年以后的三十年，再加上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泡沫景气时期，共三十五年）内日本经济的变动（第一章）。这里之所以不仅以1990年以后的三十年为对象，还把它之前的时期（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大约五年＝泡沫时期）也一并纳入，是因为我认为，在考察1990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尤其是前面划分的①的时期）时，有必要先看一看在它之前的泡沫时期。

其次，在第二部，先回顾泡沫破裂之前的时期（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至1990年），即从泡沫的发生、膨胀到破裂的时期（第二章）。随后，按照前面给出的时期划分来审视1990年以后的三十年：第三章（1990年至1997年）、第四章（1997年至2000年，截至桥本“六

项改革”及其受挫)、第五章(2001年至2009年,小泉“结构改革”的时期);第六章则作为对第四章与第五章的补论,回顾“‘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接着依次考察第七章(2009年至2012年)、第八章(2013年至2019年)。

最后的第三部作为附章,打算论述财政赤字问题——它贯穿本书所处理的整个时期,始终是日本经济的重负,一直存在于(执政者的)意识之中(第九章)。

第一部 1990 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概观

第一章 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有何变化

1 景气如何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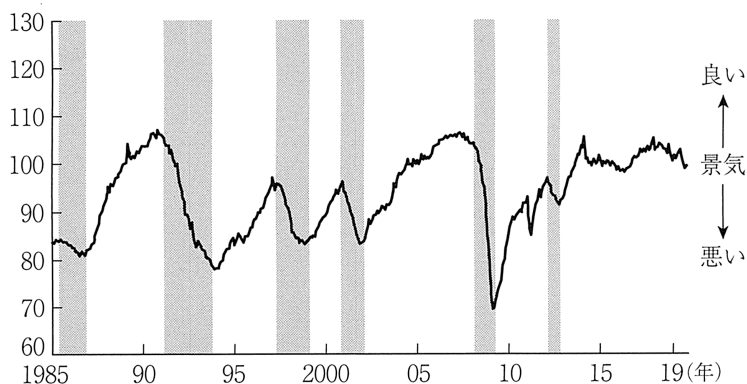
首先，概观一下本书所涉期间的景气动向。本书主要论述的期间是1990年以后的三十年，不过为便于说明，从八十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期）开始看起。所参考的是“景气动向指数（同步指数）”的走势（图表1-1）。

景气动向指数，是汇集若干对景气变动反应敏锐的指数、将其合成为一个指数的产物。内阁府编制有领先指数、同步指数、滞后指数三种。图表1-1看的是其中之一——同步指数的走势。同步指数目前由九个指数（工矿业生产、加班工时、商业销售额等）合成，每月编制。景气好转数值就变大，恶化就变小，因此被用来把握景气动向与现状。

始于景气下行局面的八十年代后半期

那么，如图表1-1所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始于景气下行局面（1985年7月～1986年11月）。带来这一轮景气下行的重大原因，是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为纠正美国贸易赤字扩大而举行的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五国会议达成的协议），以及由此而来的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上升、日本出口增长放缓。如

图表 1-1 1980 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景气动向——景气动向指数（同步指数）的走势



(注) 1. 以 2015 年为 100 的指数

2. 阴影部分为景气下行期

(资料) 内阁府《景气动向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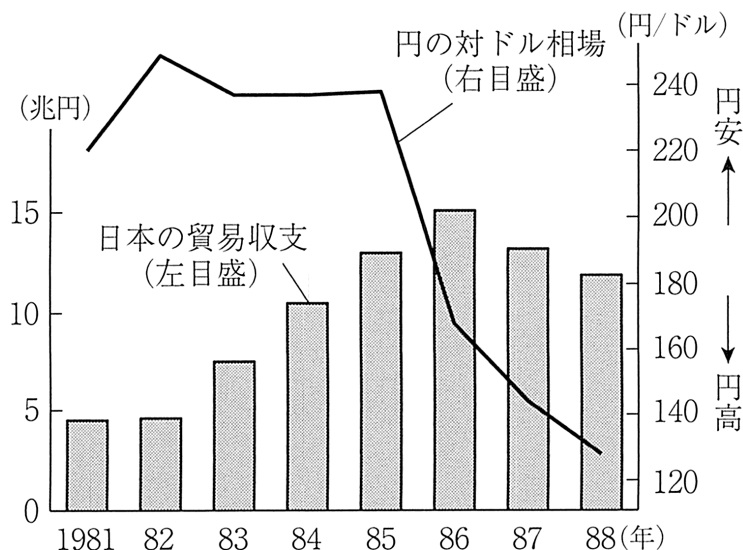
图表 1-2 所示，八十年代中期，在 1 美元兑 240 日元前后的日元汇率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迅速且大幅扩大。广场协议上的汇率调整是不得已之举，由此产生的景气下行（“日元升值萧条”）同样在所难免——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此外，在景气处于下行局面的 1986 年 4 月，还有一份以“向国际协调型经济转变产业结构”等为支柱的建议（《面向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即所谓“前川报告”）被提交给了当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那是一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日本国内，都在认真讨论如何“纠正”日本过大的对外顺差（过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时期。

泡沫景气开始（1986 年）

回到景气的话题。日本摆脱“日元升值萧条”是在 1986 年 12 月。其背景在于，日本银行实施货币宽松政策（1986 年 1 月～1987 年 2

图表 1-2 广场协议（1985 年）前后的日元兑美元汇率、日本贸易收支的走势



(資料) 内閣府「経済財政白書(2018 年版)」

(資料) 内閣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18 年版）》

月)、政府实施综合经济对策（1986 年 9 月）等。顺便一提，就货币宽松政策来看，以 1986 年 1 月（公定贴现率 5%→4.5%）为开端，到 1987 年 2 月（公定贴现率降至史上最低的 2.5%）为止，数次实施了降息等措施。

就这样，景气开始回升，此后上行持续到 1991 年 2 月。即所谓“泡沫景气”。其情形留待第二章再看。

“泡沫破裂”导致长期萧条（1991 年）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股价暴跌、地价下跌等“泡沫破裂”事态发生，景气也随之自 1991 年 3 月转入下行局面（以下参见图表 1-1）。

导致泡沫破裂的,是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转向。第一,日本银行以1989年5月将公定贴现率上调0.75个百分点(2.5%→3.25%)为开端,到1990年8月调至6%为止,前后共实施五次、累计3.5个百分点的上调。第二,大藏省于1990年3月实施“不动产融资总量管制”(以银行局长通知形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的行政指导),即要求把面向不动产的融资增长率压至贷款总增长率以下的指导。

就这样,景气自1991年3月进入下行局面(“泡沫的反动萧条”)。这一轮下行局面持续到1993年10月,长达32个月。回顾战后日本的景气循环,有过下行期长达36个月的先例(1980年3月~1983年2月),但那是因为伴随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的1980年以来的景气下行临近结束时,又接上了受美国景气下行(1981年7月~1982年11月)影响而来的景气下行,可以说是两轮景气下行首尾相继。可以认为,1991年3月开始的景气下行期长度,实质上是战后最长。

“泡沫的反动萧条”除持续时间长之外,下跌幅度也很大。不管怎样,这轮下跌于1993年10月触底。背景有: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转向解除紧缩(1991年7月起转为下调公定贴现率,至1993年9月前后共七次,由6%降至1.75%),大藏省的“不动产融资管制”也被解除(1991年12月)等。

就这样,1993年11月以后景气转入复苏局面,但为期很短。1997年6月起景气开始下行。

“改革”政策导致萧条到来(1997年)

1997年6月开始的景气下行,将在后文(第四章)详述,它发端于当时桥本内阁推行“财政结构改革”带来的上调消费税、削减公共工程等造成的需求减少,加之亚洲货币危机发生造成出口下滑,更

有随着这样的景气恶化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其下跌之严峻，表现为 GDP 实际增长率在 1998 年、1999 年连续两年为负，属战后首次。

那么，这轮景气下跌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等，于 1999 年 1 月触底，但此后的景气复苏到 2000 年 11 月草草收场，2000 年 12 月起再次转入下行局面。其背景是美国的 IT 泡沫破裂。

这轮始于 2000 年 12 月的景气下行持续到 2002 年 1 月，而自泡沫破裂（九十年代初）算起约十年间，如图表 1-1 的景气动向指数所示，日本的经济活动水平从未超过泡沫鼎盛期的水平。而且，这期间三度出现的景气的谷，其时点的经济活动水平已跌至“泡沫景气”开始之时（1987 年初）的同等程度甚至更低。这正是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缘故。

长期景气上行（2002～2008 年）

话归景气动向，2002 年 2 月重新转向复苏的景气，这次持续上行至 2008 年 2 月为止，长达 73 个月（超过“伊奘诺景气”的 57 个月，为战后最长）。因超越“伊奘诺”而时或被称为“伊奘冉景气”的这一轮上行期，上行期间 GDP 增长率年均低于 2%（与增长率超过 10% 的伊奘诺景气无法相比），只不过是长时间没有陷入下行局面而已，是一场“感受不到的景气扩张”。

雷曼冲击引发景气下行（2009 年）

终结这一轮长期景气上行局面的，是 2007 年前后起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 2008 年 9 月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经营破产引发的“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雷曼冲击”）。日本景气由此进入下行局面（2008 年 3 月），经济活动水平骤降。

从这场深跌中开始复苏是在 2009 年 4 月，但观察转入复苏后的景气动向指数走势，可见三次明显的回落：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同时发生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 2011 年，出现源于希腊危机（2009 年）的欧洲经济动荡与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加剧的 2012 年，以及因消费税率上调而发生回落的 2014 年。

前二者发生于民主党政权时期（2009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起初为与社会民主党、国民新党的联合政权），其中前者未演变成景气下行局面，后者虽为时较短（2012 年 4 月～11 月，8 个月），景气却陷入了下行局面。

2014 年 4 月上调消费税引发的景气动向指数回落，发生于第二次安倍内阁以后（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执政时期），回落后的低迷走势长期持续至最近（约五年），但未被认定为景气下行局面。

安倍经济学登场（2013 年）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此前的景气下行局面已于 2012 年 11 月结束。第二次安倍内阁起步于景气刚进入上行局面之时（同时也是从雷曼冲击造成的大跌中重新开始复苏之时），可谓幸运的出发。

图表 1-1 所示景气动向指数的走势，其中 2013 年以后的部分，属于第二次安倍内阁以后、就政策而言属于安倍经济学时期，对此将在第八章详述。

图表 1-3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景气循环

景气的谷	景气的峰	景气的谷	上行期	下行期	参考
	85. 6	86. 11		17 个月	
86. 11	91. 2	93. 10	51 个月	32 个月	上行：泡沫景气下行：泡沫的反动萧条
93. 10	97. 5	99. 1	43 个月	20 个月	
99. 1	0. 11	2. 1	22 个月	14 个月	

(续表)

景气的谷		景气的峰		景气的谷		上行期	下行期	参考
2.	1	8.	2	9.	3	73 个月	13 个月	上行：伊奘冉 (?) 景气
9.	3	12.	3	12.	11	36 个月	8 个月	
2.	11 ^①		?					

(资料) 内阁府《景气基准日期》

景气的峰、谷与经济活动水平

以上所看的景气动向，现按景气的峰（景气转好、此后不再更好的月份）、景气的谷（景气下跌、此后不再更坏的月份）、景气上行局面（谷的次月至峰的月份）、下行局面（峰的次月至谷的月份）汇总为一表（图表 1-3）。

此外，景气动向指数还可用来观察经济活动水平。以此眼光再看图表 1-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经济活动的峰值是 1990 年 10 月（以 2015 年为 100 的指数为 106.9）。此后虽曾接近该水平（2007 年 5 月 106.6、2014 年 3 月 105.5 等），但从未超过（眼下的水平，2019 年 7 月为 99.7）。

1990 年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分水岭之年，从这一指数的走势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2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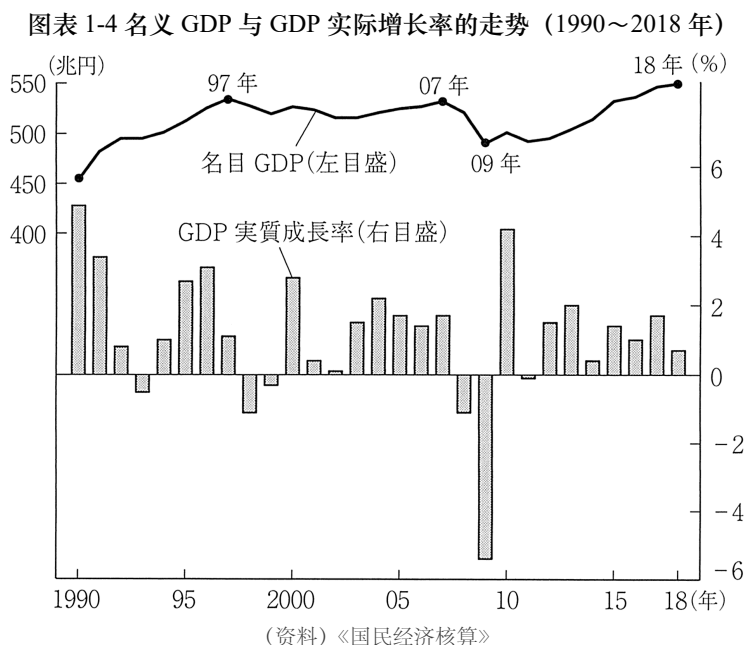
接下来转换视角，来看 1990 年以后三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变化。首先看日本经济的规模（名义 GDP＝国内生产总值）与逐年的实际增长率（GDP 实际增长率）是如何变化的。

① 原书此格作“02.11”，据上一行“景气的谷”栏的“12.11”与全表时序，当为“12.11”之误植；此处照排原书，并出注说明。——译注

1998 年以后，GDP 不再增长

首先，起始之年 1990 年的名义 GDP 为 453 万亿日元（按对应 2008 年 SNA 的国际标准。不足万亿日元舍去。以下同）。此后逐年增加，1994 年超过 500 万亿日元，1997 年达到 534 万亿日元（图表 1-4）。但增长态势只持续到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名义 GDP（实际 GDP 也是）转为较上年减少，此后长期未能超过 1997 年的水平。

名义 GDP 好不容易恢复到接近 1997 年水平是在 2007 年（531 万亿日元），但次年与第三年受雷曼冲击影响，水平跌落至 489 万亿日元（2009 年）。2012 年以后重回升势，但恢复到超过 1997 年水平是在 2016 年（535 万亿日元），时隔约二十年。眼下（2018 年）的水平为 548 万亿日元，较 1997 年仅增 2.6%（年均增长 0.1%）。



1997 年较 1990 年增加 81 万亿日元、17.8%（年均增长 2.4%）。1990 年至 1997 年与 1998 年至 2018 年，走势明显不同。从名义 GDP 的动向看，分水岭之年不是从景气动向指数走势看到的 1990 年，而是 1997 年。

战后日本经济有两个可视为分水岭的年份——1990 年与 1997 年，就让我们以此把话题推进下去。

实际增长率一度回升，然而

还有一点，也来看一下 GDP 实际增长率的走势（以下参见图表 1-4）。

泡沫破裂之年 1990 年的实际增长率为 4.9%，仍然很高。其后，1991 年降至 3.4%，1992 年为 0.8%，1993 年更跌至负 0.5% 的负增长（参见柱状图）。这一时期就是前面看过的“泡沫的反动萧条”（1991 年 3 月～1993 年 10 月）。

但如柱状图所示，实际增长率的下跌止于 1993 年，1994 年 1.0%、1995 年 2.7%、1996 年 3.1%，1994 年以后增长率逐步走高。景气复苏已经开始。

连续两年负增长（1998～1999 年）

然而，这轮复苏很快结束，1997 年的实际增长率仅为 1.1%，1998 年、1999 年更陷入连续两年负增长。这是本章前半部分略为提及的当时桥本内阁“财政结构改革”等影响所致的下跌（详见第四章）。

越过第二个“分水岭”之年 1997 年之后，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除唯一的例外年份（2010 年。增长率 4.2%，因属雷曼冲击所致的 2009 年负 5.4% 深跌后的反弹，增长率偏高）之外，再未超过 1996 年录得的 3.1%，直至今日。

3 企业业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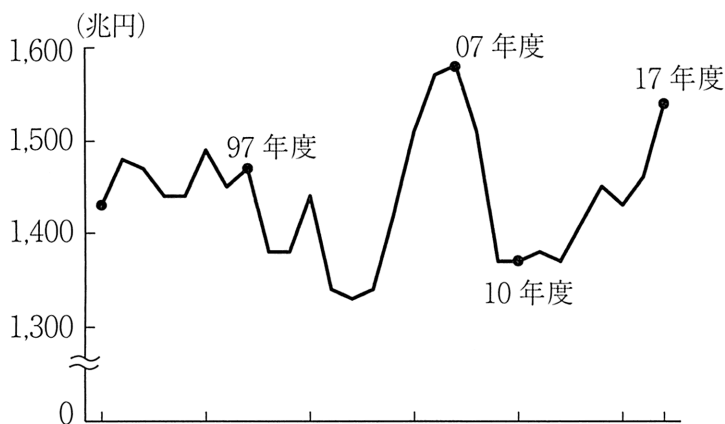
接下来,从销售额、经常利润^①等数字来看企业业绩三十年间的变化。

企业销售额三十年仅增 8%

首先看法人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图表 1-5)。

泡沫破裂的 1990 年度,全部产业的年度销售额为 1438 万亿日元(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不含金融、保险业)。此后逐年的走势,有增之年,有减之年,也有持平之年,情形不一,但总的来看,到 1997 年度为止基本持平(1997 年度 1467 万亿日元,较 1990 年度增 2.7%)。

图表 1-5 企业销售额的走势(1990~2017 年度)



(资料) 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① 经常利润(经常利益)是日本会计中的利润科目,指营业利润加减营业外收支(利息、汇兑损益等)之后的利润,位于税前利润之上;汉语会计科目中无完全对应者,本书照用其名。——译注

销售额的大幅下跌，发生在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的 1998 年度（1381 万亿日元）。此后持续在低水平徘徊，到 2005 年度才终于超过 1997 年度的水平（1508 万亿日元）。其后，以 2007 年度（1580 万亿日元）为峰值，因雷曼冲击再度大幅下跌，最新年度（2017 年度，1544 万亿日元）仍未恢复到雷曼冲击前的水平。

企业销售额的这种增长乏力，自然与日本名义 GDP 的增长乏力如出一辙。尤其是另一分水岭 1997 年以后的增长态势更是如此（图表 1-6）。

图表 1-6 名义 GDP 与企业销售额

年度	名义 GDP	企业销售额
1997	100	100
2017	103	105

（注）以 1997 年度为 100 的指数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企业收益急剧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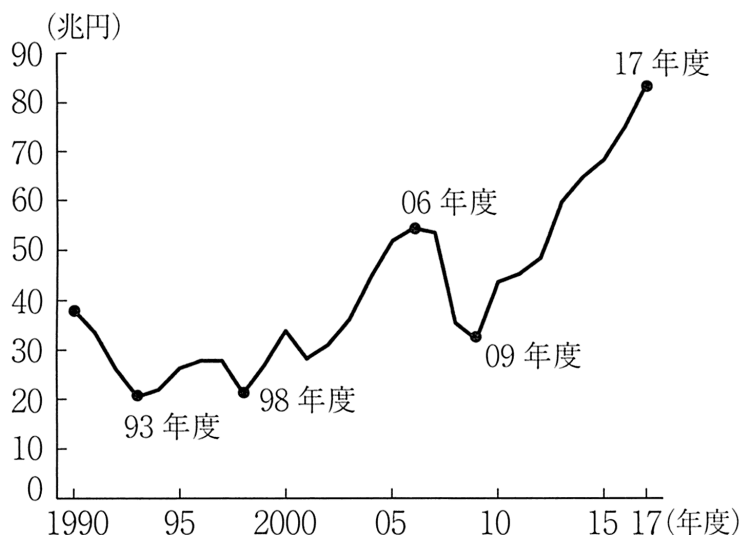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看九十年代以后企业收益的动向（图表 1-7），全部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以 1990 年度的 38.1 万亿日元为峰值，受泡沫破裂影响，到 1993 年度（20.5 万亿日元）大幅减少。其后随景气复苏回升至 1997 年度（37.8 万亿日元），但在负增长的 1998 年度再度减少（21.2 万亿日元）。

不过此后转为增长态势，尤其是雷曼冲击造成的下跌（2009 年度，33.1 万亿日元）之后，开始逐年显著增加。

2017 年度全部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为 83.6 万亿日元（史上最高利润），是 1990 年度的 2.2 倍、因负增长而下跌的 1998 年度的 3.9 倍、雷曼冲击后谷底（2009 年度）的 2.6 倍。

与前面看到的销售额增长乏力相比，无论与哪一年比较，经常利润的增长幅度都大到近乎异常（图表 1-8）。

图表 1-7 企业经常利润的走势 (1990~2017 年度)



销售额几乎不增长，经常利润却在增加，也就意味着销售额经常利润率在上升。这是为什么呢？

附加值率上升，劳动分配率下降

决定销售额经常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附加值率（附加值÷销售额）。所谓附加值，粗略地说就是销售额与进货成本之差，即企业的毛利润；附加值率则是每单位销售额的毛利润率。

决定销售额经常利润率的另一项是劳动分配率（人工成本÷附加值）。附加值（≡毛利润）要用于人工成本、财务费用（利息）、房租、地租等支出，剩余部分成为企业收益，而在被分配的份额中占最大比重的是人工成本分配额，其比率（劳动分配率）对企业收益影响很大。

那么，来看附加值率与劳动分配率这三十年间的走势：附加值率虽有反映景气波动的起伏（景气下行局面下跌、上行局面上升），但仍可看出从九十年代的 18% 上下向近年的 20% 上下缓慢上升的趋势（图表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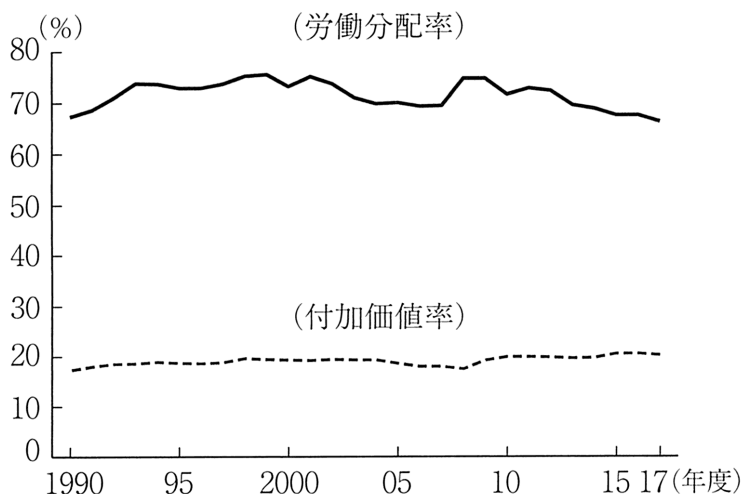
图表 1-8 经常利润的增长远超销售额的增长

	90 年度=100	98 年度=100	09 年度=100
2017 年度的销售额	108	112	113
“ 经常利润	219	394	260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另一方面，劳动分配率比附加值率受景气波动的影响更大（景气下行局面上升、上行局面下降），但纵观三十年，仍呈从九十年代的 70% 上下向近年的 60% 上下下降的趋势。近年——即从雷曼冲击中复苏的过程——尤其如此。

图表 1-9 1990 年以后附加值率与劳动分配率的走势



（資料）財務省「法人企業統計年報」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附加值率的上升，即企业购销差价的增加趋势，与劳动分配率的下降，即人工成本的压缩，可以认为正是在销售额几乎不见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经常利润却在增加的背景。

图表 1-10 这三十年间企业收益大幅增加的背景——一项试算（单位：万亿日元、%）

	销售额	经常利润	（经常利润／销售额）	附加值	（附加值／销售额）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附加值）
1997 年度（1990 年代）	1467	27.8	(1.90)	276	(18.8)	203	(73.6)
2016 年度（2010 年代）	1456	75.0	(5.15)	299	(20.5)	202	(67.6)

（注）就 2016 年度而言，假如附加值率与 1997 年度相同（18.8%），则附加值为 274 万亿日元，比实际值 299 万亿日元少 25 万亿日元。再若人工成本比率（劳动分配率）与 1997 年度相同（73.6%），则人工成本为 220 万亿日元，比实际值 202 万亿日元多 18 万亿日元。仅此即可使 2016 年度的经常利润减少 43 万亿日元，推算值为 32 万亿日元，接近 1997 年度的数字。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图表 1-10 比较了年度销售额大致相等的 1997 年度与 2016 年度（若把 1997 年度看作这三十年初期的代表、2016 年度看作后期的代表），其情形可由此窥见一斑。

也就是说，这三十年间，在企业经营层面发生了如图表 1-10 所示的巨大变化。

4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最后，也来看一下这三十年间生活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原本涉及方方面面，这里姑且选取①工资的走势与②差距的走势，作为这三十年重大变化的代表来看一看。

工资以 1997 年为峰值转而减少

关于工资有几种统计，这里用其中一种——国税厅《民间工资实况统计调查》的“全年在职工作的工薪收入者人均平均工资”（图表 1-11）来看。

1990 年的平均工资为 425 万日元。其后 1991 年 447 万日元、1992 年 455 万日元，直至 1997 年的 467 万日元，每年增幅虽小，但趋势上是上升的。这一态势的改变发生在 1998 年。1998 年为 465 万日元，比上年减少 2 万日元；此后除 2012 年这一例外年份外持续减少，到 2008 年降至 430 万日元。而雷曼冲击的次年 2009 年更骤降至 406 万日元（图表 1-11）。

2009 年的人均平均工资 406 万日元，比减少趋势开始的前一年（1997 年）的 467 万日元减少 13%；2009 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水平与 1997 年大致相同，因此实际工资也减少了 13%，也就是说工薪收入者相应地变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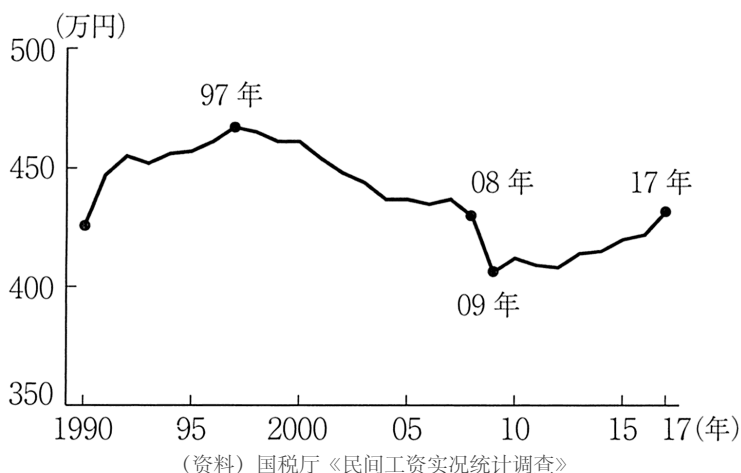
2010 年以后，平均工资略有回升，但最近年份（2017 年）为 432 万日元，仍比 1997 年的数额低 35 万日元（7.5%）。自 1997 年过去二十年的今天，工薪收入者的人均平均工资，战后最高仍是 1997 年。

正式员工减少，非正式员工激增

1998 年以来工薪收入者人均平均工资的这种减少，其重大原因恐怕在于正式员工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员工数的增加（其比率大幅上升）（图表 1-12）。

将最近（2018 年）的数字与 1997 年相比，正式员工数为 3476 万人，减少 336 万人；非正式员工数为 2120 万人，增加 968 万人；其比率由 23% 升至 38%（图表 1-12）。

图表 1-11 全年在职工作的工薪收入者人均平均工资的走势



前面在企业业绩一节看到,企业收益显著增加的背后有劳动分配率的下降,而从劳动一方来看,则是低工资劳动者的显著增加。这是以 1997 年为又一大分水岭的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的重大变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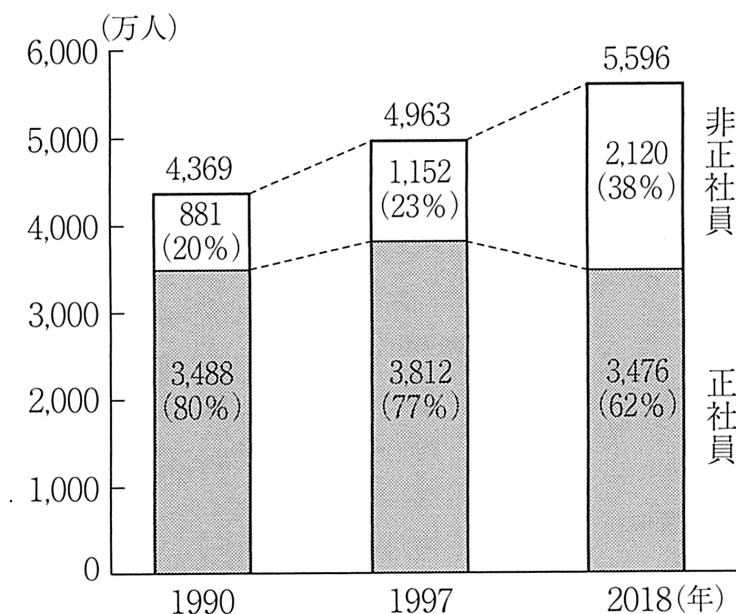
差距趋于扩大

还有一点,经济差距也来看一下。

经济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这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提出的系数,其计算方法用图表 1-13 来说明。

这是求一个由多户家庭组成的社会的基尼系数的方法。①将家庭按收入由少到多排列,横轴取家庭数累计的比率(0~100%)。②纵轴取与累计家庭比率对应的累计收入额比率,将各点连线。③若收入分配完全平等,该线应为对角线(例如累计家庭数比率为 50% 时,累计收入额比率也为 50%)。④反之,若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1% 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该线则是三角形的底边线加上从横轴刻度 100

图表 1-12 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构成的变化



(资料) 总务省《劳动力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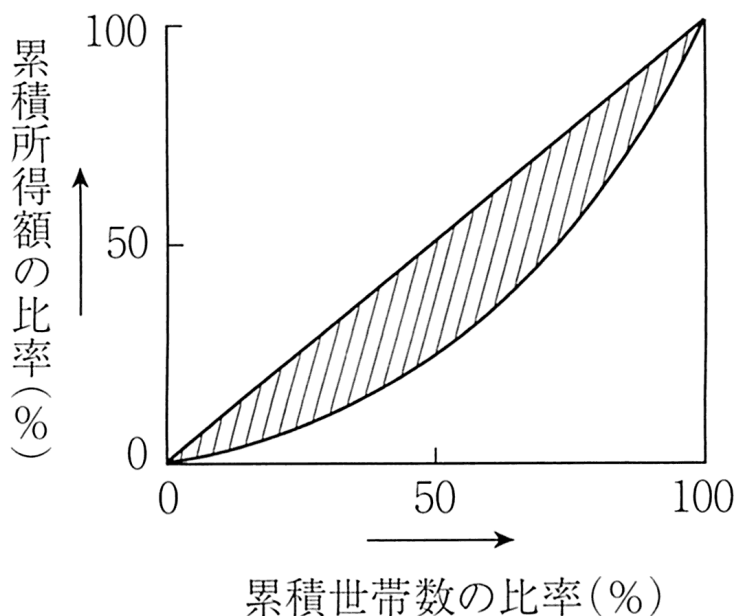
处升起、直至纵轴刻度 100 的垂线。⑤一般情况下，得到的是连接左下 0 点与右上 100 点的曲线。⑥如此形成的新月形部分（图中斜线部分）面积与三角形面积之比，即为基尼系数。⑦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取 0（收入分配完全平等时）到 1（完全不平等时）之间的值。系数越小越平等，越接近 1 越不平等——可以如此解读。

那么，日本社会现实的基尼系数，由厚生劳动省每三年实施一次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测定。其走势如图表 1-14 所示。

可见，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90 年的 0.43 升至 2017 年的 0.56，明显在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平等正在加剧。

从每个人的初次分配收入中扣除税金与社会保险费负担，再加上社会保障给付（养老金、生活保护等），即为再分配后收入；这一

图表 1-13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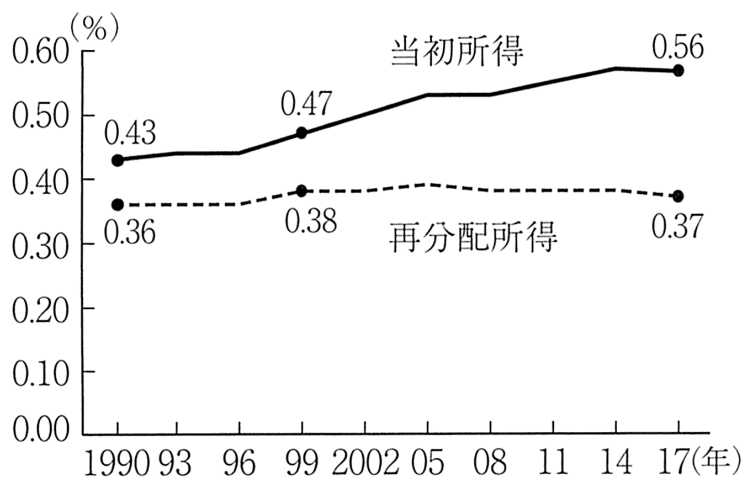
(注) 基尼系数 $0 \leq \text{新月形部分の面积} / \text{三角形部分の面积} \leq 1$

再分配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90 年的 0.36 到 2017 年的 0.37，略有扩大（更细致地看，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到二〇〇〇年代有所扩大，但进入二〇一〇年代后，扩大之势似已止住）。

此外，与发达国家比较，看 2008 年的情形，日本的基尼系数比 OECD 平均值略大；政府的分析是：“不平等程度略高”“主要国家中基尼系数大于日本（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则较小（不平等程度低）”（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2 年版）》）。

日本已不再是“平等社会日本”——这三十年间，它变成了这样，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图表 1-14 基尼系数的走势



(资料) 厚生劳动省《收入再分配调查》

第二部 追踪三十年间的变化

第二章 泡沫的产生、膨胀与破裂（1985～1990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日本，是泡沫的时代。

所谓泡沫，其释义为“即水泡”“指没有实际支撑的投机造成的过热市况，因其会像泡影般消失而得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也在土地和股票上发生了泡沫，九十年代因其崩溃而发生了长期萧条”（伊东光晴编《岩波现代经济学事典》，2004年）。

1 股价、地价的上涨与泡沫化

不断上涨的股价、地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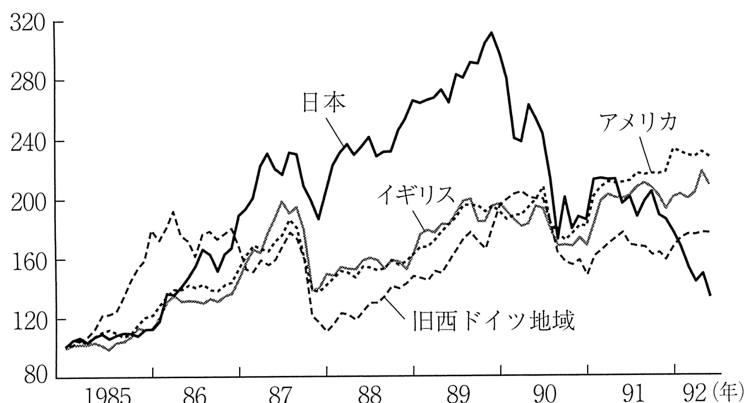
首先来看这一时期股价、地价的动向。

先看股价的动向。

从东证股价指数的走势看，股价自1986年初开始上升，其间虽在1987年后半期受纽约市场股价大跌（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影响出现过下跌，但从1987年底前后再度上涨，一直涨到1989年底。这一上升趋势在美国、英国、原西德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日本的上升势头格外强劲。如图表2-1所示。

再看地价的动向。地价的走势因地区、用途等而有所不同，但在八十年代后半期，首先是东京圈、而且是商业用地的地价上涨，这波上涨引发东京圈住宅用地的地价上涨，继而波及大阪圈的商业用

图表 2-1 股价指数的走势



（備考）株価指数は日本は月末値，その他の国は月中平均値を 1985 年 1 月 = 100 として換算した値

（备注）股价指数中，日本取月末值，其他国家取月中平均值，均换算为 1985 年 1 月 = 100 的数值

（出处）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1992 年版）》

地、住宅用地，再进一步扩展到名古屋圈以至地方城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图表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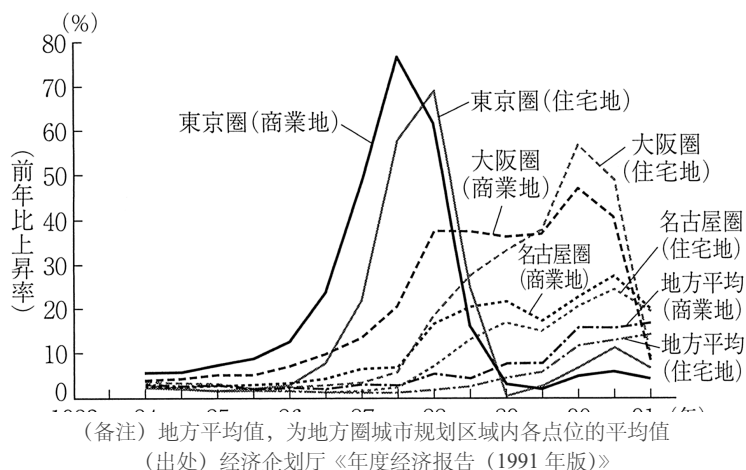
股价上涨持续至 1989 年底，地价上涨持续至 1990 年初；若将各自达到峰值时的水平与 1985 年的水平相比，股价、地价均达到约三倍。与这一时期 GDP 的实际增长（1.2～1.3 倍）相比，其涨幅之大就可见一斑（图表 2-3）。

这是泡沫吗

面对这样的股价、地价上涨，政策当局（政府、日银）是如何看待的呢？

1989 年政府的《年度经济报告》（别称《经济白皮书》。向内阁会议报告的时间是 1989 年 8 月 8 日，那时泡沫还没有破裂），专设“日本经济的存量化”一章，分析了“股价变动及其要因”和“地价

图表 2-2 地价上涨的波及过程（从东京圈到大阪圈、名古屋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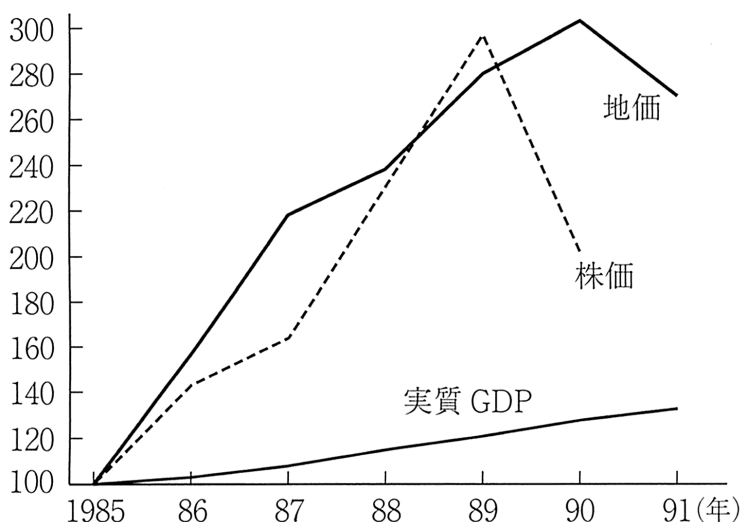
暴涨及其要因”。这或许是因为“莫非这就是泡沫？”的疑虑在政府内部也已出现。

不过，其结论是：关于股价，“大体可以认为已处于对企业资产价值作出评价的水平”；关于地价暴涨，则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的进展，经济功能等正向东京圈加速集中。尤其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迅速成长，市中心的写字楼需求日趋紧张。与此相关，可以认为东京土地的生产率（边际价值生产率）及其预期值正在上升”——对泡沫之说持否定态度。

政府的《年度经济报告》把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股价、地价上涨视为泡沫并加以分析，是在 1992 年版之中；该版于 1992 年 7 月 28 日向内阁会议报告，当时股价与地价已双双转为下跌。

也就是说，在这一版中，关于股价，报告算出了“利率修正股价收益率”（股价收益率 $\cdot$ PER，即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再乘以长期利率所得的数值），并通过观察其走势，推断 1987 年年中（黑色星期

图表 2-3 股价、地价与实际 GDP 的走势



- (注) 1. 股价为各年末的日经平均
2. 地价为各年初的公示地价
3. 实际 GDP 为各年值
4. 均为 1985 年 = 100 的指数

(资料) 国土厅《公示地价》、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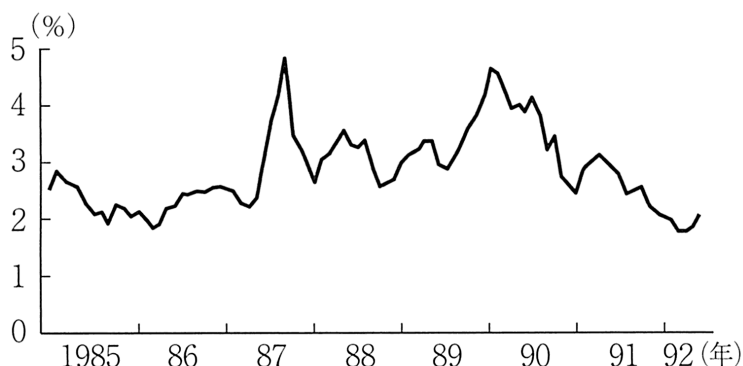
一之前)与 1989 年后半期的股价水平,已与当时的基本面(企业收益等的水平)大幅背离(也就是说,那是泡沫)(图表 2-4)。

此外,关于地价,则算出理论地价(参见图表 2-5 的备注),与现实地价加以比较,推断 1988 年以后的现实地价已高于理论地价,即出现了地价泡沫(图表 2-5)。需要说明的是,本图只引用了东京都区部的部分,《年度经济报告》对名古屋圈、大阪圈也刊载了同样的图,并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日本银行的担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经济是否正在泡沫化——这样的担忧,当时的日本银行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似乎也曾有过。从

图表 2-4 利率修正 PER 的走势



$$\begin{aligned} \text{(備考) 1. PER} &= \frac{\text{株価}}{1 \text{ 株当たり利益}} \\ &= \frac{1}{1 \text{ 株当たり利益率}} \end{aligned}$$

金利修正 PER = PER × 金利。金利は国債最長期物流通利回り

2. 株価は月末値

(备注) 1. PER = 股价 / 每股收益 = 1 / 每股收益率

利率修正 PER = PER × 利率。利率取国債最长期品种的流通收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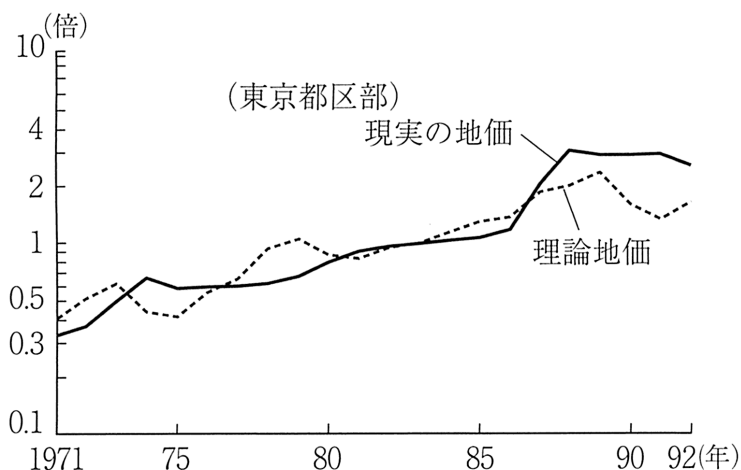
2. 股价为月末值

(出处) 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1992 年版）》

该行《调查月报》1990 年 4 月号刊登的《关于日本近年来地价上涨的背景与影响》一文中，可以窥见这一点。

该论文指出：“从较近时期海外各国的经验来看，在英国、美国等国，也发生过以地价暴跌为导火索、导致金融机构经营恶化的事例。作为这些海外经验共同的教训，可以指出三点：①地价若在短时间内急剧上涨，此后就存在反转的可能；②届时将不止于个别金融机构的经营不稳定，视情形还可能演变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③不动产相关贷款的坏账，容易在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生。”

图表 2-5 住宅用地的理论地价与现实地价的走势



(備考) 理論地価とは、消費者物価指数の家賃を今回の地価上昇直前の 83 年を 1 として指数化したものを、83 年を 1 として指数化した長期金利(利付き電々債利回り)で除したもの。

現実の地価も 83 年を 1 として指数化しており、したがって、理論地価と現実の地価が 83 年で一致する

(备注) 所谓理论地价，是将消费者物价指数中的房租以本次地价上涨前夕的 83 年=1 加以指数化，再除以 83 年=1 指数化的长期利率（附息电债收益率）所得的数值。现实地价同样以 83 年=1 指数化，因此相当于假定理论地价与现实地价在 83 年一致。此外，理论地价采用的是前年平均房租与前年第 4 季度附息电债的平均收益率。

(出处) 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1992 年版）》

这些被指出的问题，恰恰在数年后变成了现实。

不过在当时，这样的担忧虽说朦胧，却已相当广泛地存在；而“应当运用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与监督以及金融政策等手段、立即采取某种措施的主张〔在日本银行内部也〕属于少数派”（白川方明《中央银行》）。

2 是什么催生了泡沫、又使其膨胀

在追踪此后事态的演变之前，先在这里想一想“是什么催生了泡沫、又使其膨胀”。

关于这一点，泡沫破裂以来已有众多论述，而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前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的著作《中央银行》。

在该书中，白川把因素分为①使泡沫产生的初始因素、②使已产生的泡沫加速膨胀的因素两类加以考察：作为①的因素，列举了“预期的显著积极化”与“信用的显著增加”两项；作为②的因素，列举了“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金融与经济活动之间产生的放大景气的作用”“容易加速地价上涨的税制”三项。

我认为这几点都很重要。详细论述请参见该书，以下只取其中三项——“预期的显著积极化”“长期化的货币宽松政策（及其背景）”“信用的显著增加（及其背景）”——加以讨论。

预期的显著积极化

首先，谈谈“预期的显著积极化”。

即使股价、地价显著上涨，人们也不认为那是异常现象（泡沫），而认为（凭日本经济的实力）那是理所当然，并预期股价、地价还会进一步上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社会就存在着这样的氛围，而这成为使泡沫产生并膨胀的一大原因。白川所说的“预期的显著积极化”，概括起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不妨这样理解。

白川所列举的带来这种“预期的显著积极化”的因素有：①日本经济宏观表现好（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而物价上涨率又低）；②从企业、产业层面看国际竞争力强（汽车、半导体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常收支大幅顺差；③日本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感

的提高（无论资产增加额还是余额占比，1988 年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世界第一）等等。

“如今这已令人难以置信”——这是 2018 年出版的《中央银行》一书中作者的话。这句话说的正是：当时的日本经济就处在那样的状况之下。

而且，那样的状况，似乎也反映在当时政策当局及其周围的人的感觉之中。

若要举出有代表性的例子，那就是“前川报告”。

这是“面向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于 1986 年 4 月提交给内阁总理大臣的报告书。该研究会是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应美国纠正经常收支失衡（美国大幅逆差、日本大幅顺差）的强烈要求而设立的；报告书以担任研究会会长的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之名，通称“前川报告”。

这份报告书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扩大内需”“向与国际相协调的产业结构转型”“改善市场准入”“促进产品进口”等等（全然不指出失衡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方面的制度与行为，也不触及把贸易失衡当作两国间问题来把握等经济学上的错误）。尽管如此，它（不仅响应美国的要求，也响应了时代的要求）被政府接受了；（虽然也有来自经济学者的批判，）媒体等一般社会舆论也接受了它。

这份“前川报告”背后的思想与时代认识，是这样的：“〔日本〕如今已在国际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必须履行与我国的经济地位相称的职责，谋求与世界经济的协调共存”，“也期望企业采取自觉承担国际责任的行动”（引号内引自报告书）。从这份报告书中，可以感受到“自信满满的日本”这一印象。

再举一例：当时人们广泛阅读的一本书——《日本第一》。原书出版于 1979 年，同年就在日本翻译出版，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教授）。正如书名所示，该书高度评价了当时取得瞩目发展的日本，书的副题作“给美国的教训”。

该书高度评价日本人的勤勉、高涨的学习热情、优秀的官僚队伍、出色的企业经营等等，据说在日本国内也卖出了数十万册。

顺便一提，关于日本的企业经营，该书把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内部福利的完善、不追求眼前利益、致力于长期利益的经营姿态等等，评价为带来日本经济成功的因素（说来讽刺，这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无一例外地在“结构性改革”之下遭到否定，如今几乎已销声匿迹——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以后论及）。

无论如何，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本读起来心情舒畅的书，可以认为它促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的“预期的显著积极化”（也就是说，也成为泡沫产生、膨胀的一个原因）。

长期化的货币宽松

接下来，谈谈“长期化的货币宽松政策”。

为抑制第二次石油危机（伊朗政变引发的原油价格高涨）带来的物价上涨，日本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公定贴现率）在 1980 年 3 月已上调至 9%。这一利率随着事态的平息而逐步下调，降至 5% 是在 1983 年 10 月。其后，公定贴现率时隔两年零四个月下调至 4.5%，那是在 1986 年 1 月，这是为了应对在广场协议（1985 年 9 月）前后急速推进的日元升值，以及随之而来的景气下行（1985 年 7 月～）。此后，公定贴现率又下调了四次，到 1987 年 2 月，已降至当时史上最低水平的 2.5%。

这里成为问题的是：此后，2.5%这一史上最低的公定贴现率水平被长期维持了下去。直到1989年5月才上调至3.25%，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图表2-6）。这场旷日持久的货币宽松，招致银行贷款的大幅增加，使民间流通资金量以每年超过10%的势头激增，从而招来了泡沫，这一点是确凿的（图表2-7）。

于是，一个疑问冒了出来：为什么日本银行的货币宽松（2.5%这一史上最低的公定贴现率水平）持续了那么长时间？难道不应该更早——比如在民间持有资金量的增长显著加快的1987年年中到1988年期间——就转换政策吗？就是这样一个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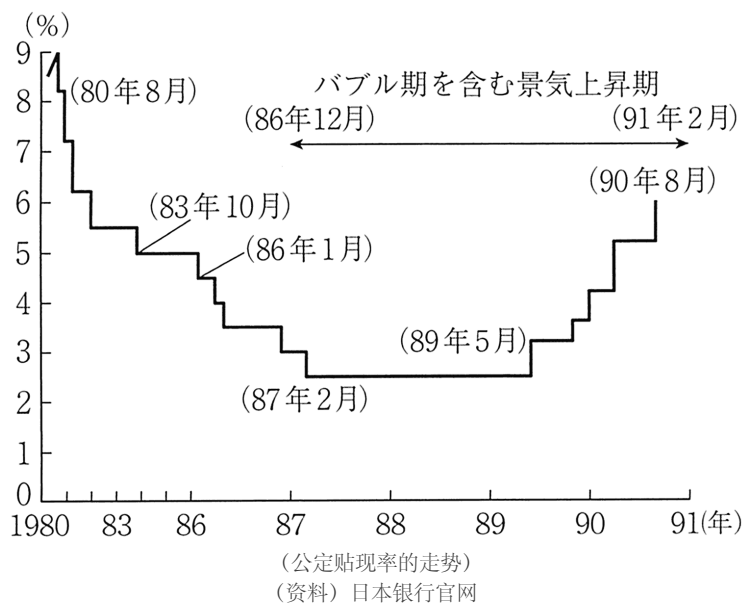
其理由，可以想到三种情形。

其一，是1987年10月美国发生的股价暴跌（黑色星期一）的影响。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FRB（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调政策利率，向市场供应大量资金加以应对（结果在较短的时间内平息了危机）。在那样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无法为了防范本国泡沫于未然而上调政策利率——就是这么回事（日本上调利率会招致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有可能放大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不信任）。

其二，那么，黑色星期一引发的不安状态暂告平息的1988年下半年以后又如何呢？然而，当时还横着一个问题：预定于1989年4月开征的消费税。

开征一般消费税（增值税），是自民党政权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致力的政策课题，然而其引入的尝试曾两度受挫。第一次是1979年（大平正芳内阁）。不仅在野党反对，零售业界和消费者团体等也强烈反对；一般消费税已经内阁会议决定，大平首相却在选战正酣之际宣布放弃引入。第二次是1987年（中曾根内阁）。虽然向国会提交了销售税法案，但在同年春天的参议院补选和统一地方选举中自民党出现退潮迹象，法案一次也未经审议就成了废案。

图表 2-6 泡沫景气前后的金融政策



图表 2-7 泡沫期（1987～90 年）呈现异常高增长的民间资金量



1987 年 11 月诞生的竹下登内阁，在 1988 年 12 月的国会上以强行表决使消费税法成立，并定于 1989 年 4 月起实施。在此之前，有着这样的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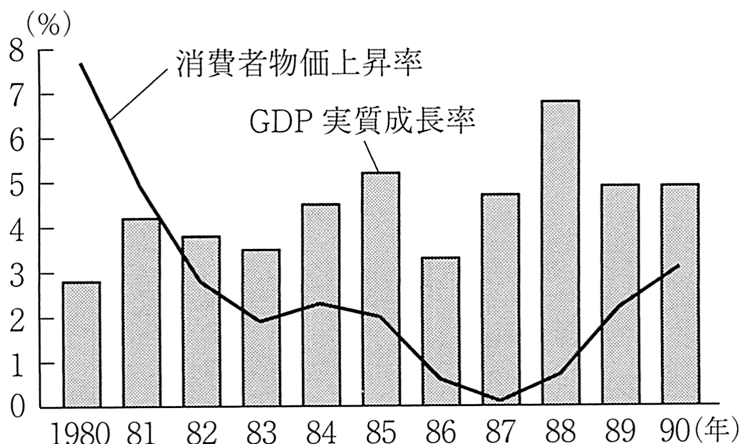
可以说，开征消费税是自民党政权（和大藏省）的夙愿；在其付诸实施之前，日本经济必须保持平稳，可能引发泡沫破裂等混乱的金融政策变更还是避免为好。当时的日本银行（领导层，或是工作人员）有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现实中，日本银行决定“将公定贴现率上调至 3.25%”这一政策，是在开征消费税一个月后的 1989 年 5 月。

其三是，日本银行在决定政策时最为重视的物价，在此期间的走势极为稳定。

如图表 2-8 的 GDP 实际增长率所示，泡沫期的八十年代后半期，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影响下经济持续较高增长，而消费者物价的上涨

图表 2-8 1980 年代的 GDP 实际增长率、物价上涨率的走势



（資料）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総理府「消費者物価

（資料）内閣府《国民经济核算》、总理府《消费者物价指数》

率 1986 年为 0.6%、1987 年为 0.1%、1988 年为 0.7%，停留在极低的水平。其背景在于，随着日元升值的推进，原燃料等进口品的价格在下跌。从物价稳定得到充分保持的状况来看，完全没有改变金融政策的理由。事情正是如此。

信用的显著增加

在上述状况下，货币宽松政策长期化了，而在其之下发生的，是金融机构的贷款行动变得极为积极，其结果是民间持有的资金量显著增加。这种状况前面已经看过（图表 2-7）。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时期银行的行动会变得如此积极。

泡沫期之前那个年代（七十年代以前）的银行，以稳健著称，甚至被揶揄为“敲了石桥也不过河”。发放融资时，它们会慎之又慎地反复研究，而这背后有着足以称为“银行经营铁律”的东西。这里试引一例。

这是 1927 年昭和金融恐慌之际，当时一家大银行的行长向因合并而新成为行员的人们发出的寄语。

如今由我在诸位面前讲论银行，颇有在释迦面前讲经说法之嫌，但许多银行似乎认为只要收进存款、再把它贷出去就行了，因此我才要把这个道理

讲给诸位听。在我看来，银行的营业，是以自己的资本金及公积金为基础，收存公众的资金，将其切实运用，给存款者以相当的利益（即利息），自己也从中取得利差，以为股东谋取利益为目的。因此，凡身为银行家者，必须为了股东及存款者，以善良管理者的用心，对贷款及其他资金的运用付出周到的注意，诚实地处理其事务。

因此，在发放贷款之时，须始终以向正经的工商业供给资金为念；倘若是用于投机图利的资金，则绝对必须避开。即使是工商业的资金，其回收的前景也必须确实可靠。此外，担保即使具有相当的价值，若它是不动产，或是为了用作不动产的投资资金，亦不得贷放。

（中略）

这些事理都是再明白不过的，此时此刻似乎无需特意再讲；但人往往因为不遵守那些再明白不过的事而容易出错，所以在诸位成为〇〇银行行员之初，我才要不厌其烦地说出这番心意。失礼之处，尚祈

海涵为盼。

（摘自旧第一银行内部资料）

这篇寄语发表的昭和金融恐慌当时及其后自不必说，战后很长时期里，这里所说的内容作为“银行的常识”，不仅为银行经营者，也为众多银行职员所共有。

尽管如此，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其背景，可以认为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银行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

也就是说，首先，①每年增长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转入低增长（即便如此，八十年代的日本仍有5%左右的增长，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是高增长经济）的时代，企业设备投资等资金需求的增长减弱了；加之，②企业的自有资本积累有所进展，对外部资金的依存度下降；更有，③债券市场不断发展，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增资、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由于这些情况，向银行借入资金的需求减弱了。

作为这些变化的必然结果，银行之间的贷款竞争日趋激烈，而在其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是拥有众多亲密交易客户的大型（旧财阀系）银行。

此外，在地方企业中拥有扎实的交易基础的地方银行，也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为来自交易客户的融资请求，首先会投向这些银行。

相反，不具备这些条件的金融机构，经营变得严峻起来。例如，承接亲密交易银行（主办银行）无法承接的那部分长期资金需求的长期信用银行、坐落于经济实力薄弱地区的地方银行（或第二地方银行）、坐落于大都市圈的中小金融机构（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

此外，七十年代以充实面向个人的住宅金融为宗旨、由大藏省主导设立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住专），也因母行资金变得宽裕、母行开始自行经营住宅贷款并加以扩大，而陷入了严峻的境地。

股价泡沫、地价泡沫，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对于业务规模无法扩大、正在摸索突破口的众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金融机构来说，泡沫的发生以及在此之下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不啻为“千载一遇的良机”。

就这样，发生了激烈的贷款竞争，民间资金量显著增加，而这又使泡沫进一步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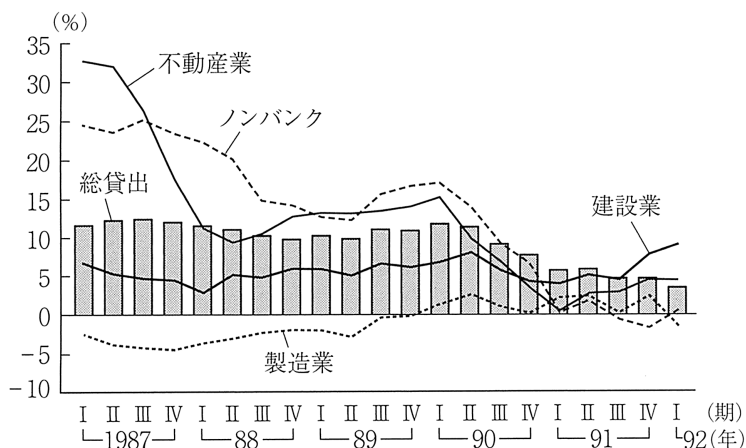
3 金融政策、金融监管的转变——走向泡沫破裂

使泡沫破裂的，就股价泡沫而言，是日本银行金融政策的转变：上调公定贴现率。此外，就地价泡沫而言，是大藏省金融监管的转变：启动不动产融资管制。

金融政策的转变、股价泡沫的破裂

日本银行以消费税开征的次月，即 1989 年 5 月，将公定贴现率上调至 3.25% 为开端，10 月上调至 3.75%，12 月上调至 4.25%，接连实施了上调。进而，跨年之后于 1990 年 3 月上调至 5.25%，8 月又进一步上调至 6.00%（图表 2-6）。这是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合计五次、总计 3.5 个百分点的公定贴现率上调。与此同时，存款利率也被上调（这方面要经过利率调整审议会审议、由大藏大臣发布告示），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成本大幅上升，为反映这一成本，贷款利率也随之上调。

图表 2-9 分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的走势



(备注) 1. 贷款余额=全国银行银行账户+全国银行信托账户

2. 各项贷款余额均追溯包含第二地方银行协会加盟行的部分。

但面向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截至 90 年 1~3 月

不含第二地方银行协会加盟行的部分

3. 面向非银行机构的贷款余额，以其他金融业+物品租赁业
算出

(出所) 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1992年版)》

在这样的金融政策转变之下，股价以 1989 年年末为顶点，进入 1990 年后开始大幅下跌（图表 2-1）。

不动产融资管制的启动、地价泡沫的破裂

另一方面，即使金融政策发生了转变，地价泡沫也仍在继续。按国土交通省的公示地价（各年年初的价格，全国平均）来看，1989 年年初至 1990 年年初仍在上升，直到 1991 年才转为下跌。

带来这一下跌（即地价泡沫的破裂）的，是 1990 年 3 月由大藏省银行局长向全国金融机构发出的题为《关于抑制土地相关融资》的通知。这是“把面向不动产的贷款增长率压到总贷款增长率以下”“要求提交对不动产业、建筑业、非银行机构融资的实况报告”的“行政指导”。地价泡沫的背景，是对不动产业、非银行机构（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信贷公司、住专等）等的融资在增加（图表 2-9），因此对这些机构的融资实施了管制，这一举措的影响很大。

这项行政指导于 1991 年 12 月解除，但那就已经足够了。破裂过一次的泡沫不会轻易再膨胀起来。此后，地价的下跌一直持续到二〇一〇年代初。

时代就此转入九十年代——泡沫的反动萧条发生的年代。

第三章 泡沫破裂后的七年（1990～1997 年）

九十年代初到中期，是国内外都发生剧变的时代。1990 年，在原苏联和东欧圈，东西两德实现统一，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中东方面，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次年 1991 年，以美国为主力的多国部队空袭了伊拉克。这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苏联解体。

在日本，1993 年 7 月的大选中，新生党、日本新党、先驱新党等新党崛起，自民党议席未过半数，社会党议席也减半，“1955 年体制”崩溃。8 月，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八党派联合内阁诞生。1995 年 1 月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3 月发生地铁沙林事件，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从经济动向看，股价泡沫破裂（1990 年），地价泡沫也破裂（1991 年），受其影响，景气进入下行局面（1991 年 3 月～）。这也是经济发生剧变的时期。

1 旷日持久的景气下行期

1990 年初股价泡沫破裂，尽管股价大幅下跌（以日经平均指数看，从 1989 年末的 38000 日元水平跌至 1990 年末的 23000 日元水平，跌幅近 40%），但纵观 1990 年全年，经济活动水平仍然很高（参见图表 1-1），1990 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也达到 4.9%（图表 1-14）。

景气转入下行局面是在 1991 年 3 月（图表 1-1、1-3）。

不过，转入下行后的下滑很急（图表 1-1），持续时间也很长（至 1993 年 10 月，共 32 个月。图表 1-3）。下行期长达 32 个月，如前所述，实际上是战后日本经济中最长的。

大型景气对策的实施——公定贴现率降至史上最低水平

当然，这期间政府并没有对景气的走向袖手旁观。宫泽喜一内阁（1991 年 11 月～1993 年 8 月）、细川内阁（1993 年 8 月～1994 年 4 月）、羽田孜内阁（1994 年 4 月～6 月）、村山富市内阁（1994 年 6 月～1996 年 1 月）——在政局剧变之下，内阁一个接一个地更替，但各届内阁总共推出了七次大型景气对策（图表 3-1）。其中有的已是在景气进入回升局面之后才出台的（图表 3-1 中的下面三项），其事业规模据信多因顾及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而有所夸大，但为把经济从下行局面中拉上来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图表 3-1 泡沫破裂萧条下的经济对策概要

	事业规模	具体对策
紧急经济对策 1992 年 3 月 31 日		1. 促进公共投资的实施（提高上半年签约率）2. 促进住宅建设（扩大住宅金融公库融资等）3. 扩大民间设备投资（追加电力、燃气等设备投资等）
综合经济对策 1992 年 8 月 28 日	10 万 7000 亿日元	1. 扩大公共投资 2. 提前取得公共工程用地 3. 促进住宅建设（扩大公库融资）4. 中小企业对策 5. 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6. 活跃证券市场等
新综合景气对策 1993 年 4 月 13 日	13 万 2280 亿日元	1. 促进公共投资的实施 2. 扩大公共投资 3. 提前取得公共工程用地 4. 促进住宅建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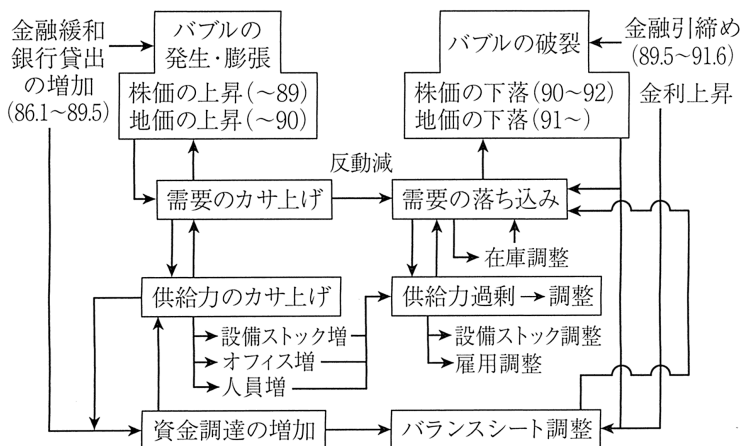
	事业规模	具体对策
		设（扩大公库融资等、住宅减税）
紧急经济对策 1993 年 9 月 16 日	约 6 万亿日元	1. 推进放松管制（放宽 94 项政府管制）2. 回馈日元升值差价收益（公共收费的差价回馈）3. 推进社会资本建设
综合经济对策 1994 年 2 月 8 日	15 万 2500 亿日元	1. 实施减税等（所得税·居民税减税 5 万 4700 亿日元）2. 扩大公共投资 3. 促进住宅建设 4. 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紧急日元升值·经济对策 1995 年 4 月 14 日	约 7 万亿日元	1. 提振内需对策（编制 1995 年度补充预算、积极实施公共工程等）2. 提前实施放松管制、促进进口对策等 3. 回馈日元升值差价收益与下调公共收费等 4. 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经济对策 1995 年 9 月 20 日	14 万 2200 亿日元	1. 扩大公共投资 2. 提前取得公共工程用地 3. 阪神·淡路大地震复兴对策费等 4.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相关对策 5. 进一步推进放松管制

除了这些主要来自财政面的政府景气对策之外，金融政策方面也多次出台了对策。日本银行以 1991 年 7 月将公定贴现率由 6% 下调至 5.5% 为开端，此后又连续八次下调，自 1995 年 9 月起降至 0.5%，达到史上最低、也是当时各国都没有先例的水平。

尽管如此，景气下行期还是拖得极长。

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先把泡沫期发生的、以及泡沫破裂后发生的事情整理一下（图表 3-2）。

图表 3-2 泡沫的产生、膨胀与破裂——对景气的影响



泡沫期发生的事情

先说泡沫期发生的事情。

①有过旷日持久的货币宽松，银行贷款随之增加。接着，②股价、地价泡沫发生并膨胀。把泡沫产生、膨胀的时期看作 1986～1989 年，试算这四年间股价、地价的增值额，可得股价 567 万亿日元、地价 1162 万亿日元的数值（图表 3-3）。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约 400 万亿日元，也就是说，股价与地价合计起来，每年都有与 GDP 同等规模的资产价格上涨。③当然，这个数字只不过是计算上的增值额，但无论如何，有了如此规模的资产价格上涨，其中一部分或相当部分想必转化为需求的增加，抬高了民间消费支出、住宅建设等。④要应对这样的需求增加，供给侧（主企业需要抬高供给能力。提升设备能力、扩充办公场所、确保人手等都付诸实施。这本身也是使需求进一步增加的因素。⑤要抬高供给能力，就需要筹措新的资金；而在货币宽松长期化、银行保持积极融资姿态的情况

下，（而且是低利率的）筹措充足资金是可能的；⑥这又进一步与股价、地价的上涨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泡沫期发生的事情。泡沫景气最盛期 1988 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达 6.8%，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以来的最高值，这也可以理解了。

图表 3-3 资产价格年度变动幅度的走势

①泡沫期（1985～90 年）（单位：万亿日元）

	85	86	87	88	89	90	产生·膨胀期（86～89 年）	累计
股价	34	121	75	177	194	△307		567
地价	73	251	452	165	294	226		1162

②泡沫破裂后（1991～99 年）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股价	△13	△141	28	73	△2	△42	△41	△69	193
地价	△194	△216	△95	△63	△88	△39	△44	△63	△91

反动萧条期（91～93 年）累计

	累计
股价	△126
地价	△505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不过，①依据旧 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②依据新 SNA。△记号表示下跌

泡沫的反动萧条期发生的事情

其次来看泡沫破裂以后。这次发生的是与泡沫期完全相反的事情。如图表 3-3 所示：①股价、地价大幅下跌（1991～1993 年的三年间，贬值额合计 631 万亿日元，试算约为每年 GDP 的一半）；②受此影响，需求大幅减少；③日本经济陷入不得不进行库存调整、设备存量调整、雇用调整的境地。

与此同时，④依靠银行借款购入股票、土地等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购入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而借款额——必须偿还的

金额及其利息额——不变，还款负担变得极为沉重。于是又并发了被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复合萧条的萧条，⑤景气整体的下滑因此更加严重，下滑时间也拖长了。这就是随泡沫破裂一同发生的事情。

日元升值的推进、进口的激增

持续达三十二个月、战后史上实际为期最长的泡沫的反动萧条，结束于 1993 年 10 月。同年 11 月起景气走向回升，但与以往的回升期相比，这一回升十分迟缓。从 GDP 实际增长率来看，1993 年为-0.5%，1994 年为 1.0%。不从景气上升、下降的角度看，而从经济活动水平（繁荣·萧条）的角度看，到 1994 年为止仍属萧条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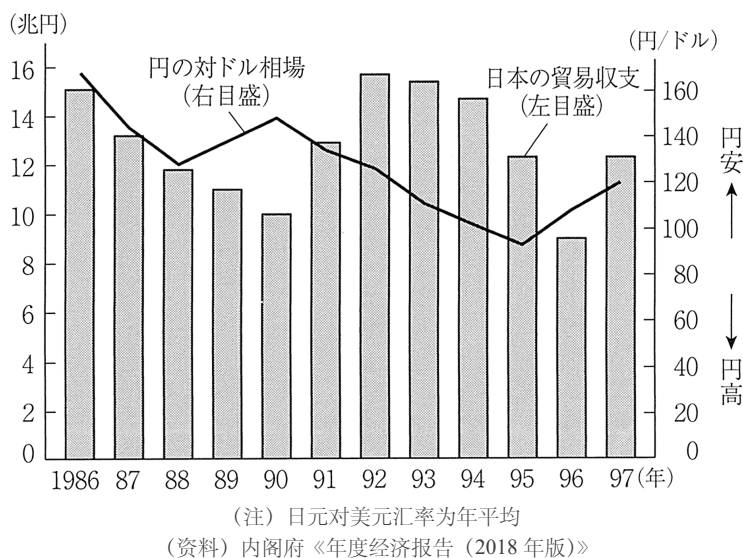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泡沫的反动萧条拖得极久，这一认识也反映了景气回升期回升力很弱的事实。

不过，回升力弱也有相应的原因。那就是日元的急剧升值，以及以此为背景的进口激增。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泡沫初期曾急速升值，但从 1987 年到 1990 年，大致在 1 美元兑 130～145 日元附近波动（图表 3-4）。而泡沫破裂以后，即 1991 年以后，汇率开始朝日元升值的方向移动，1993 年以后步伐加快，1990 年时为 1 美元兑 144 日元，到 1995 年冲入了 90 日元区间。

泡沫的反动萧条正在推进、日本经济实力下滑之际，日本货币日元的价值却在上升，乍一看是奇怪的现象，但这也有相应的理由。随着景气下行，日本的进口大幅减少，贸易收支顺差扩大。1990 年为 10 万亿日元，到 1992 年达 15.7 万亿日元，1993 年达 15.4 万亿日元，大幅顺差持续。市场关注的不是日本的景气，而是贸易收支的顺差。

图表 3-4 日元对美元汇率与日本贸易收支的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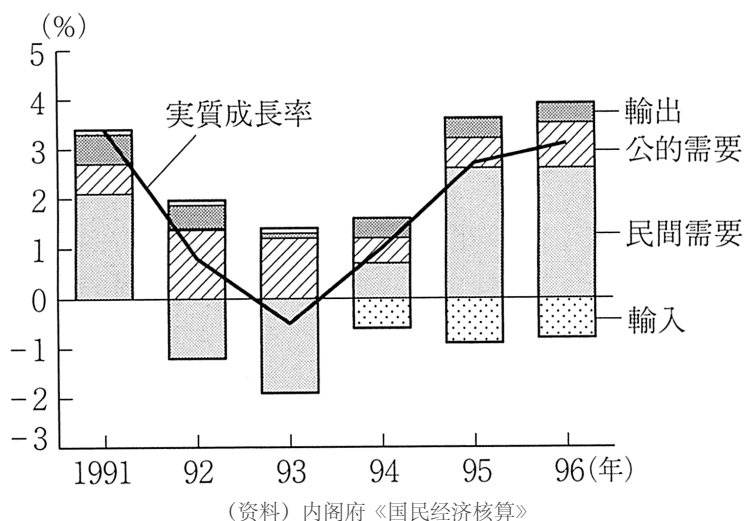
而在日元这样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出口除 1993 年外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进口却大幅增长(按实际同比看,1994 年 8%、1995 年 23%、1996 年 11%),拉低了 GDP 实际增长率的升幅(图表 3-5)。

此外,看一看汇总了泡沫破裂后 GDP 实际增长率走势、以及各需求项目对增长贡献度的图表 3-5,这期间日本经济的走势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些虽已写过,还是重新确认一下。

①泡沫破裂后,日本的景气从 1991 年 3 月进入下降局面。不过,1991 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达 3.4%,仍然很高。国内民间需求以 2% 强的增长贡献度支撑着景气。

②但进入 1992 年,民间需求的增长贡献度转为负值。原因是民间需求中的民间消费支出、住宅建设出现下滑。在民间需求这样下滑的情况下支撑景气的,是公共投资等政府部门需求的增加(景气对策的效果)。即便如此,这一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还是降至 0.8%。

图表 3-5 GDP 实际增长率及其贡献度的走势①



③进入 1993 年，民间需求的下滑进一步扩大（贡献度-1.8%）。1992 年同比还是正值的企业设备投资、库存投资，1993 年也转为负值。填补民间需求下滑的，这一年仍是政府部门的需求。但未能完全填补民间需求的下滑，这一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为-0.5%（这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 1974 年以来、战后日本经济的第二次负增长）。

④不过，从景气动向指数来看，景气于 1993 年 10 月触底，11 月起开始走向回升（参照图表 1-1、1-3）。

⑤1994 年是景气回升之年。民间需求的贡献虽小，但转为正（民间消费支出、住宅建设同比为正，企业设备投资仍为负。库存投资贡献度为零=过剩库存调整结束）。政府部门需求继续为正。不过，这大概反映了日元升值，进口增加在 GDP 统计上成为负贡献，拖了景气回升的后腿。1994 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为 1.0%，作为景气回升的第一年，这个增长率是偏低的。从经济活动水平的角度看，景气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

⑥1995 年，年初虽有阪神·淡路大地震这一冲击，但凭借景气回升初期强劲的回升力挺了过来，民间需求的正贡献大于前一年（民间消费支出持续恢复，设备投资、库存投资等企业部门的需求也增加）。政府部门需求也增加。不过，日元持续升值使进口的高增幅延续，压制了 GDP 实际增长率的升幅。这一年的增长率为 2.7%。

⑦1996 年。延续了与前一年相同的状况。GDP 实际增长率为 3.2%。

2 1993 年 11 月以后，景气毕竟仍在走向回升

上一节逐年考察了泡沫破裂、景气开始下行之后经济的历程。这里想再次确认的是：1994 年以后，景气的走向确实已经改变，景气好歹已开始朝着回升的方向移动（至少到 1996 年为止）。

1991 年至 1993 年的景气下滑极为严重，而且景气下行的时间极长。这两点都确实如此。此外，进入回升局面后，回升的步伐也很缓慢。这也确实如此。不过我们也已看到，这其中有相应的理由。那是在空前的泡沫景气之后。下滑严重、历时长久，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吗？

此外，回升过程中还发生了急速而大幅的日元升值（战后首次跌破 1 美元兑 100 日元）。进入回升局面后回升速度这么慢，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

此外还有最后一点：若进展顺利，1997 年本是 GDP 实际增长率超过 1996 年、景气回升有望进一步全面展开的一年。

1997 年本是可以预期进一步回升的一年

也就是说，1997 年存在以下景气回升的加速因素。

第一，日元升值的进程在 1995 年跌破 1 美元兑 100 日元之后停止，1996 年已转回日元贬值的方向（图表 3-4）。如果照这一趋势日元继续贬值（事实上也确实继续贬值，日元兑美元汇率 1996 年为 108 日元，1997 年为 120 日元），1997 年出口的增长就会加快，进口的增长会受到抑制，本应发挥推高 GDP 实际增长率的作用。

第二，民间需求的增长，1997 年也有可能高于 1996 年。其一是民间消费支出。作为消费本钱的收入，从工薪家庭的收入与可支配收入来看，1997 年的增长均超过了 1996 年的增长（图表 3-6）。从收入面的这种动向推测，1997 年民间消费支出的增长很可能超过 1996 年（事实上，从结果看名义消费的增长也高于 1996 年）。这一点本应也发挥推高 1997 年 GDP 实际增长率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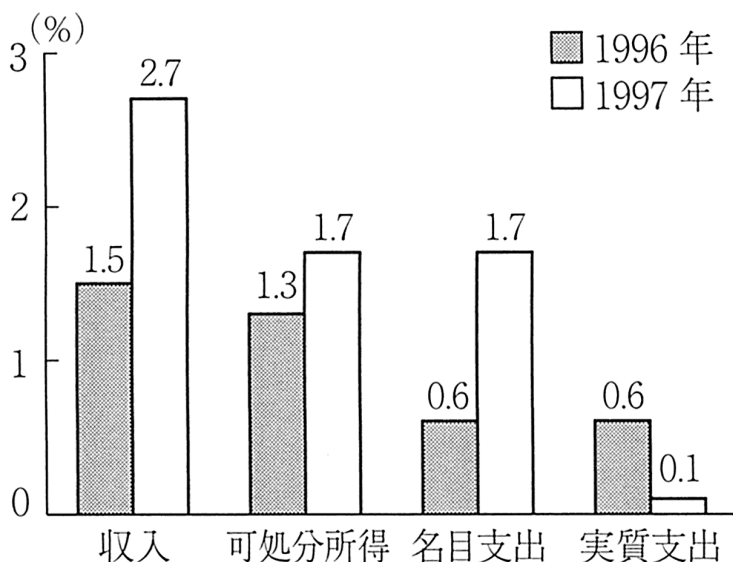
再看消费面，泡沫期膨胀起来的大型零售店销售额与新车登记数量的动向，在 1994 年、1995 年前后回到了以往的趋势线上，1995 年、1996 年已沿着以往的增加趋势不断增长（图表 3-7）。当时的情形使人觉得，1997 年大型零售店销售额与新车登记数量的数字落在这条线的延长线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还有一点，是企业的库存投资与设备投资。过剩库存的调整被认为在 1994 年内已经结束，库存投资在 1995 年、1996 年较上年略有增加。过剩设备的调整，也在经历了 1992 年至 1994 年实际设备投资同比下降的调整期之后，于 1995 年、1996 年转为同比增加。如果 1997 年出口、民间消费支出等需求的增长稳健，就可以预期 1997 年企业投资的增长超过 1996 年。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始于 1993 年 11 月的日本经济景气回升，本应在 1997 年也继续下去（非但如此，还应真正全面展开）。

然而现实是，“本应如此”的事情没有发生。景气的走向在 1997 年 6 月骤然一转，进入下行局面。

图表 3-6 1997 年消费本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注）均为工薪家庭平均的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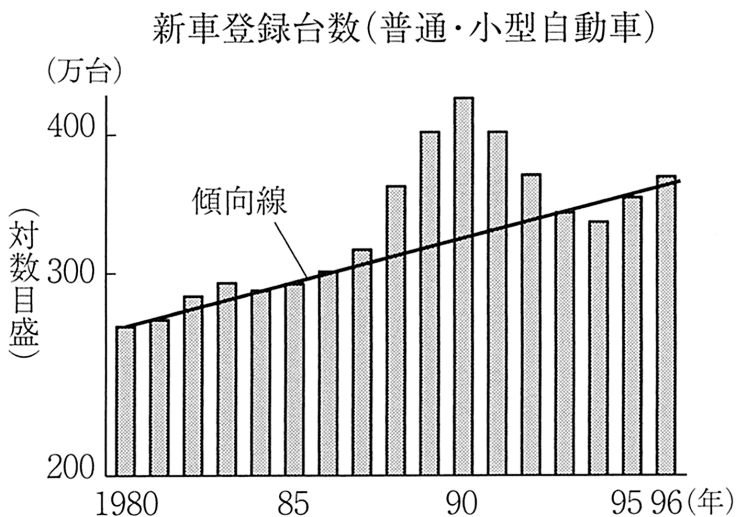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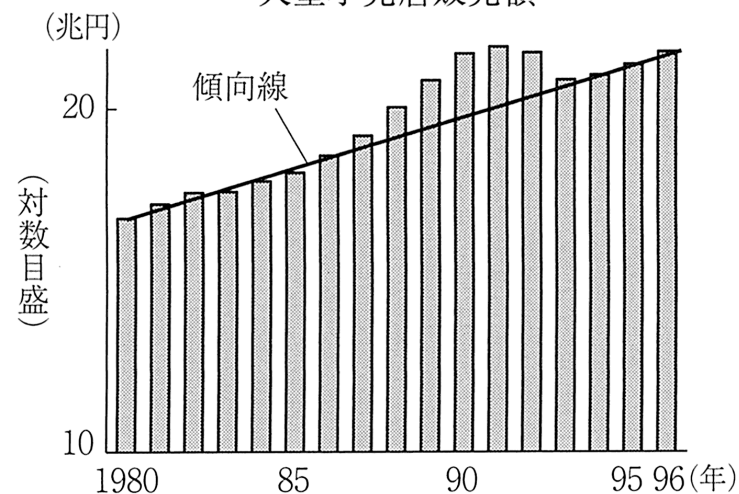
（出所）山家悠纪夫《“结构改革”这一幻想》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将在下一章即第四章中考察。

3 金融破产的发生与不断高涨的危机意识

在九十年代初至中期的日本，除了从泡沫的反动萧条走向回升这一景气动向之外，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大动向。其一是，进入九十年代泡沫破裂后，金融机构的融资变成不良债权、无法回收，尤其在中小金融机构等处发生了经营破产。其二是，出现了对日本经济前景的危机意识，而且这种危机意识显著高涨（这种高涨异乎寻常，或许该称之为“危机意识的泡沫化”的状况）。

图表 3-7 泡沫期需求的增加及其后的减少



(注) 大型零售店销售额为 1995 年价格（按消费者物价折算的实际值）

(出所) 山家悠纪夫《虚假的危机 真正的危机》

不良债权总额 40 万亿日元，也有金融机构陷入经营破产

在泡沫破裂、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地价大幅下跌的状况下，许多在泡沫期积极扩大不动产相关融资的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不良债权（已无望回收的融资，以及变得难以指望回收的融资等）。

1992 年 4 月大藏省公布不良债权总额约为 8 万亿日元，其中无担保、无保证的金额约为 3 万亿日元（截至 1992 年 3 月末停止付息六个月以上的逾期债权本金。对象为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共 21 家）。

此后，对象金融机构不再限于主要 21 家银行，而是扩大到地方银行等乃至农协、信用金库的所有吸收存款机构，不良债权的定义也随之扩展（不仅包括破产债权、逾期债权，还纳入减免利息债权等），按此口径重新公布不良债权总额，截至 1995 年 9 月末为 38 万亿日元。

而且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若干陷入经营破产的金融机构：1994 年的东京协和信组^①、安全信组，1995 年的科斯莫信组（东京都内最大的信组）、木津信组、兵庫银行等。

其中，1994 年的东京协和、安全两信组，采取的方式是，由作为承接银行而设立的东京共同银行（由大藏省与日本银行协商、日本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出资设立）接手其资产与负债等，不良债权则另行出售；1995 年的科斯莫信组，也由东京共同银行接手；木津信组因资不抵债金额巨大，东京共同银行无力应对，于是将东京共同银行改组为整理回收银行（现整理回收机构），由其接手；兵庫银行则在获得当地与金融界协助后，新设绿银行作为承接银行接手业

① 信组，即“信用组合”，日本面向中小企业与个人的合作制金融机构，规模小于信用金库。——译注

务，等等。虽然每一起在敲定之前都几经周折，但最终都得到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科斯莫信组经营破产之际，还曾一度发生储户蜂拥涌向柜台之类的骚动。

继这些事件之后，1995 年至 1996 年又发生了“住专问题”。

“住专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

住宅金融专业公司（住专），是七十年代在住房资金需求旺盛的背景下，由大藏省主导、各金融机构出资设立的住房金融专业的非银行机构（图表 3-8）。它的主要职责，是从作为母体的金融机构等获得融资，再向个人提供住房贷款。七十年代仍是企业资金需求旺盛的时代，对于小额且期限长的个人住房贷款，当时的银行等几乎没有余力去经营。在那样的时代，住专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证券市场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筹资的渠道扩大，银行对企业融资的扩张步伐放慢。伴随这一变化，银行开始把目光投向能获得相对较高利息收入的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并倾力扩大贷款。结果，住专的个人住房贷款市场逐渐缩小。

图表 3-8 住专（住宅金融专业公司）7 家公司概要

公司名	成立年月	主要大股东
日本住宅金融（股份）	71 年 6 月	樱花银行、三和银行、三井信托银行、东洋信托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旭日银行等
（股份）住宅贷款服务	71 年 9 月	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旭日银行、东海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
（股份）住总	71 年 10 月	7 家信托银行
综合住金（股份）	72 年 7 月	东京相和银行、爱知银行、名古屋银行、近畿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

(续表)

公司名	成立年月	主要大股东
日本住房贷款（股份）	76 年 6 月	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大和证券、日兴证券、山一证券等
第一住宅金融（股份）	76 年 6 月	野村土地建物、日本 Landic、野村证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
地银生保住房贷款（股份）	76 年 6 月	日本生命、第一生命、住友生命、朝日生命、明治生命、静岡银行、北陆银行等

在这种情况下，住专各公司转而向不动产业界等领域扩大融资。八十年代后半期是地价泡沫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扩张起来的不动产融资，随着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跌而变成了不良债权。进入九十年代后，住专各公司所直面的，正是这

样的问题。

在此期间，尤其成问题的，是 1990 年 3 月针对金融机构的“不动产融资管制”（行政指导）（参见第二章第 3 节）。

这项对刺破地价泡沫起过作用的“行政指导”，是对①金融机构的、②面向不动产业的融资（对不动产业、建筑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加以管制的措施，但它存在这样的问题：①的金融机构中不包含农林系金融机构，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不包含住专（不知何故，其理由至今仍未弄清）。

结果，自这项“行政指导”实施以来，大量资金①从农林系金融机构、②流向住专，再由住专贷放给不动产业界。此时已是地价泡沫的末期（地价已经相当高）。紧接着，就是地价泡沫的破裂。这一时期住专的不动产融资几乎全部成为不良债权，这是毋庸置疑的。

住专七家公司的损失合计估算为 6.4 万亿日元，而成问题的是，这笔损失该由谁来负担。方案有两个：一是让出资于住专的母行负担；二是让贷款方（包括母行在内的贷款方）负担。但最终以“修正母行主义”的形式，

决定由母行与一般银行（贷款方），再加上农林系金融机构来负担。具体而言，母行 3.5 万亿日元、一般银行 1.7 万亿日元、农林系金融机构 5300 亿日元（被视为其负担能力极限的金额），对超出农林系负担能力的 6850 亿日元则投入公共资金——这一方案经内阁会议决定。这是 1995 年 12 月的事。此外，内阁会议还一并决定：让住专七家公司实质性破产、消亡，新设“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由其负责住专七家公司的债权处置。在审议这一处理办法的 1996 年“住专国会”上，围绕公共资金投入的反对意见也很强烈，但最终还是以这一方案尘埃落定。

围绕“住专处理”投入了公共资金，对此事的批判十分强烈，而这成为后来政府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际应对迟缓的诱因（关于 1997 年的金融危机，将在下一章说明）。

对财政的危机意识的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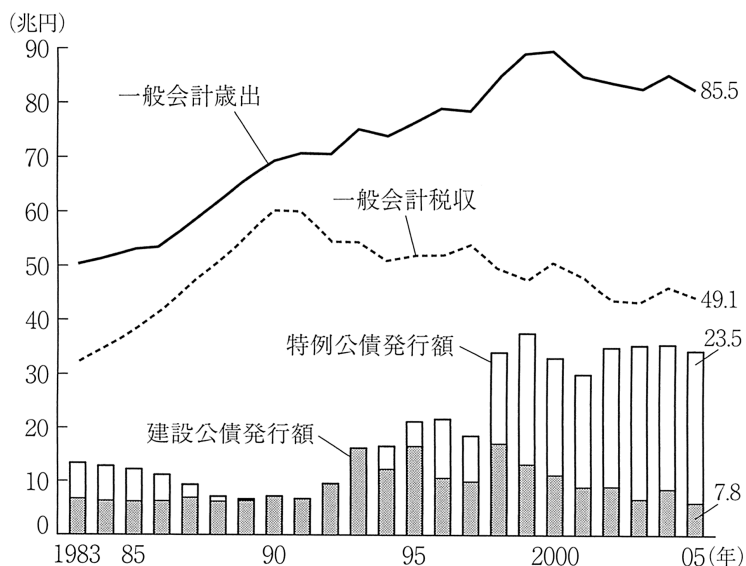
第二个方面，即对日本经济的危机意识的高涨，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日本财政的危机意识的高涨，其二是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危机意识的高

涨。

在泡沫时期，对财政赤字的关注相当淡薄。因为应美国的强烈要求扩大了公共投资，政府支出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但税收增长也足以弥补这部分支出，财政赤字反而在缩小（图表 3-9）。

堪称泡沫破裂刚过不久的 1991 年版（1991 年 8 月提交内阁会议）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经济白皮书）记述道：“观察 1990 年度内的财政动向可以看到，摆脱了对特例国债（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制定特例法、并据此发行的国债）的依赖等，财政重建正在稳步推进。”

图表 3-9 国家一般会计中的岁入岁出情况



(資料) 財務省「日本の赤字を考える(2005年)」

(資料) 財務省《思考日本の赤字(2005年)》

《经济白皮书》关于财政的记述，此后直到 1995 年版，都以公共投资的景气提振效

果为中心，到 1996 年版(1996 年 7 月提交内阁会议)才首次提及财政赤字的逐年扩大、由此带来的国债发行余额的增加、其占 GDP 比重的上升等。不过，其结尾的文字是：“若政府债务不断累积，长期来看也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今后若不推进财政结构改革与经济结构改革，将来未必不会陷入种种值得忧虑的事态，对此应当铭记。”——措辞相对温和。

与对财政赤字扩大表现出冷静态度的经济企划厅相比，表现出相当强烈危机意识的，是作为财政主管部门的大藏省。面对泡沫破裂以来的①税收大幅下滑、②作为萧条对策扩大公共工程等带来的

岁出显著增加、③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国债发行额增加（图表 3-9），这或许也是情有可原的。

1995 年 12 月，武村正义大藏大臣（村山内阁）发表“财政危机宣言”；1996 年 2 月，在大藏大臣的咨询机构财政制度审议会中设置了“财政结构改革特别部会”（委员长：石弘光，一桥大学教授）；1996 年 7 月，财政制度审议会特别委员会的“中间报告”公布——应对一步步推进。与此同时，还有这样的事：已辞去大藏大臣职务的武村，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论文《这样下去国家将灭亡——我的财政重建论》（《中央公论》1996 年 6 月号）；上述委员会的“中间报告”，也以面向大众的通俗笔法

写成小册子《思考财政结构改革——把光明的未来留给孩子们》刊行（1996 年 7 月）。

就这样，财政危机意识逐渐渗透进越来越多人的心中（图表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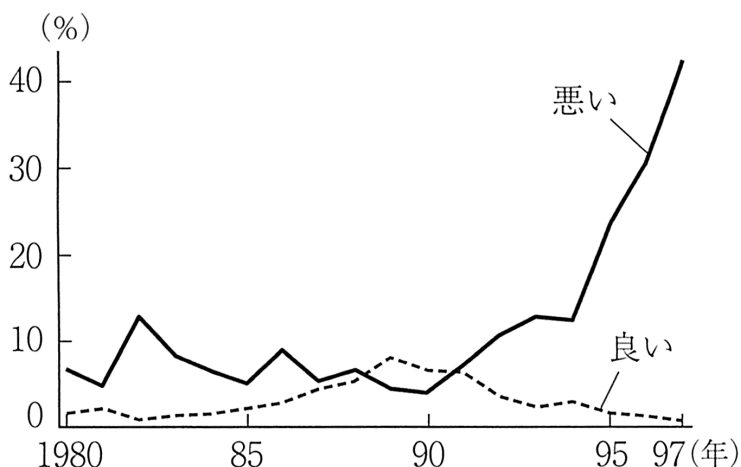
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危机意识的高涨

日本经济跟不上全球化的进展及其他剧烈的环境变化，这是危机，前景黯淡，必须进行结构改革——这类说法登场，并逐渐增强声势，正是在泡沫破裂后的景气下行不断推进、日本经济低迷长期化的过程之中。

首先登场的是“结构危机说”：日本经济的结构本身存在问题，无论出台多少景气对策都不起作用，只要不改变结构，日本经济就无法从低迷状态中脱身。

接着，在日元不断升值、产品进口持续增加的形势下，认为照此下去日本经济（制造业）将会空洞化的“空洞化危机说”登场了；几乎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高成本危机说”（即所谓的内外价格差论）——

图表 3-10 国民对国家财政的意识



- (備考) 1. 良い：日本が良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回答し、良い点に国の財政をあげた人(複数回答)の全体に占める割合
2. 悪い：日本が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回答し、悪い点に国の財政をあげた人(複数回答)の全体に占める割合

(备注) 1. 好：回答日本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并在好的方面中举出国家财政的人（可多选）占整体的比例

2. 坏：回答日本正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并在坏的方面中举出国家财政的人（可多选）占整体的比例

(资料) 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1998 年版）》

按高涨后的日元汇率换算，日本经济与他国相比属于高成本（电力价格、服务价格等偏贵），这样下去会在国际竞争中落败。

政府、民间经济学家以及报纸杂志等，开始频频议论这类日本经济危机说。各方论调几乎相同，这里就大致看一看政府的说法。

先看政府的长期经济计划。

以 1955 年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计划期间 1956～1960 年度）为开端，《新长期经济计划》（同 1958～1962 年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 1961～1970 年度）相继出台。就这样，政府每隔数年就制定一个计划期间大致为五年的长期经济计划，指出日本经济（在政府看来）应当前进的方向。

再看泡沫破裂之后：1992 年制定了《生活大国五年计划》（同 1992～1996 年度，宫泽内阁）。从其标题即可看出，该计划认为必须“站在重视生活者、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济社会的应有形态进行全面检查”；这与稍后政

府才开始使用的“结构改革”一词在含义上完全不同，从中感受不到多少“危机意识”。

情况为之一变的，是接下来的 1995 年《面向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期间同为 1995～2000 年度，村山内阁）。其中把政策运作的基本方向表述为：“我国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巨大潮流变化……正迫使我国变革。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顺应这些潮流变化，反而在某些方面成了新发展的绊脚石”，并论称“不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开辟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具体对策上，提出“重要的是在自我责任之下，让自由的个人与企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倡导“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放松管制，纠正妨碍竞争的商业惯例”等。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提倡。

再引一个当时政府论调的例子。

这就是经济企划厅的《年度经济报告（1996 年版）》。这里摘录其卷首“总论”的“结语”部分所记载的文字。

走完战后五十年的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结构调整期。……可以明确的是，迄今为止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

济政策体系都必须换挡。若是死抱住迄今为止的经济社会结构与体制不放，日本经济就没有前途。……

必须彻底贯彻自我责任原则，建立起规范市场经济的透明规则与激励机制。畏惧风险，日本经济的前途就无路可走。抱定与风险共存的觉悟，才是日本经济重振活力之路。

为避免繁杂，不再引用；但在这份《年度经济报告》中，《日本第一》所盛赞的日本经济的优点、支撑了战后发展的强项——那些被认为美国也应当借鉴的特质——统统被一句“若还抱住这些不放，日本经济就没有未来”断然抛弃。

如上所见，在对日本财政、进而对日本经济的强烈危机意识之下，政府推行了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又带来了怎样的效果（乃至结果），将在下一章以后再看。

第四章 桥本“结构改革”政策的实施及其破产 (1997~2000 年)

1997 年是在一种异样的气氛中拉开帷幕的。

1997 年 1 月 1 日，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头条的，是题为“致下一代 来自 2020 年的警钟”的连载策划的第一篇文章。

让我们浏览一下标题。“改革停滞 未老先衰”“在世界上孤立，个人陷入孤独”——这是大标题。文章中的小标题也接连是阴暗的字眼：“繁荣急转，企业衰退”“酷似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东京飘浮着死相”。同一版面上还有其他相关报道，也排列着严厉的标题：“2020 年将变成这样——经济骤暗，活力匮乏”“日经 2020 年委员会成立学者建言避免破局”。

头条文章正文的开头是：“年轻人和举家出行者兴高采烈地启程海外旅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祈愿平安的初诣风景一如往年，但就在这片景象的脚下，日本已悄然踏上通往破局的道路。经济持续低迷，跟不上自产业革命以来步入转换期的世界。支撑了战后的体系已无法正常运转。若不改革，国家将不断老化，到人口因少子化而减少的 2020 年，下一代看到的将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日本。这样的‘警钟’正从未来鸣响。”

在这样的晨报送达的同时，书店门口摆上了《周刊经济学家》(迎春合并号)，封面上大书“世纪末·日本经济”，印着“不良债权地狱”“融解中的日本经济社会”“日本面临的世界危机”。

日本有代表性的经济报刊高声疾呼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日本经济就此开始。

随后，1月3日，经团联会长丰田章一郎发表了新年谈话：“我国如今正处于重大的岔路口。……若对现状置之不理，日本经济将走向破局，在二十一世纪被世界的繁荣抛在后面。”隔了一段时间，2月9日，经济同友会也表明了危机感：“日本经济正在下沉，若置之不理将迎来破局。”（《面向21世纪的行动计划》）

经济报刊所显示的危机意识，也为财界所共有。

1 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

当时的内阁，是1996年11月成立的第二届桥本龙太郎内阁。由细川内阁、羽田内阁相继组成的非自民党各党联合内阁的时代，于1994年6月结束，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的村山内阁成立；1996年1月村山首相辞职，同为三党联合的桥本内阁接棒；之后，在1996年10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1996年1月由日本社会党更名而来）与先驱新党惨败，脱离内阁转为阁外合作，第二届桥本内阁由此成立——这期间，内阁更迭令人眼花缭乱。第二届桥本内阁是久违的自民党单独内阁。

这位桥本首相于1997年1月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的，就是“六大改革”。所谓“六大改革”，指的是“财政结构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行政改革”这六项“改革”；它是在前一年11月第二届桥本内阁成立时发表的“五大改革”之上，再加进“教育改革”而成的。

“在人、物、资金、信息自由流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现有体制反而在阻碍我国富有活力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尽早创造出领先世界潮流的经济社会体系。要改变深深扎根于社会

的体制，伴随巨大的困难。然而，这些体系相互密切关联。我之所以说，必须在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金融体系之外加上教育，将这六大改革一体断然实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是桥本首相在1997年1月施政方针演说中的话。

“六大改革”之中，让我们具体看看与经济直接相关的部分。

①财政结构改革方面，以到2003年度为止将国家及地方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以下、形成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不再上升的财政体质等为目标，对全部支出不设禁区地重新审视；②社会保障结构改革方面，力图确立这样一种高效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医疗、养老金、福利等方面给付与负担保持均衡，且能与经济活动并存，立足于服务可选择、发挥民间活力的思路；③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为有助于新产业的创造，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完善环境，并通过大刀阔斧的放松管制等，纠正物流、能源、信息通信、金融的高成本结构，此外还致力于企业与劳动相关诸制度的改革，使我国的经营环境在国际上富有魅力；④金融体系改革方面，以使我国金融市场重生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市场为目标，转换金融监管、改革市场本身的结构，对金融市场则依照Free（市场原理发挥作用的自由市场）、Fair（透明而可信赖的市场）、Global（国际化的、领先时代的市场）三原则推进改革；如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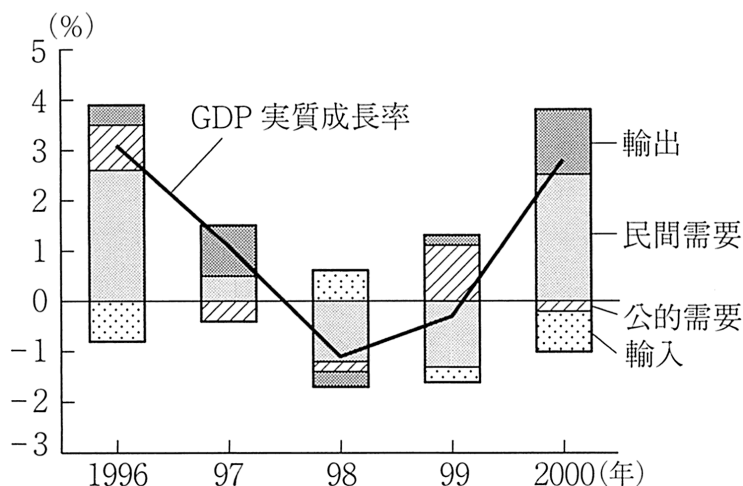
2 “改革”带来的景气下行

在这样的“六大改革”之下，日本经济变成了什么样子。

首先来看景气的动向（图表1-1、1-3）。

景气自1993年11月开始走向上升（回升），尚未充分恢复，就在1997年5月到达峰顶，转为下降。从GDP实际增长率的走势看，1996年曾升至3.2%，1997年却跌至1.1%（图表4-1）。前文已经看

图表 4-1 GDP 实际增长率与贡献度的走势②



（資料）内閣府「国民經濟計算」

（資料）内閣府《国民经济核算》

到，1997 年本有望实现超过 1996 年的增长（第三章第 2 节）。然而事与愿违，1997 年的实际增长率反而低于 1996 年。这是为什么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按需求项目，比较一下 1996 年与 1997 年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数字（图表 4-1）。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民间需求贡献度的下降（从 1996 年的 2.6% 降至 1997 年的 0.5%，下降 2.1 个百分点）。看其内部构成，民间消费支出与住宅建设的贡献度降幅很大（合计 1997 年较 1996 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这是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作为“财政结构改革”的一环，①在收入方面，废除了前一年之前一直实施的所得税与地方居民税特别减税，导致收入减少；②自 1997 年 4 月起上调消费税率（3%→5%）。

此外，公共需求也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正贡献（0.9%）转为1997年的负贡献（负0.4%）。这也是“财政结构改革”抑制支出、尤其是削减公共投资的影响。

始于1997年6月的景气下行，只能说是“财政结构改革”这项“改革”所带来的景气下行。

亚洲货币危机的发生

对桥本内阁来说不幸的是，就在这样的景气下行开始之际，1997年7月爆发了亚洲货币危机，日本经济也因对亚洲各国出口减少而受到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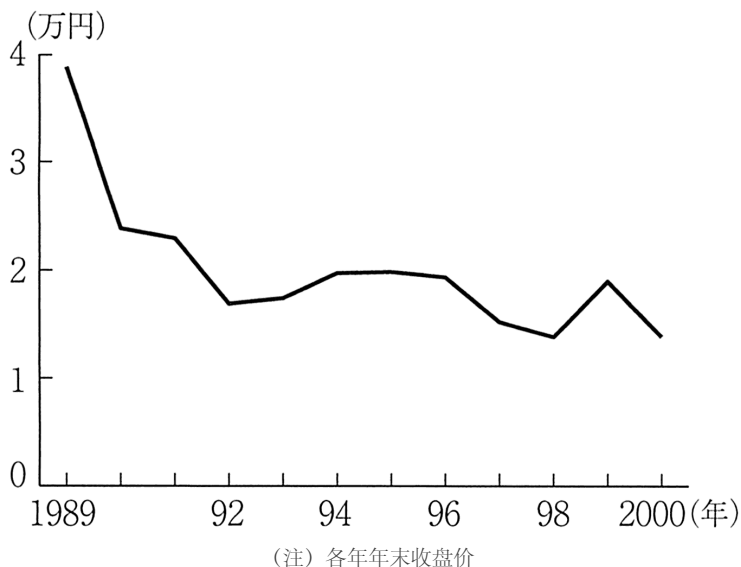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国内开设离岸市场等，接受外国资本，加速经济增长。而这些外国资本，以其中一个投资对象国小小的经济失调（具体说是泰国贸易收支转为赤字）为导火索，不仅开始流出泰国，也开始流出其他各国。因为人们认为，经济的失调并不限于当事国（泰国）一国，其他亚洲各国也处于同样的状况。

就这样，一国的外国资本外流波及其他国家，结果，亚洲各国的货币（管制外国资本流入的中国等国除外）大幅贬值。

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还有政治）的混乱。最终，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三国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谋求经济重建，这些国家由此实施了IMF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亚洲货币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就已进入景气下行局面；从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又因出口增幅下滑（1998年同比转为负增长）而受到重大影响。

图表 4-2 日经平均股价的走势（1989～2000 年）



股价下跌，并走向“金融危机”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的考验又袭向了日本经济。

那就是股价的再度（进一步）下跌。

从日经平均指数看股价的走势：股价从 1989 年末的近 39000 日元大幅跌落至 1992 年末的近 17000 日元，其后受景气回升带动，到 1994 年末恢复到接近 20000 日元。此后三年间处于平稳状态，到 1996 年末为 19000 多日元。然而进入 1997 年后，景气转为下行。股价到 1997 年末跌至 15000 多日元，1998 年末更跌至 13000 多日元，再度大幅下跌（图表 4-2）。

于是，在①景气下行、②股价再度下跌的形势下，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还出现了众多金融机构“惜贷”（貸し渋り）乃至“抽贷”（貸し剥がし）的现象，而这又使景气进一步下行。

3 金融危机的爆发、“惜贷”“抽贷”

金融危机的爆发

1997年从年初起股价持续下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银行股的下跌。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上金融债的收益率持续上升（价格下跌）。这反映出：不良债权问题日益严重，加上在告别“护送船队式监管”、“彻底贯彻自我责任原则，交由市场判断”的“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大爆炸”式监管）之下，市场上蔓延开一种担忧——大型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倒闭。

这种不安的顶点，是准大型证券公司三洋证券因无法在同业拆借市场筹措到资金而经营破产（1997年11月）。接着，在都市银行中多年引领并支撑北海道经济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经营破产（营业转让给北洋银行），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走到了自行停业的地步，金融界为之剧烈震荡。

被传可能经营破产的纪阳银行、足利银行、安田信托银行等门前，排起了要求提取存款的人群；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门前，也排起了要求解约金融债的人群。

“惜贷”“抽贷”

“惜贷”“抽贷”这类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其背景有二。其一是，在那些经营前景令人担忧的众多金融机构，存款被提取，再加上在短期金融市场上也难以筹措资金，可用于放贷的资金枯竭（或者说资金枯竭的风险增大）。其二是，在1993年4月起实施的自有资本比率管制（BIS管制）之下，一些金融机构陷入了无法增加贷款（或者说必须压缩贷款）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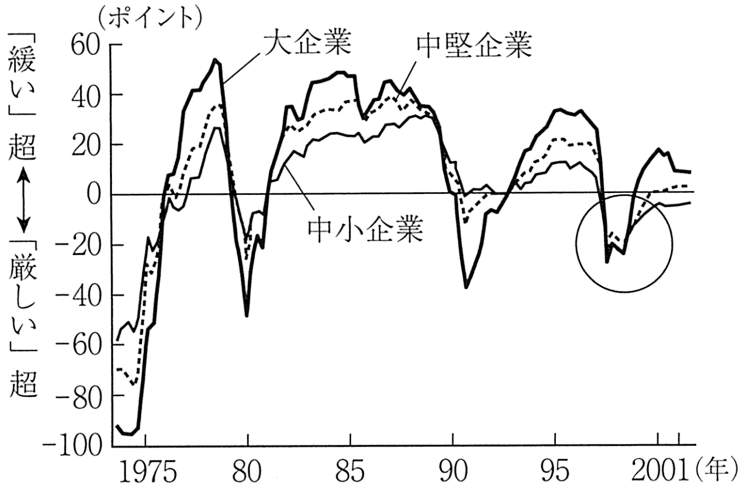
关于后者，略作说明。所谓自有资本比率管制，是指这样一项管制：银行的自有资本（资本金及留存收益等）占风险加权总资产（将银行各项资产分别乘以风险权重后加总得出的资产额。例如对民间贷款按风险权重100%计、国债按0%计来计算）的比率，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上（经营国际业务的银行为8%以上，仅经营国内业务的银行为4%以上）。这是由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最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向战败国德国收取并管理赔偿金的银行，完成这一使命后，当时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合作的场所）制定的规则，其宗旨（一般认为）在于抑制日本的银行毫无节制地扩大贷款的行为。这项管制引入之时，自有资本占风险加权总资产的比率，欧美银行约为8%，而日本的银行仅为4~6%。实施这项管制，就可以抑制日本的银行扩大融资。

照此下去，日本的银行要么压缩资产，要么增加自有资本。于是，日本方面主张，日本的银行所持股票的账面浮盈（市价与账面价值之差）也应视为自有资本，并最终获准将浮盈的45%计入自有资本。

在这项管制之下，泡沫破裂后发生的事情是：第一，股价下跌（即账面浮盈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有资本减少；第二，不良债权增加造成损失，同样会导致自有资本减少。自有资本比率8%，换句话说，就是持有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12.5倍。也就是说，自有资本一旦减少，就必须设法压缩相当于其12.5倍的总资产。于是，日本的许多银行陷入了想放贷而不能放、有时还必须压缩贷款的境地。此外，这项管制还规定，对于自有资本比率不达标的银行，监管当局可以发出要求提交经营改善计划、限制业务、停止业务等命令，这种“早期纠正措施”定于1998年4月起实施。

可见，“惜贷”“抽贷”正是这类BIS管制带来的结果。

图表 4-3 企业经营者对金融机构贷款态度的判断 DI 走势



(注) 1. 判断 DI 是认为贷款态度“宽松”的经营者比例与认为“严苛”的经营者比例之差
2. 贷款态度 DI 出现“严苛”占优，过去在 75 年、80 年、90 年也曾有过，但那些时期都正值日本银行实施货币紧缩政策。98 年在并未采取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严苛”占优，为史上首次。

(出处) 山家悠纪夫《“结构改革”的幻想》

这种被称为“惜贷”“抽贷”的现象从 1997 年秋开始，持续了整个 1998 年，甚至延续到 1999 年上半年。这一时期金融机构的贷款态度变得极为严苛，从日本银行《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的“贷款态度判断 DI”走势即可看出（图表 4-3、4-4）。

图表 4-4 1997 年秋以后贷款态度判断 DI 的走势

调查时点	1997				1998				1999					
	年	月	3	6	9	12	3	6	9	12	3	6	9	12
大型企业			32	30	28	13	△26	△18	△21	△22	△16	△1	6	10
中小企业			12	11	9	△1	△19	△19	△20	△22	△15	△12	△9	△7

(注) (资料) 同图表 4-3

战后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

由于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1998年、1999年景气继续下行。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1.2%，1999年为-0.3%（图表4-1）。连续两年负增长是战后首次，大银行经营破产（继北海道拓殖银行之后，1998年又有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两家均被国有化，后来出售给民间，成为新生银行、青空银行并延续至今）也是战后首次。1997年至1999年的景气下滑（可以说）是战后最大级别的。顺带一提，在这场大萧条之下，1998年民间工资水平也低于上一年（厚生劳动省《每月劳动统计调查》现金工资总额，30人以上规模的事业所）。

这场萧条，如前所述，是“财政结构改革”这项“改革”带来的萧条，但同时也伴随着“金融体系改革”之下“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来，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一场由“改革”加深的萧条。

4 修正“改革路线”带来景气回升

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便是志在“改革”的桥本内阁，也不得不把力量倾注在重振景气上，而非执行“改革”。

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让日本经济摆脱金融危机，二是全面动员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刹住景气的下行。

然而，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这两项课题，都要求采取有违桥本内阁高举的核心政策——“金融体系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等六大改革中两项的精神——的政策，也就是说，必须修正乃至中断“改革”。

具体而言，第一，要使日本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就必须谋求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定，或是让已经无可救药的金融机构顺利破产，为

此需要投入公共资金，而这有违“金融体系改革”的宗旨。桥本内阁一方面以“建立自由而公正的金融体系为目标”，致力于制定以自由化、放松管制为支柱的《金融体系改革法》（1998年6月通过）。在这样的潮流之下，当时社会的氛围是：“把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清算处理掉就行了——这种议论不仅在媒体和政治家当中，就是在经济学家之间，也常常被当作‘正论’来谈论”（白川方明《中央银行》）。

第二，关于扩大财政支出，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其中规定的不仅是1997年度，还包括1998年度以后财政政策的应有方式，而法案正在审议之中（1997年11月通过），构成了制约。桥本内阁一直等到1998年度预算（依据《财政结构改革法》编制的紧缩型预算）通过之后，才提出旨在提振景气的“综合经济对策”，时间是1998年4月24日。而纳入了该政策的1998年度补充预算（6月通过），与两个月前刚刚通过的年初预算恰恰相反，是积极型预算——前后自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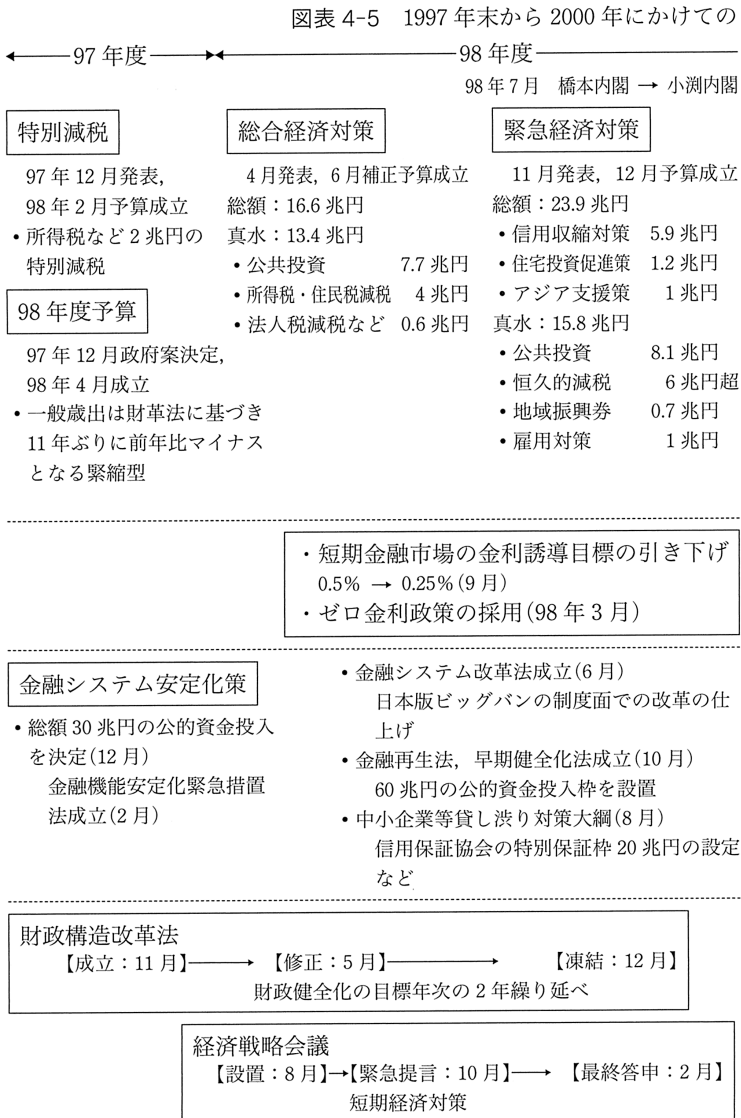
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0年，政府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策略，以及为提振景气而实施的各项经济对策，如图表4-5所示；但这些对策真正开始全面实施，是在1998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惨败、桥本内阁下台、由小渊惠三内阁接任之后。

针对金融危机，1998年10月制定了《金融机能再生法》和《金融机能早期健全化法》

，准备了60万亿日元的注入资金；此外，1998年8月还为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协会^①设置了特别担保额度等。由此，企业的“金融

① 原书作“信用协会”，系“信用保证协会”之简称——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的公共机构，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保证。——译注

图表 4-5 1997 年末至 2000 年的主要经济政策



（出所）山家悠紀夫《“结构改革”的幻想》

机构贷款态度判断DI”也以1998年末为峰值，“严苛”的感觉逐渐消退（图表4-3、4-4）。

此外，关于《财政结构改革法》，在桥本内阁任内就已经进行过将目标年度推迟两年之类的“修正”（1998年5月），小渊内阁接任后则将其“停止施行”（1998年12月。此后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实际上可以说是废除了）。财政政策由此恢复了自由度。

就这样，在自称为“经济再生”内阁的小渊内阁执政期间，景气逐渐走向回升。景气的谷底是1999年1月。1999年的实际增长率虽然仍为负值，但2000年实现了2.8%的正增长，其中民间消费支出与设备投资等民间需求以及出口的贡献很大（图表4-1）。

由“改革”带来、被“改革”加深的这场萧条，靠着修正（中断）“改革”政策，才得以渡过。

5 “理想在美国”，重回“结构改革”路线

实施“改革”政策失败了——把景气搞坏了——本以为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此后关于“改革”的议论会趋于低调，或者至少“实施应当慎重”的呼声会高涨，但现实并非如此。即使“改革”的失败就在眼前，财界自不必说，政府、学者、媒体等也都没有收回“改革是必要的”这一主张。

小渊首相在其内阁成立不久的1998年8月设置了直属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战略会议”（议长为朝日啤酒公司会长樋口广太郎），该会议于1999年2月向首相提交了题为“日本经济再生战略”的咨询报告。

“经济战略会议”的咨询报告

为就“日本经济的再生与 21 世纪经济社会结构的应有形态”提出意见而设置的“战略会议”，成员由财界人士与学者共十人组成，学者中有中谷岩、竹中平藏等人。

这份咨询报告篇幅浩繁，A4 纸约有六十页，字数将近八万。

介绍其概要：报告一开篇就写道：“一直以来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式增长原动力的日本式体系，处处出现了破绽，而这些破绽作为拖住日本经济增长后腿的因素，持续发挥着作用。”

报告接着写道：第一，日本式雇用与工资体系，以及优厚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制度正日渐丧失可持续性；第二，以管制与保护、趋同体质、“护送船队”方式为象征、过度重视平等与公平的日本式社会体系，带来了公共部门的臃肿化、低效化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三，日本式的隐性资产经营从全球标准来看已陷入低效，使冒险变得困难。

基于这样的现状判断，报告提出了以下种种“结构改革”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要点如下。

- 必须变革过度重视结果平等的日本式社会体系，将其重建为“健全而富有创造性的竞争社会”。

- 防止政府对民间自由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实现“小而高效的政府”。
- 为了让每个人的努力与成果得到充分发挥，引入各种激励机制。
- 削减公务员编制。
- 追求更为扁平的直接税体系。下调所得税的起征点。上调消费税不可避免。
- 尽早将劳动者派遣等的适用行业原则上自由化。
- 构建取代日本式金融体系的全新金融体系。构建促进不良债权实质性处置的机制，等等。

后面还有很长的内容，但介绍就到这里。

饶有兴味且显示了这份咨询报告本质的，是它的结尾部分。

报告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的美国经济，也背负着双赤字与储蓄率下降、企业国际竞争力丧失等诸多问题。然而，除了以实现小政府、彻底放松并废除管制、大幅削减所得税与法人税为支柱的里根经济学之外，又以微观层面对重视股东利益的经营之彻底追求、以及容忍这种做法的灵活社会体系为后盾，美国经济到九十年代中期实现了漂亮的复苏。”日本“结构改革”的样板就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在美国”。

诚然，当时的美国经济一片大好。然而，在其背后，又有什么正在发生？

宣称“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民最贫穷的国家”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发表于1998年。用贫困率、识字率及其他指标算出“人类贫困指数”来看，美国在十七个发达国家中排名垫底（顺带一提，日本排在第八位）。芭芭拉·埃伦赖克所著《镍币与角币》（*Nickel and Dime*）描绘美国底层社会，成为畅销书，于2001年在美国出版。同样在2001年，吉尔·A·弗雷泽的《令人窒息的办公室》出版；稍晚，2004年戴维·K·希普勒的《穷忙族》出版。在日本成为畅销书的堤未果《纪实 贫困大国美国》，出版于2008年。这些书介绍的都是美国（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以及办公室里的工作状况，究竟变得何等糟糕。总而言之，在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企业）繁荣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却变得一塌糊涂。

“经济战略会议”成员中的财界人士与学者，是否只看得见前者（经济的繁荣），却看不见后者（人们生活中贫困的加剧）呢？抑或是看见了，却不认为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倘若照这些“战略会议”成员的建议，把他们所主张的“改革”实施下去，日本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答案，各本书腰封上的话已经给出了暗示。

“‘穷忙族’的悲剧正逼近日本”（《镍币与角币》）、“工作无处不在地追着你不放——这种工作方式太不正常”（《令人窒息的办公室》）、“为了不让明天的日本变成今天的美国”（《穷忙族》）、“致追随美国脚步的日本：来自大洋彼岸的警告！”（《纪实 贫困大国美国》）。

第五章 小泉内阁登场与“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2001～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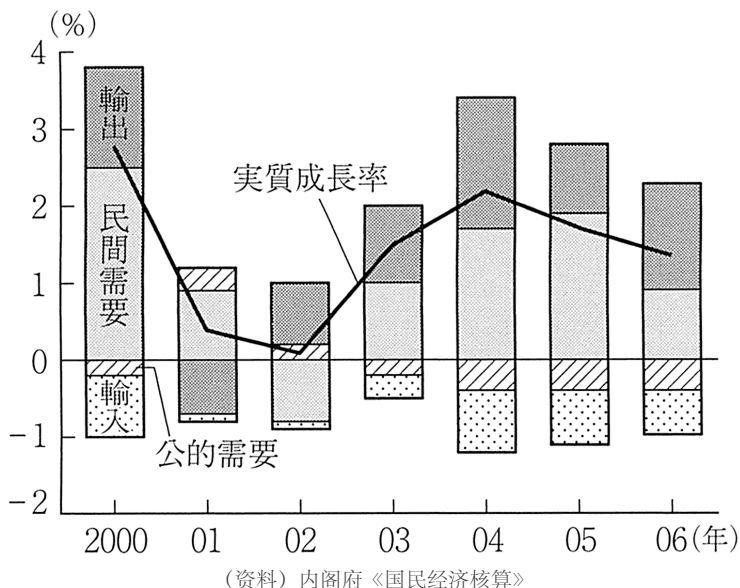
小渊内阁自称“经济再生”内阁，把桥本内阁的“改革”政策做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日本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并遏制住了景气下行。然而，就在成果开始显现的时候，2000 年 4 月 2 日小渊首相因脑梗塞紧急住院，4 日内阁总辞职（小渊于 5 月 14 日去世）。继任的是森喜朗内阁（2000 年 4 月 5 日成立，自民、公明、保守三党联合内阁）。

另一方面，从 1999 年 2 月开始回升的景气，到 2000 年 12 月半途夭折，1999 年至 2000 年的回升以 22 个月告终（图表 1-1、1-3）。22 个月的恢复期，与七十年代中期的恢复期（1975 年 4 月～1977 年 1 月）并列，是战后最短的恢复期。其背景是 IT 泡沫破裂导致的美国经济失速，以及受其影响的日本出口减少。

由于这次景气失速，2000 年已回升至 2.8% 的 GDP 实际增长率，到 2001 年跌至 0.4%（图表 5-1）。

受到这种景气下滑的影响，再加上森首相本人“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言论的问题，以及对“爱媛丸事件”应对失当（休假中接到初次报告后仍继续打高尔夫球，应对迟缓），不受欢迎的森内阁于 2001 年 4 月总辞职，继任的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2001 年 4 月～2006 年 9 月）。小泉在 4 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桥本龙太郎、

图表 5-1 GDP 实际增长率与贡献度的走势③



麻生太郎、龟井静香三名候选人当选总裁，进而就任首相。这就是小泉“结构改革”内阁的登场。

1 小泉“结构改革”内阁的成立

小泉首相在就职时的施政理念演说（2001 年 5 月）中，说了下面这番话。

“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再生”

“赋予我的最重要课题，是重整经济，建设充满自信与自豪的日本社会。……我本着‘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的信念，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各领域的结构改革，希望断然实行堪称‘新世纪维新’的改革。不畏惧痛苦，不在既得权益的壁垒前退缩，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贯

彻‘不畏惧、不退缩、不拘泥’的姿态，确立与 21 世纪相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

对日本而言，当下最重要的课题是使经济再生。作为小泉内阁的第一项工作，我将把森内阁时期汇总制定的《紧急经济对策》迅速付诸实施。这项经济对策，是从以往追加需求型的政策，转向重视不良债权处置和资本市场结构改革的政策转舵。……

处方已经开出。为了真正实现日本经济的再生，此刻我所应当做的，就是决断与执行。”

即“决断”并“执行”“结构改革”。为此，小泉首相首先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从民间聘请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另一件是活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

竹中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

竹中生于 1951 年，当时 50 岁，是专攻经济政策的“改革派”大学教授。他与政治的关联，早在小渊内阁时期就已存在，曾作为经济战略会议的核心成员，参与制定第四章介绍的“日本经济再生战略”。此外，他还担任森内阁设立的“IT 战略会议”委员，提出过各种政策建议。这次起用，看来是出于小泉首相的意图：把处于提出建议一方立场的“学者”，任用为处于执行建议立场的“大臣”，由其“决断”并“执行”种种政策。

起初以“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身份被起用为阁僚的竹中，在第一届小泉（改组）内阁（2002 年 9 月～2003 年 11 月）中兼任金融担当大臣，其后在第二届小泉内阁（2003 年 11 月～2005 年 9 月）中以同样分工再次出任大臣，但中途卸任金融担当大臣，转而兼任新设的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接着在第三届小泉（改组）内阁（2005

年10月～2006年9月）中就任总务大臣兼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在前后将近六年的小泉内阁中，他始终作为阁僚——而且是小泉首相各时期最重点课题的担当大臣——持续指挥种种“改革”。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活用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是通过桥本内阁作为“六项改革”之一实施的“行政改革”中的“中央省厅重组”（2001年）新设立的会议。其职责是接受总理大臣的咨询，调查审议经济财政政策方面的重大事项。

会议的议长是总理大臣；议员中，内阁官房长官、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为常任，此外还有总理大臣指定的大臣（历来为财务、总务、经产三大臣）、总理大臣指名的相关机构首长（历来为日银总裁），以及总理大臣任命的“在经济或财政相关政策方面具有卓越见识者”（通称“民间议员”）。此外，关于“民间议员”，法律规定“不得少于议员总数的十分之四”（《内阁府设置法》第二十二条），历来任命财界两人、学界两人共四人。任期两年，但因连任、再三连任而长期任职的例子很多。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首次设立是在森内阁时期，但因森内阁短命告终，几乎没有动用；真正开始活用，是在首相把这个会议定位为“最重要的政策会议”的小泉内阁成立之后。在小泉内阁，以“预算编制的基本方针”为首，经济运营、财政运营、各项“改革”等基本方针，都先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讨论，然后获得认可、决定。之后再走内阁会议认可、决定的程序，必要时形成法案交由国会审议；但咨询会议的议长毕竟是总理大臣。于是形成这样的流程：咨询会议一通过，内阁会议就照样通过，并在执政党占多数的国会获得表决通过。

咨询会议在实现各项“改革”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而在咨询会议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民间议员”，尤其是提出亲财界“改革”方案的财界出身议员。民间议员四人中，来自财界的议员有两人，其余两名学界出身议员中的一人，通常指定由明显持亲财界“改革”意见的人担任。因此，“民间议员”的意见分布至少是“改革派”三比一。加上“改革”志向强烈的竹中大臣就是四比一，再加上小泉首相就是五比一。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改革派”意向畅通无阻的格局。

政府的审议会（或与之类似的会议），此前的惯例是：吸收了财界代表，就也吸收劳动界代表，或吸收中小企业代表，又或吸收消费者代表，以此对中立与公正有起码的顾及。不做这类顾及的官方组织，恐怕要首推这个“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说到底，这个会议本是总理的咨询机构，议长却是总理大臣本人，是个奇怪的机构。

总而言之，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开始的。

《基本方针》的制定

小泉内阁下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制定《关于今后经济财政运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通称《基本方针》）（2001 年 6 月）。

这是此后每年 6 月前后经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方针》的第一份。这份《基本方针》开头首先强调的，是“不良债权问题的根本解决”。其中写道，“作为经济再生的第一步，应当加快不良债权的处置”；“把今后两至三年定位为日本经济的集中调整期，短期内不得不甘于接受低经济增长，但其后的目标是克服经济的脆弱性，实现民间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从中可以读出：把解决不良债权问题

放在一切之上，不解决它，日本经济就无法前进——这就是小泉内阁的基本姿态。

《基本方针》继这“第一步”之后，接着提出了“实施结构改革的七个改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民营化·管制改革计划”。其中写道，“在‘民间能做的事尽量交给民间’的原则下……强力推进民营化……通过包括对邮政事业民营化问题的具体研究……等，……扩大民间部门的活动场所与收益机会”，等等。

以下本想依照《基本方针》的记述介绍这些“改革计划”，但或许是因为内阁成立后短时间内汇总而成，《基本方针》接下来的记述不成体系，逻辑上也未加梳理，给人以种种方案杂乱罗列之感。

因此，这里按所写顺序择取要点。主要内容如下。

- 在医疗、护理、福利、教育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 从以存款为中心的储蓄优待，转向股票投资等投资优待……研究包括税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应如何设置。
- 在 2002 年度，作为财政健全化的第一步，以把国债发行控制在 30 万亿日元以下为目标。
- 稳步推进司法制度改革。
- 推进证券市场、不动产市场的结构改革。
-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改革。推进使派遣、固定期限雇用、裁量劳动制等多种就业形态得以选择的制度改革等。
- 税制改革。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医疗制度改革。负担的合理化。
- 年金制度改革。
- 地方竞争——确立地方自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地方财政制度的根本性改革。

2 “不良债权处置”这项政策

把不良债权处置问题列为“结构改革”之首的，是先于小泉内阁的森内阁。那就是森内阁的“紧急经济对策”（2001 年 4 月 6 日）——小泉首相在就任时的施政理念演说中说过“处方已经开出。……我所要做的，是决断与执行”，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应对 2000 年 11 月以来的景气下滑，森内阁制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其具体措施的第一条，就是“不良债权的彻底表外化”（即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消除不良债权）。

为什么是不良债权处置

为什么景气对策的头等大事是处置不良债权？想来是因为，泡沫破裂后的景气回升（1993 年 11 月～1997 年 5 月，43 个月；1999 年 2 月～2000 年 11 月，22 个月。参见图表 1-1、1-3），每一次都是景气尚未充分恢复就中途夭折了。这种夭折的背景，在于不良债权问题的存在：金融机构背负着不良债权，所以景气即使开始回升，也无法充分恢复，转眼间就跌落下去；因此，要使景气真正恢复，首先必须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森内阁以及小泉内阁（或者说是这些内阁的政策智囊）就是这样考虑的吧。

不过，重新确认一下事实关系：带来第一次（1997 年 6 月起）景气下滑的，是桥本内阁实施的以“财政结构改革”为首的“改革”政策；第二次（2000 年 12 月起）则是美国 IT 泡沫的破裂。这是本书已经指出过的。景气回升的两次受挫，都发生在与不良债权问题无关的地方。

如果没有桥本内阁强行推行“改革”政策，或者美国 IT 泡沫破裂的时间再往后错开一些，那么，即使不良债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日本景气回升的中途受挫也不会发生——这样说是可以的。

打上问号的“不良债权问题压低经济的机制”

无论如何，小泉内阁开始着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了。

小泉内阁上台后（或许应该说是竹中出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后？），把此前的《经济白皮书》（《年度经济报告》）改名为《经济财政白皮书》（《年度经济财政报告》）。其第一版即 2001 年版《白皮书》（由竹中大臣负责），用整整一章讨论了不良债权问题。其中分析了“不良债权问题压低经济的机制”，并论述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再生是不可或缺的”，先来看看它的主张。

《白皮书》列举了不良债权使景气变坏的三条路径如下。

第一条路径，是不良债权挤压银行收益这条路径。它论述道：“银行收益受到挤压，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就会下降”，从而无法承担风险。

第二条路径，是“低收益、低生产率的领域永远滞留着从业人员、经营资源、资本、土地等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无法分配到高收益、高生产率的领域”这条路径。它的说明是：不良债权与收益低下的低生产率领域相关，资金流向了那里，人也在那里工作，所以资金和人无法流向高生产率领域。

第三条路径，据说是“银行破产等导致对金融体系的信任下降，使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趋于谨慎，压低设备投资、个人消费”这样一条路径。

以上就是三条路径：有不良债权，经济就无法增长，所以必须尽快处置——《白皮书》是这样说明的。问题在于，该如何解读这一说明。

《白皮书》的说明是错误的

首先说第一条路径。

《白皮书》的说明看似言之有理，然而，这一说明在问题的设定方式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是把“有不良债权的状态”与“没有的状态”相比较，说“有的状态”不好、“没有的状态”更好——只不过在说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

现实中，不良债权是“有”的。这里原本应当比较的，是“听任其存在下去”与“将其处置、使其变成没有的状态”这两者对景气各自的影响。

“有的状态”是对经济不利的状态，这一点很清楚。话虽如此，“将其处置”，却会给经济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实施处置，第一，银行收益会变得更差。第二，“处置”就是使企业破产，因而会剥夺该企业将来复活的可能性（银行得以回收债权的机会）。第三，会打击与该企业有交易往来的企业的经营（结果可能又催生新的不良债权）；第四，还会使从业人员失业——会产生这种种恶劣影响，这样行吗？

像这样，应当比较的是“有的状态”与“把它消除时的状态”，而不是“有的状态”与“没有的状态”。这么一比较，反倒可以说前者还要好一些。

关于第二条路径，它把社会二分为“低生产率领域”与“高生产率领域”，认为在日本经济中，资金和人过多地滞留在前一个领域，所以需要通过“放松管制”等，使资金和人从前一个领域流向后一

个领域——这与“结构改革”论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想法对现实的认知明显是错误的（因此是错误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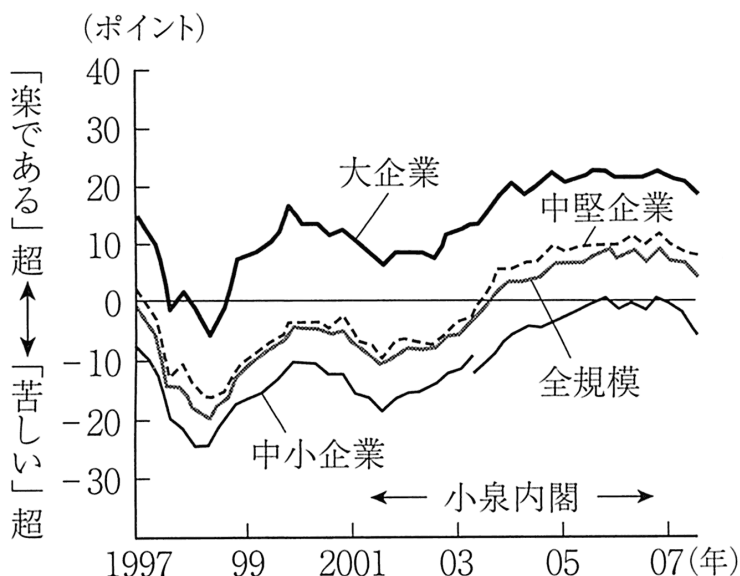
问题就在于，这一理论以资金和人都处于完全就业状态为前提。

观察 21 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应当认为，现实中资金和人都处于不完全就业的状态。也就是说，1997 年至 1998 年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在货币宽松政策之下，“企业的资金周转判断”较为宽裕（图表 5-2）；失业者达到 340 万人，失业率达到 5.0%（均为 2001 年），人手也有富余（图表 5-3）。《白皮书》按低生产率领域与高生产率领域的二分法来思考，主张处置不良债权（即收回流向低生产率领域的资金，同时通过使该领域的企业破产，让在该领域工作的人失业），由高生产率领域吸收这些资金和人，使日本经济增长。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领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生产率为零、或许应称为“失业领域”的领域。因此，成长领域需要资金和人时，从失业领域调来即可，根本无须求之于低生产率领域——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下，因不良债权处置而失去去处的资金和人，会滞留于失业领域；也就是说，资金会进一步过剩，失业者进一步增加，日本经济的增长力反而会下降——本应这样认为才对。现实如图表 5-2、5-3 所示：在小泉内阁的整个期间（2001～2006 年），货币宽松状态一直在持续；而在强行处置不良债权的期间（2001～2004 年），失业率与失业者人数双双上升（增加），并且居高不下。

最后，关于第三条路径。

第三条路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应是事实。然而，要说这条路径，应该说把不良债权问题扩大成金融危机问题的桥本内阁，责任更大。而且，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不是逼迫金融机构处

图表 5-2 企业资金周转判断的走势



(注) 回答“宽裕”的企业比率(%)与回答“紧张”的企业比率(%)之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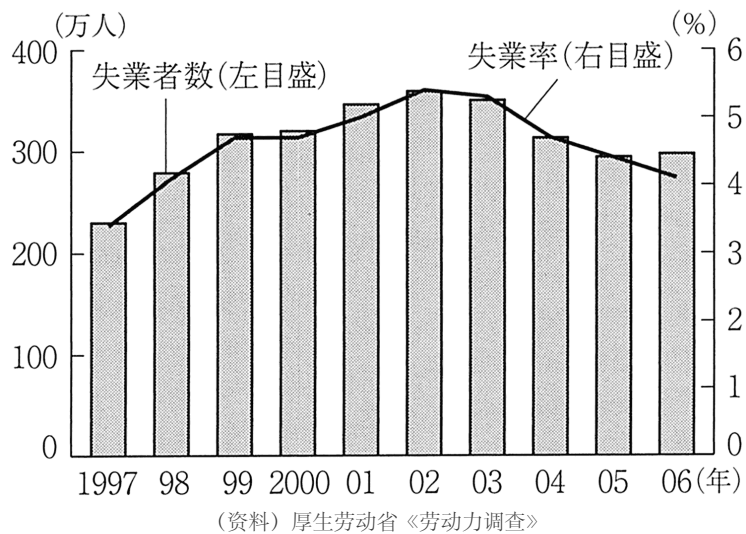
(资料) 日本银行《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

置不良债权(表外化),而是像此前的小渊内阁所实施的那样(后期的小泉内阁也将实施),向不稳定的金融机构投入公共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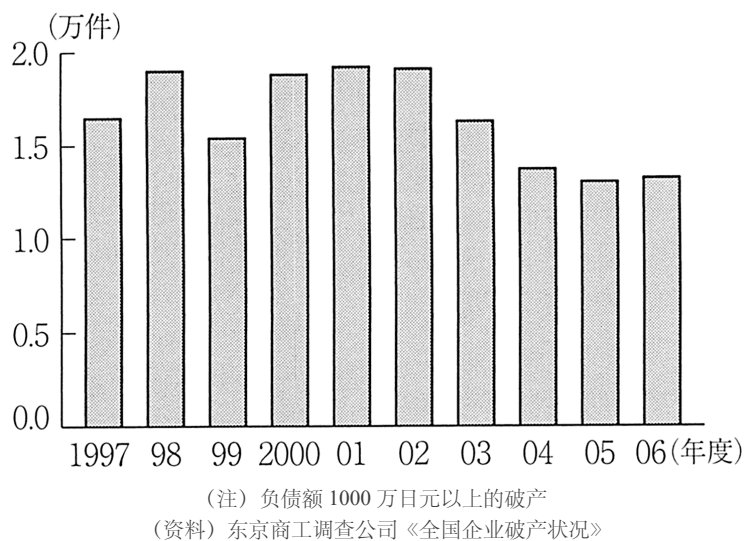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白皮书》所说的三条路径,无法证明这一时期急于处置不良债权的正当性。

而现实是,强行处置不良债权,使森内阁时期以及小泉内阁初期的景气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破产件数达1.9万件(2000年度、2001年度、2002年度。图表5-4),失业者达360万人,失业率达到5%以上(图表5-3)。GDP实际增长率也从2001年的0.4%进一步降至2002年的0.2%(图表5-1)。尽管2002年美国经济走向复苏、日本出口也由2001年的同比下降转为正增长,情况依然如此(图表5-11)。

图表 5-3 失业人数与失业率的走势



图表 5-4 企业破产件数的走势



始于森内阁、由小泉内阁继承的“不良债权处置”，即“结构改革的头号工程”（小泉首相语），不得不说“彻底失败了”。

问题在于为什么失败。可以说，其根源在于小泉首相及其身边的人对不良债权的理解不足。

不良债权是什么①——其大半是对“活着的企业”的债权

关于不良债权，自《金融机能再生法》（正式名称为《关于金融机能再生的紧急措施的法律》）施行（1998 年 10 月）以来，通行的做法是按照该法要求金融机构每个决算期提交的《资产评估等报告书》的分类来看。

即《金融机能再生法》要求金融机构将其资产分为①“破产更生债权及与之类似的债权”、②“危险债权”、③“需管理债权”、④“正常债权”四类，分别记载余额并上报，其中①～③的合计（《金融机能再生法》披露债权）即被视为“不良债权”。①～③各自的定义见图表 5-5。

图表 5-5 《金融机能再生法》披露债权的定义

①破产更生债权及与之类似的债权	对因破产、公司更生、再生程序等事由陷入破产的债务人的债权，以及与之类似的债权
②危险债权	债务人虽未陷入破产状态，但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恶化，很可能无法按合同收回债权本金及收取利息的债权
③需管理债权	・逾期 3 个月以上的债权・放宽贷款条件的债权※均不包括①、②（此外，需管理债权按单笔贷款分类）
④正常债权	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无特别问题，归入上述以外类别的债权

（资料）金融厅网站

不良债权，一般被理解为借款企业破产等导致利息自不必说、连本金也无法收回的债权（①），但其实不止于此，还包括有可能陷

入此种境地的债权（②③）。从其构成来看，现实中②③远远多于①（图表 5-6）。就 2001 年度来看，不良债权总额 43.2 万亿日元中，①为 7.4 万亿日元，扣除后②③接近 36 万亿日元，占整体的 80% 强。

此外，小泉内阁要让金融机构处置的不良债权，不是①而是②③的。

图表 5-6 不良债权（《金融机能再生法》披露债权）余额的走势（全国银行，年度末，万亿日元）

年度	余额	其中破产更生等（参考）	全部存款类金融机构
2000	33.6	7.7	42.9
2001	43.2	7.4	52.4
2002	35.3	5.7	44.5
2003	26.6	4.4	34.6
2004	17.9	3.2	24.9
2005	13.3	2.4	19.6
2006	12.0	2.1	17.1

（资料）金融厅网站

①（如图表 5-5 所示）是已进入破产、更生等程序的债权，对象几乎都是“死尸”般的企业，无须行政部门指示，即使放任不管，金融机构也会自行处置。与此相对，②③的对象企业只是沦为①的风险很高，或是正在向金融机构要求变更融资条件（延长贷款期限、降低利率等），它们仍然“活着”，甚至“正努力活下去”。把它们“杀掉”“断其命根”，就是小泉内阁“处置不良债权”的政策方针。

“杀掉活着的企业”这种粗暴的政策，就是“不良债权处置”政策。但不管怎样，这项政策还是在 2002 年 9 月起兼任金融担当大臣的竹中大臣制定的“金融再生计划”之下，被强行推行。该计划的要点是：严格金融机构的资产评估（总之，可疑的一律认定为不良债权）；令其制定经营健全化计划，并监督其执行（总之，就是让其切实处置不良债权）；对未能达成健全化计划的银行发出业务整改命令；等等。

不良债权是什么②——它是景气的函数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不良债权怎么样了。来看不良债权（《金融机能再生法》披露债权）余额的走势。

图表 5-7 不良债权（《金融机能再生法》披露债权）余额的增减及其原因（全国银行，万亿日元）

年度	年度增 减额	增加	新发生	评估严 格化等	减少	表外化	正常债 权化	偿还
2001	9.6	18.9	7.9	11.0	△9.3	△9.3		
2002	△7.9	10.2	9.2	1.0	△18.1	△15.1	△2.3	△0.7
2003	△8.7	6.3	6.3	—	△15.0	△9.8	△3.5	△1.7
2004	△8.7	5.2	5.2	—	△13.9	△8.6	△1.9	△3.4
2005	△4.6	3.4	3.4	—	△8.0	△5.8	△1.5	△0.7
2006	△1.4	3.7	3.7	—	△5.1	△3.8	△1.1	△0.2
2002～ 06 累计	(△31.3)	(28.8)	(27.8)	(1.0)	(△60.1)	(△43.1)	(△10.3)	(△6.7)

（注）根据金融厅对银行进行的问卷调查

（资料）金融厅网站

首先看图表 5-6。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余额，在小泉内阁成立前的 2000 年度末还是 33.6 万亿日元，到内阁成立后的 2001 年度末已膨胀至 43.2 万亿日元。这是因为在小泉内阁“严格资产评估”的方针之下，此前不被视为不良债权（准确地说，是金融机构未如此认定）而一直列为正常债权的约 10 万亿日元，被重新认定为不良债权（即被定为处置对象的债权）（图表 5-7）。

下面，把 2001 年度末的不良债权余额 43.2 万亿日元（图表 5-6），加上 2002 年度因评估严格化而新增认定为不良债权的 1.0 万亿日元（图表 5-7），得出 44.2 万亿日元，以此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 44 万亿日元（以下零数均四舍五入），到小泉内阁最后一年的 2006 年度末已减少到 12 万亿日元。这五年间增减的明细为：(1)新发生（2001 年度末被视为正常债权的变成了不良债权）28 万亿日元，(2)表外化

带来的减少 43 万亿日元，(3)转为正常债权的 10 万亿日元，(4)得到偿还的 7 万亿日元（图表 5-7），

$$44 + 28 - (43 + 10 + 7) = 12$$

就是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以看出什么？

①最初（2001 年度末）的不良债权余额为 44 万亿日元，其中破产更生等债权在 8 万亿日元以下，其余约 36 万亿日元是危险债权以下，即对仍然活着的企业的债权（图表 5-6）。此外，这期间新发生的 28 万亿日元不良债权（图表 5-7），在 2001 年度末还是正常债权，自然也是对活着的企业的债权。这一时期的不良债权共 72 万亿日元（2001 年度末的 44 万亿日元 + 截至 2006 年度新发生的 28 万亿日元），其中，在 2001 年度初就是对活着的企业的债权的，有 64 万亿日元。

②2002～2006 年度间，金融机构表外化的不良债权金额为 43 万亿日元。即使假定其中 8 万亿日元在 2001 年度末已是破产更生债权，其余也是 35 万亿日元（43-8）。也就是说，对活着的企业的债权中约有 55%（35÷64），是被“不良债权处置”政策杀掉的。

③另一方面，这期间恢复正常的不良债权与已偿还的不良债权合计 17 万亿日元。即对活着的企业的不良债权中，近三分之一（17÷64）恢复了正常，或得到了偿还。

④还值得注意的是：不良债权新发生的高峰在 2002 年度，2003 年度以后转为减少趋势；而转为正常债权加上偿还的金额，自 2003 年度以后在增加。2002 年是景气严重下滑的一年，2003 年是开始走向复苏的一年（图表 5-1）。景气变坏，不良债权就增加；景气好转，不良债权就减少。不良债权随景气的好坏而增减。不良债权就是景气的函数。

看到这里，小泉内阁的“不良债权处置”政策是错误的，这一点应该已经清楚了。

第一，“金融机构背负着不良债权，所以景气变坏（或者无法好转）”这一说法，在理论上解释不通（无法用《白皮书》所说的第一至第三条路径来解释）。

第二，它也与事实相悖。1997 年以后景气的恶化，是桥本内阁在金融监管上的失误造成的（本不应让金融机构破产，本应更早采取小渊内阁所采取的政策）。此外，2002 年以后景气的下滑，则是小泉内阁采取的不良债权处置政策造成的（企业破产增加、失业者增加等）。

应对不良债权问题，明智的办法是不让景气变坏；万一景气开始变坏（因为随着景气恶化，不良债权势必增加，实力薄弱的金融机构的经营必然受到打击），关键在于及早注资等，防止金融危机发生。其实，这也正是 2003 年理索纳集团和足利银行相继陷入经营危机之际，小泉内阁（金融厅）最终采取的办法。

3 “攻势结构改革”——“从官到民”，以及“管制改革”

小泉“结构改革”的各项计划，如前所示，都写在《基本方针》第一版（2001 年）之中，从“不良债权处置”到邮政民营化，乃至各种各样的制度改革。要统一把握其整体面貌相当困难，但若勉力梳理其逻辑，是否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

①目标是重振日本经济。必须让日本经济所具有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为此需要“结构改革”。

②作为第一步，虽属于“守势改革”（《经济财政白皮书（2005 年版）》），但“应加紧处置不良债权”。

③随后转向“攻势改革”（同前）。首先是“从官到民”。民间能做的事尽量交给民间。必须大力推进民营化，“扩大民间部门的活动空间与收益机会”。

④进而致力于“营造发挥民间活力的环境”。所需的是“管制改革”，进而还有“制度改革”。

竹中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在任期间，在以大臣头衔出版的著作《明天的经济学》中写道：“结构改革的本质，就是强化供给侧。”

我认为确实如此。若要在表述上稍作补充，那就是“若问靠什么强化，就是靠推进管制改革、让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靠让强者胜出”——是不是这样。

下面来看小泉内阁治下实施的“攻势改革”的大致情形。

以“从官到民”、“小政府”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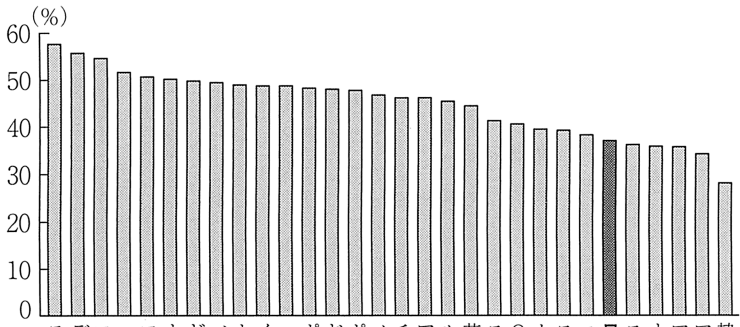
2005年版的《经济财政白皮书》拿出全部三章中的一章，以“从官到民——政府部门的重建及其课题”为题，在“什么是小政府”“从官到民的各种手法”“以小政府为目标的课题”等标题之下，解说“小政府”如何有助于经济增长、为实现它有哪些方策等等，摆开了因此就应当实行“小政府”的论阵。

这番功夫值得肯定，但在根本之处存有疑问。那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与欧美主要国家政府相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是“小政府”了。

图表 5-9 主要国家政府支出的构成（2002 年）
（占名义 GDP 比重，%）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一般服务·治安	5.5	9.2	10.7	9.1	12.4
经济·公共	7.6	3.6	7.0	5.8	4.9
文化·教育	4.7	5.8	6.8	4.9	5.8

图表 5-8 OECD 各国一般政府支出的规模（占名义 GDP 比重）



图表 5-8 OECD 各国一般政府支出的规模（占名义 GDP 比重）（2004 年）

（出所）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5 年版）》

（续表）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保健·社会保障	20.4	23.2	29.0	29.0	25.0
合计	38.1	41.8	53.4	48.7	48.0

（注）分类依据 SNA（国民经济核算），归纳如下。

一般服务：一般公共服务、防卫、公共秩序·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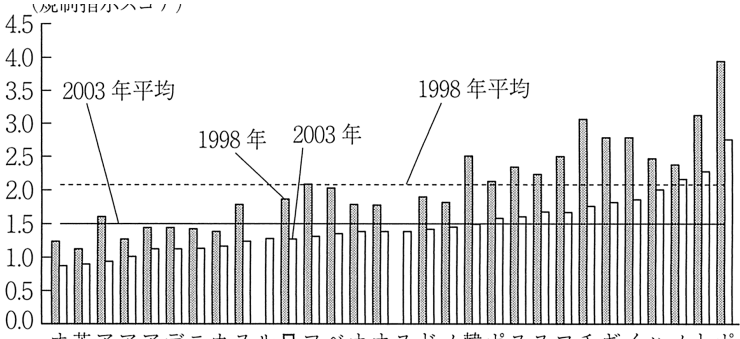
经济·公共：经济事务、环境保护、住宅·地区宜居环境

文化·教育：娱乐·文化·宗教、教育

保健·社会保障：同左

（出所）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5 年版）》

图表 5-10 管制的国际比较（OECD 产品市场管制指标）



（出所）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5 年版）》

第一，支出规模小（图表 5-8）。从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看，日本在 OECD 成员国中，从小到大排在第六位。

按支出目的把政府支出分成四类来比较，日本在一般服务·治安、文化·教育、保健·社会保障三个领域都小于欧洲主要国家，仅在经济·公共领域，日本才是大政府（图表 5-9）。

第二，比较政府管制的强弱，2003 年日本从强到弱排第 20 位、从弱到强排第 11 位，总的来说属于管制较弱的一方（“小政府”组）（图表 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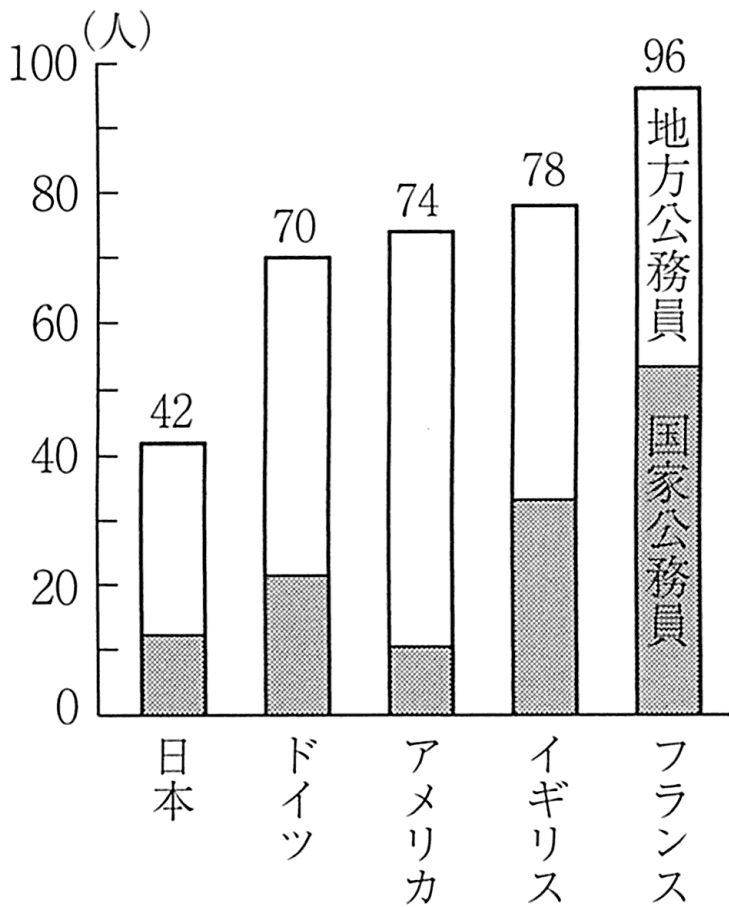
第三，即使按公务员人数比较，以每千名人口计，德国 70 人、美国 74 人、英国 78 人、法国 96 人，而日本只有 42 人（图表 5-11），是压倒性的小政府。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都少。

其中第一、第二两点，“白皮书”中也有记述，并刊有图表（不知为何，关于第三点，只是委托民间智库做了调查，却没有记载）。

坦率面对这样的现实，首先会让人感觉到，日本政府是不是没有去做该做的事，国民的自我负担是不是因此加重了；另外还会让人感觉到，日本公务员的负担是不是过重了。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初等教育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之多。从学生（国民）的立场看，每名学生分摊到的教师人数少；从教师（公务员）的立场看，所负责的学生人数多，这就是现实。也就是说，日本学生每人只享受到教师三十分之一的服务，而欧美学生享受到的是教师二十十分之一的服务，相当于日本的约 1.5 倍；反过来从教师的立场看，日本一名教师要照看 30 名学生，欧美教师只需照看 20 名学生（图表 5-12）。类似的情形在其他领域想必也能找到。

尽管如此，小泉内阁仍主张“要小政府”，在国家层面实施了邮政事业与道路公团的民营化，以及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等，以邮政职员 28 万人为首，总计 50 万名公务员被转为非公务员。与

图表 5-11 主要国家公务员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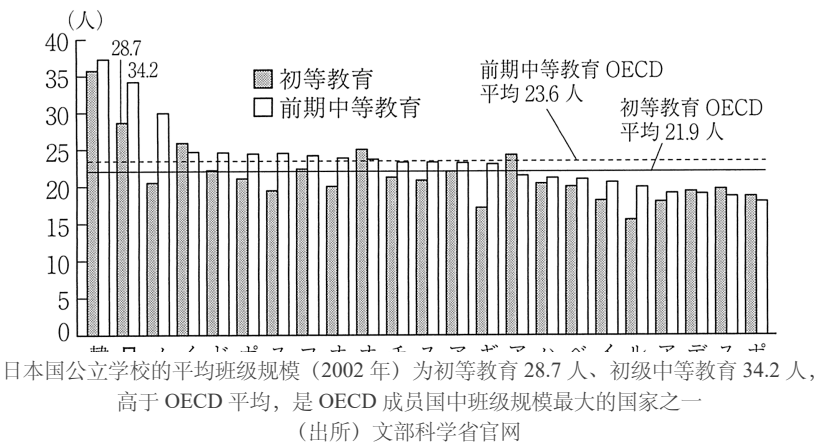
(注) イギリスについては、フル
タイム換算。アメリカ、ドイツ

图表 5-11 主要国家公务员人数（每千名人口）

（注）英国为全职折算。美国、德国的国家公务员仅指联邦政府。州政府职员归入地方公务员

（資料）野村综合研究所《公务员人数国际比较调查》（2005 年 11 月）

图表 5-12 每班儿童学生人数的国际比较



此同时，还提出了“公务员总人员经费削减·编制净减目标”，致力于裁减国家公务员、压缩人员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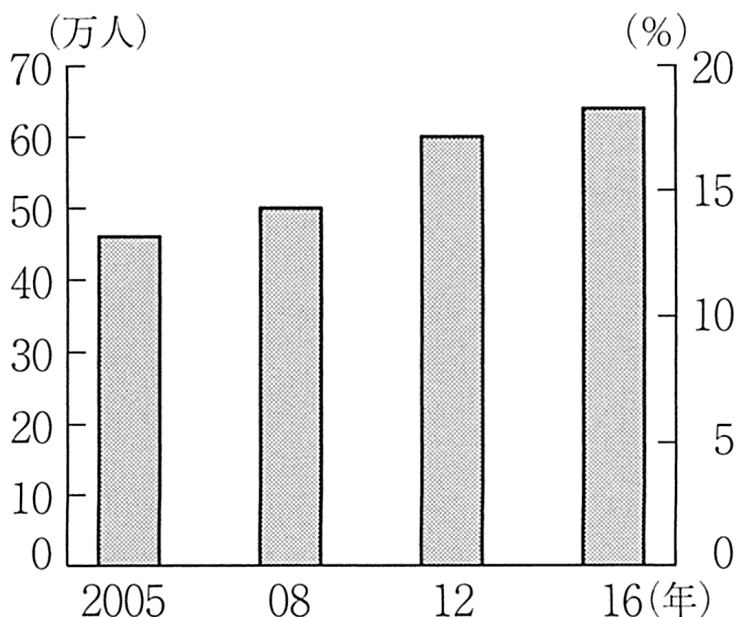
这种“小政府”政策的对象不仅是国家。地方政府也是对象，倡导推行将各类业务委托给民间等做法。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财政上受到严格制约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遵从这一方针。

“官造穷忙族”的出现及其增加

这类政策催生出了被称为“官造穷忙族”的非全职公务员。他们的工资换算成时薪几乎贴着最低工资，无论干多少年也几乎不加薪——其待遇之严苛，正是布施哲也《官造穷忙族》等纪实报道所披露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不仅限于小泉内阁时代，其后仍在持续。总务省《地方公务员临时·非全职职员实况调查》始于 2005 年，2008 年以后每四年实施一次。据该调查，2016 年这类职员为 64 万人，比 2005 年增加了 19 万人（图表 5-13）。按职种看，从多到少依

图表 5-13 地方公务员临时·非全职职员数的走势



（注）各年 4 月 1 日的人数

（资料）总务省《关于地方公务员临时·非全职职员的实况调查》

次为：事务辅助职员 10 万人、教师·讲师 9 万人，保育员 6 万人、供餐炊事员 4 万人、图书馆职员 2 万人，等等。

此外，国家公务员方面也有类似的调查，不妨一看。这就是《关于国家公务员非全职职员的实况调查》（内阁官房，2016 年 9 月）。根据这项调查，总数为 5.6 万人（相当于国家行政机关一般职编制约 30 万人的约 20%）。

国家和地方存在的这些“官造穷忙族”，可以说全都是小泉“结构改革”的临别赠礼，而且是膨胀扩大了的赠礼——想必这么说并不为过。

“管制改革”，让竞争原理发挥作用

与“小政府”并列，构成“攻势结构改革”一大支柱的，是放松管制（借用小泉内阁的说法，即“管制改革”）。

战后，历代政府“放松管制”的历史很长。早在 1970 年代中期，就已设立了旨在实现“行政简化”的“临时行政调查会”（“第一临调”）（1961～1964 年，池田勇人内阁）。

大约二十年后，“第二临调”设立（1981～1983 年。由铃木善幸内阁设立，向中曾根康弘内阁提交最终咨询报告）。其解散后，为落实咨询报告，又设立了“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行革审”，1983 年）。此后，在名称几经变换的审议会之下，既制定放松管制的“推进计划”，其实施也受到“监督”。

从“第二临调”设立到小泉内阁成立，相隔二十年。这期间，“放松管制”或者说“管制改革”始终是政府的主要课题。

不过，这期间，“放松管制”的主要目的已从“行政事务简化”转向“搞活民间经济活动”。此外，作为对象的“管制”，也从以“经济性管制”为中心，扩大到把“社会性管制”也包含在内。“放松管制”这一表述也改成了“管制改革”（1999 年，“放松管制委员会”更名为“管制改革委员会”）。

小泉内阁的“管制改革”，是这一潮流的延续。因此可以认为，其“改革”是对小泉内阁成立前各项“改革”的总收官（尤其对“经济性管制”

而言是如此），并且“社会性管制”的“改革”正逐渐占据主要分量。

小泉内阁继承了此前历届政府长达二十年的“管制改革”潮流，即便如此，据说其五年间实现的“管制改革”仍达 1500 项以上（小

泉内阁编制的宣传册)。关于其明细并无记述,但经报纸报道等为人所知者,大多是经济性管制的“改革”,而且主要是放宽乃至废除准入管制。酒类销售业执照的修订、《批发市场法》的修订、《分期付款销售法》的修订、《银行法》的修订,等等。无论哪一项,都是“废除供需调节管制、将新准入自由化”的东西。

将新准入自由化,使行业内的竞争活跃起来。在这之中,强者——经营高效的一方——得以胜出存活,结果经济实现高效化,日本经济变强——可以看出,这就是“改革”的意图。然而,也会引发别的结果。竞争一旦加剧,企业就会致力于经营高效化——削减成本。工资被抑制,劳动条件变得严苛,“改革的阵痛”被转嫁到弱者、更弱者身上——这是“改革”的又一个结果。

绝好的例子出现在出租车行业。《道路运输法》修订于小泉内阁成立之前(施行于小泉内阁成立后的2002年)。经此修订,原先“考虑供需平衡的执照制、审批制”,变成了新准入自由。由此产生的是:出租车行业竞争激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司机收入减少、工作时间拉长、事故增加。纽约、伦敦、巴黎、罗马,世界各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对出租车设有数量管制。本应追问管制存在的理由、认真研究放松管制的是非,却看不到曾这样做的痕迹。

那么,再回到前面说的宣传册。

其中列举了小泉内阁实现的四个“管制改革”实例。第一是“保险诊疗与保险外诊疗并用”,第二是“幼儿教育·保育的一体化”,第三是“关于派遣劳动的放松管制”(第四从略)。

第一、第二,无论哪一项,说起来都更靠近“社会性管制”,与其说是“管制改革”,不如称之为“新规则的采用”。这些规则的是非,此处姑且不作判断,但若与前面看到的“经济性管制”的放宽

结合起来看，似乎可以说：小泉的“管制改革”正逐渐进入危险的领域（一个对其是非需要立足广阔视野、进行充分讨论的领域）。

第三项，则是被认为存在重大问题、实施一直被视作禁忌的放松管制。

《劳动者派遣法》制定于中曾根内阁时期的 1985 年。当时，允许派遣的业务只有软件开发、口译·笔译·速记、调查、财务处理等“需要专业知识等的 13 项业务”。这是因为，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关于立法化的咨询报告”提出“需要充分注意，不得促成对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替代”，此外，也是出于不让派遣劳动者被迫接受不利合同的考虑。

然而，该法施行后，在小泉内阁成立之前，就已进行了如下放松管制：①对象业务扩大至 16 项业务（1986 年）、②扩大至 26 项业务（1996 年）、③对象业务原则上自由化（改为只指定禁止业务的负面清单化，1999 年）。

在这一潮流之下，小泉内阁进行的“改革”（2003 年）有以下两项。其一，是把“物品制造业务”从负面清单中剔除；其二，是把被限定为“一年”的派遣期限延长为“三年”。对于这项“改革”，小泉内阁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派遣劳动者可以选择多样的工作方式了”“作为派遣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增大了”（前述宣传册）。事情全看怎么说。

总之，《劳动者派遣法》就这样变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几乎所有业务（仍留在负面清单上的，只剩建筑、港湾运输、保安、医疗等相关等极少数），均可雇佣三年。禁止替代正式雇佣之类的法律精神，早已被当作耳旁风。

而这项“管制改革”欠下的账，将因雷曼冲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暴露出来，这一点留待本章最后一节（5）来看。

“结构改革特区”的创设

除了这些各式各样的单项“管制改革”，小泉内阁实施的重大“管制改革”，是制定《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2002 年），在全国各地设置“结构改革特区”。

根据“特区法”的规定：①政府公开征集，地方政府、民营企业、个人等“就管制的特例措施提出提案”；②收到“提案”的政府（内阁官房、内阁府）与相关省厅协商，对达成一致的，规定成为特区所需的条件等（“菜单化”）；③地方政府等按照“菜单”制定并申请特区计划，一经批准，获批地区的相应管制即被放宽。规定的就是这样一种安排。

这套“提案”→“菜单化”→“批准”的程序原则上每年进行三次，诞生了许多“特区”，但事情还没有完。④“特区”设置后一年以内，“对特例措施的社会效果进行政策评估”，被评为“向全国推广没有问题”的，将“修改规定了该管制的法律”。⑤于是“特区”被撤销，进而向全国推广——就是这样的机制。也就是说，“特区”还被定位为实施全面“管制改革”的第一步。据内阁府 2019 年 3 月的发布，2002 年以来累计有 1327 个特区获得认定，其中 909 件已推广至全国。

关于这个“结构改革特区”制度，由于“特区”中小规模者居多，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搞活地方经济，予以肯定。

不过，一旦推广到全国（废除管制），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一个“特区”的案例：企业租入闲置农地“经营农业”（2003 年）。据称没有产生多大弊害，随后推广至全国（2005 年），进而又通过《农地法》的大修订（2009 年），发展到股份公司经营农业得到积极推进，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在人口日益稀疏、耕种者越来越少的农村，如

果有企业（股份公司）愿意承担农业，那么允许把农地租给这样的企业，让它经营农业，自然无妨。但是，这件事（批准那样的“特区”），与企业（股份公司）可以在任何地方租农地经营农业（撤销管制），应当看作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个案例中，允许股份公司进入农业，原本就是小泉内阁的意图所在，让人觉得“特区”正是为此而被巧妙利用了。

按照规定，“特区”要推广至全国，必须获得由有识之士等组成的“评估·调整委员会”的赞同。然而，如果“特区”原本就被定位为实施全面管制改革的第一步，那么指望其制度之下的“评估·调整委员会”对全国推广起到“刹车”作用，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关于“特区”制度，或许是效仿这一“结构改革特区”，其后在民主党政权时期设立了“综合特区”（2011 年），在第二届安倍内阁时期设立了“国家战略特区”（2013 年）。

无论哪一个，在只限一定区域放宽（或者撤销）管制这一点上都与“结构改革特区”相同，但规模要大得多。而且，两者的不同还在于：都不只是“放松管制”，还可获得税制、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后者（“国家战略特区”）在计划与方针的制定上，采取的是由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的机制。加计学园问题那种政权最高层与经营者勾结嫌疑极重的案件之所以会出现，原因正在于此；小泉内阁也开了一个“特区”的恶劣先例。

财政·税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这里也谈一下小泉内阁在财政、税制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或者说是“改革”）。

小泉首相在就职时的施政理念演说中表示：“在平成十四年度（2002 年度）预算中，作为财政健全化的第一步，将以把国债发行额

控制在 30 万亿日元以下为目标。”《基本方针（2001）》也同样写入：“作为财政健全化的第一步，以把国债发行额抑制在 30 万亿日元以下为目标。”

既然这样的“国债发行额 30 万亿日元以下”是小泉内阁提出的“财政健全化”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基础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转为盈余”。关于这一点，他在上述施政理念演说中表示：“为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平衡，下一步的目标包括：除偿还过去借款本息以外的岁出不依靠新的借款，等等。我们将致力于真正的财政重建。”2003 年 6 月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方针（2003）》中，也写入了“争取在 2010 年代初期实现中央与地方合计的基础财政收支盈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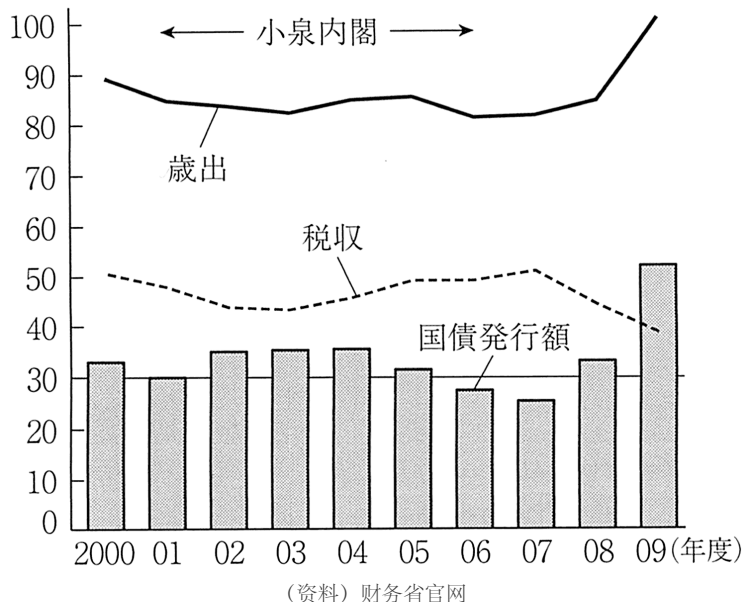
这两个目标的实绩如何呢。

“国债 30 万亿日元以下”几乎在所有年份都未能达成

从小泉内阁执政六年的实绩来看，“国债发行额 30 万亿日元以下”这一目标，达成的只有第一年（2001 年度）和最后一年（2006 年度）两年；中间的四年，发行额大多在 35 万亿日元上下，大大超出了抑制目标（图表 5-14）。

①虽然几乎每年都削减公共工程相关费用（图表 5-15）、抑制社会保障相关费用等，压住了岁出，但仍未能充分压住；②（尤其是前半期）受不良债权处置政策造成的景气恶化等影响，税收出现下滑——这是其背景（图表 5-14）。即便是看似守住了“30 万亿日元框架”的 2001 年度（年初预算由森内阁编制，小泉内阁编制了第一次、第二次补充预算），也是动用了种种手段才达成的：按规定本应拨入“国债整理基金”（国债偿还的财源）的 NTT 股票出售收入，却通过制定特例法拨入了一般财源，等等。而最后一年 2006 年度勉强压到

图表 5-14 国家一般会计（岁出·税收·国债发行额）的走势
(兆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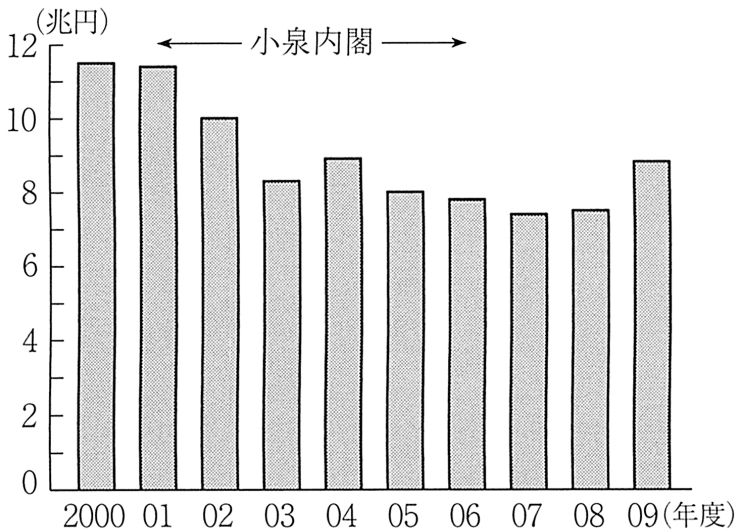
30 万亿日元以下，靠的也是大幅削减地方交付税交付金等相当勉强的做法。

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地方达成了，但……

基础财政收支转盈目标方面，从 2001 年度的 -4.2% （占名义 GDP 比重）

到 2003 年度的 -5.6% ，小泉内阁上台之初有所恶化；2004 年度以后转向改善，2006 年度为 -1.7% ，正接近平衡（图表 5-16）。分中央与地方来看，地方 2004 年度达到 0.0% ，实现了平衡，2005 年度以后转为盈余。据认为，这是因为地方（地方政府）与中央相比筹措财源的自由度更低，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岁出抑制措施。2006 年

图表 5-15 公共工程相关费用的走势



(注) 按补充后预算口径
(资料) 财务省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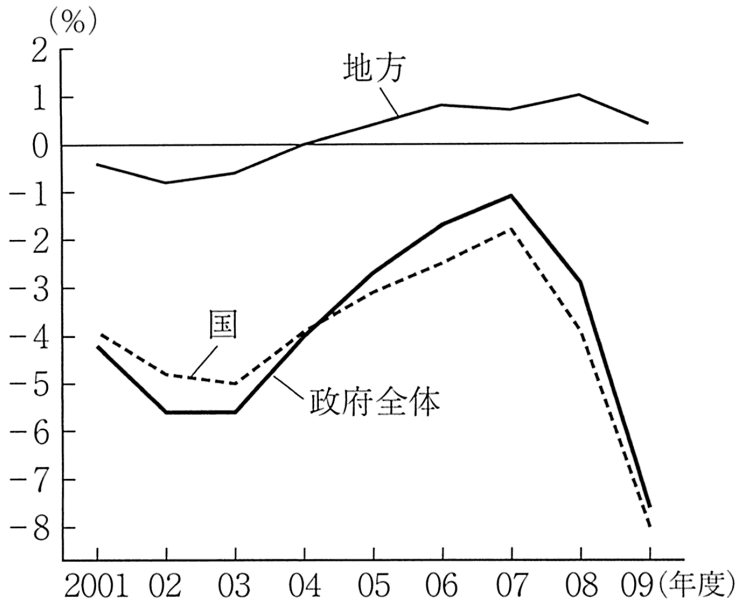
还发生了夕张市申请成为财政重建团体的事。财政危机意识已渗透到众多地方政府，其影响也很大。承受其害的，是福利等服务被削减（想必）的居民，以及因削减编制等而劳动强度加大（想必）的地方政府职员。

不过，这种基础财政收支趋向平衡的走势，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雷曼冲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举化为乌有（图表 5-16）；这一点要留到稍后再讲。

国民负担加重

护理	生活保护	其他
修订《雇用保险法》（费率上调）		
上调 65 岁以上者的护理保险费		

图表 5-16 基础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的走势



(注) 基础财政收支占 GDP 比重
(资料) 内阁府官网

(续表)

护理	生活保护	其他
	缩减老年加给 (06 年度全部废除)	
修订《护理保险法》(伙食费、居住费改为全额自付)	缩减母子加给 (09 年度全部废除)	上调雇用保险费
上调 65 岁以上者的保险费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

在小泉内阁财政健全化政策之下受到重大影响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金、医疗、护理、生活保护等所有领域都实施了重大改革（大半是服务内容变差、自付金额增加那一类“改革”）。

在养老金领域（2004 年改革），决定了以下内容：①厚生年金与国民年金的保费均分阶段逐年上调，直至 2017 年；②引入宏观经济滑动机制（将全社会保费负担能力的增长反映到养老金金额中的方式）。这是一场打着“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百年安心计划”旗号的制度改革。

在医疗领域，本人医疗费负担原则上提高到三成（2002 年改革），并决定创设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2006 年改革）。

在生活保护领域，决定了废除老年加给、母子加给的方针（2004 年改革、2005 年改革），等等。

若把增税措施也包括在内，从人们的生活角度汇总主要“改革”，则如图表 5-17 所示。

图表 5-17 小泉内阁执政下的

年	税制	养老金	医疗
2002	废除面向老年人的小额 储蓄免税制度		制定医疗制度改革相关 法（本人负担提至 3 成）
2003	废除所得税的配偶特别 扣除		
2004	废除所得税·居民税的老 年人扣除	修订养老金制度（上调 保费等）	
2005	缩减定率减税		修订医疗保险制度（上 调 70 岁以上者自付比例 等）
2006	废除定率减税		修订《健康保险法》（创 设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注）年份为决定之年

还不止于此。小泉内阁 2006 年 7 月经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方针（2006）》，末尾刊载了一张题为“今后五年岁出改革概要”的表。“要在 2011 年度之前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的盈余化，所需消除的待应对金额约为 16.5 万亿日元”，为此“至少有 11.4 万亿日元以上要通过

削减岁出来应对”，于是按领域列出了削减额。据此，社会保障方面，2011 年度的支出额若放任不管将达 39.9 万亿日元；要通过“改革”将其压至 38.3 万亿日元，削减约 1.6 万亿日元——表中这样写道。

这项计划，就是每年削减约 3300 亿日元的自然增长（维持制度不变时，随高龄人口增加等而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额）。这是在留言交代：制度的“改革（改坏！）”还在半途，今后也必须继续下去。

还有下文。这张表还配着一句：“岁出改革应对不完的待应对金额（2～5 万亿日元），将通过岁入改革来应对”——说到底，就是“增税”的留言。

以“改革”削减岁出、以“增税”增加岁入——这就是小泉内阁托付给后继内阁的课题。

4 景气在出口主导下回升，但内需持续低迷

下面就来看看小泉内阁各项“改革”实施之下日本经济的动向。

小泉内阁成立之初陷入低迷的景气，以内阁成立次年的 2002 年 1 月为谷底，开始转向回升（图表 1-1、1-3）。其背景是：中国增长率上升、美国走出 IT 泡沫破裂造成的萧条等，世界经济好转，出口增加。

不过，由于推进不良债权处置等因素，2002 年设备投资大幅下滑，民间需求依然不振；尽管这一年景气转向回升，GDP 实际增长率仍只有 0.1%（图表 5-18）。

图表 5-18 出口增加带来的景气回升
（单位：%）

年	GDP 实际增长率	剔除出口增加部分后的增长率
2002	0.1	△0.7
2003	1.5	0.5
2004	2.2	0.5

(续表)

年	GDP 实际增长率	剔除出口增加部分后的增长率
2005	1.7	0.8
2006	1.4	0.0

（注）依据图表 5-1 算出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

实际增长率从 2003 年起开始走高。不良债权处置这一重压开始卸下，设备投资转为增加，民间需求的贡献转为正值，与持续大幅为正的出口一道，开始牵引景气回升。

这一趋势持续到小泉内阁的最后一年，即 2006 年。此外，这期间公共需求在多数年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是小泉内阁抑制公共投资政策的必然结果。

观察始于 2002 年的景气回升期，出口增加的贡献极大。这一点在图表 5-1 中也显而易见：试算 2002 年以后各年的实际增长率，再从中扣除出口增加的贡献部分，就得到图表 5-18。虽是极为粗略的数字，但其含义是：倘若没有出口增加，这期间各年的实际增长率就会不足 1%。

“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回升”，是这期间小泉首相屡屡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然而，尽管实施了堪称“充分”的“结构改革”，“改革”结出果实所带来的景气回升却并未到来。景气回升完全归因于出口的增加。也就是说，它沾了海外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大好形势的光。换言之，“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回升”这句口头禅是谎言。

5 雷曼冲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结构改革”的矛盾表面化

2006 年 9 月，随着自民党总裁任期（两届 6 年）届满，小泉内阁下台，安倍晋三内阁上台。此后，第一届安倍内阁（2006 年 9 月～2007 年 9 月）、福田康夫内阁（2007 年 9 月～2008 年 9 月）、麻生太郎内阁（2008 年 9 月～2009 年 9 月），无一例外都是任期限一年上下的短命内阁。

小泉之后三届内阁的这约三年间，是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都发生重大动荡的三年。

2007 年 7 月，政府与执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

先看动荡之一。国内政治方面，在 2007 年 7 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安倍内阁的执政党自民、公明两党遭遇大败（自民党改选议席数 64→获得议席数 37，公明党同为 12→9）。结果，安倍内阁执政党的参议院议席数变为 105 席（自民 83、公明 20、其他 2），跌破过半数（122）。取而代之的是声势大涨的民主党（改选议席数 32→获得议席数 60，参议院议席数 81→109）。再加上对安倍内阁政策明确采取反对立场的共产党、社民党、国民新党，在野党议席数达到 125 席。由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安倍内阁即使提出法案并使其在众议院通过，也会在参议院遭到否决。

安倍内阁是高举“建设美丽国家”“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起步的。

从内阁成立的 2006 年到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的 2007 年 7 月之间，安倍内阁完成了《教育基本法》的修订、《防卫厅设置法》的修订（由厅升格为省）、修宪程序相关法（《国民投票法》）的制定等事

项。在 2007 年年初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2007 年 1 月）中，安倍首相也说：“已经到了应该把战后体制追溯至原点、大胆重新审视、重新启航的时候了。……描绘出足以经受住今后 50 年、100 年时代惊涛骇浪的新国家形象，正是我的使命。”甚至还表明了这样的决心：“把今年定位为‘美丽国家创建元年’，我要亲自站在最前列，……为实现各项改革倾注全身全心，毫不退缩地前进。”

然而，那一切也只持续到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为止。

关于 2007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安倍内阁执政党的惨败，可以举出三大原因。

一是安倍首相在阁僚人事上的失败。内阁成立不到一年，就有 6 名阁僚或因事务所经费违规处理嫌疑，或因“不当发言”（“女性是生育机器”“投下原子弹也是没办法的事”等），遭到严厉谴责（其中 1 人自杀、4 人辞职）。这正是安倍内阁的缺点暴露的结果：它起用在 2006 年 7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为安倍当选总裁立下功劳的人担任阁僚，被当时的媒体讥讽为“论功行赏内阁”“好友内阁”。

二是 2007 年 2 月，社会保险厅的养老金记录缺失问题（约 5000 万件）曝光，查明有大量本应能够领取养老金的人却领不到养老金（“养老金消失问题”）。这是 1997 年引入基础养老金编号以来在事务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历代政府的责任受到追问，对政权和执政党而言是一个于选举不利的问题。

三是当时的最大在野党民主党。该党自 2006 年 4 月更换为小泽一郎党代表（菅直人代理代表、鸠山由纪夫干事长）的体制以后，由此前的前原诚司代表（因承担 2006 年 2 月假邮件事件的责任而辞职）时期的“替代方案路线”（认为民主党的主张与小泉内阁推行的“结构改革”相通，在“改革”的速度与手法上展开竞争的路线），转向否定小泉“结构改革”的“对立轴路线”，并因此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沦为跛脚鸭的小泉后继三内阁

参议院选举败北后的安倍内阁，以及随后的福田内阁、麻生内阁，都是无法实施“改革”政策的所谓跛脚鸭内阁。或者说，是为了挽回局面，又或者是为了不使局面（对自己一方）进一步恶化，一心想在大选中获胜，只顾窥伺那个时机的“窥伺解散时机的政权”。

先看安倍内阁。

安倍首相在参议院选举后的 2007 年 8 月改组了内阁。新内阁上路后没几天，就发生了农水大臣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辞职（在任 8 天）的意外；新内阁以自民党领袖级人物为主要大臣，虽被讥讽为“派系领袖内阁”“PTAA 内阁”，但不管怎么说，还算是一个吸取了改组前内阁失败的教训、准备面向未来的内阁。安倍首相率领着这样的阁僚阵容，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召开临时国会，发表施政理念演说，称“将履行职守”。

然而，就在预定由在野党针对这一施政理念演说提出代表质询的 9 月 12 日，安倍首相突然表明了辞意。

关于安倍首相的辞职理由，事后由其本人说明为“身体不适所致”；但据我推想，恐怕是将于 2007 年 11 月 1 日到期的《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2001 年成立，是为期两年的限时立法，其后曾多次延长。在该法之下，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为美国海军等的军舰开展供油等活动）因遭到在野党反对而延长无望，结果将无法再为美军开展供油活动——他对此深感苦恼，以致身体不适，乃至辞职。

就这样，在首相表明辞意之后，安倍内阁于 2007 年 9 月 26 日总辞职。

接任的是福田内阁。这个内阁原封不动地接手了安倍改组内阁的大半阁僚（27 名大臣中的 13 名大臣）（“原班人马内阁”!？）。

然而,即使由安倍内阁换成福田内阁,事态也毫无改变,福田内阁依旧是一个几乎办不成任何事的内阁。曾令安倍前首相苦恼(想必如此)的《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于2007年11月1日期限届满而失效,海上自卫队撤出了印度洋。此后,内阁又向国会提出新的《补给支援特别措施法案》并使其获得通过(2007年11月13日在众议院通过,2008年1月11日在参议院遭否决,同日下午在众议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多数再次表决通过而成立),重启了自卫队的派遣(新法于2010年1月15日——民主党政权时期——到期失效)。所能办成的,也就仅此而已。

想必是为了打开这种局面,福田首相向民主党代表小泽发出呼吁,举行了两次“党首会谈”(10月30日、11月2日)。会上福田提出“大联合构想”,提议政权方面接受民主党的大部分政策,据说小泽代表一度倾向于积极回应。然而,在把此事带回民主党后召开的临时干部会上,除小泽代表外的全体干部均表反对,“大联合”就此化为泡影。

次年2008年9月1日,福田首相突然表明辞意(理由虽不明,但想来是因为,在福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之中,选出一张“新面孔”,并趁其支持率尚高之际解散国会、投入大选是必要的——想必是出于这样的盘算吧),福田内阁总辞职,麻生内阁作为继任内阁成立(9月24日)。一届连其本人与他人人都公认的“为了选举的内阁”就此诞生。

2008年9月,麻生“为了选举的内阁”成立,雷曼冲击恰在此时
袭来

麻生内阁自认是一个“为了选举的内阁”,这一点只要看麻生首相就任时的施政理念演说(2008年9月29日),就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这篇以“我麻生太郎,此次……诚惶诚恐地拜受御名御玺……”开场的演说,一进入正题,就劈头批判民主党:“在先前的国会上,民主党在其掌控的参议院,把税制法案束之高阁……自始至终秉持着以政局为第一位、以国民生活为第二位、第三位的姿态。”接下来是对民主党的要求和质问。要求:“(对补充预算)若有不能接受之处,请连同论据在代表质询中提出”;质问:“对填补地方道路财源的相关法案……的赞成与否,也愿一并听取”“日美同盟与联合国。二者打算如何排出先后优劣……愿连同论据一并请教”;最后以要求“强烈要求配合国会运营”作结,简直就是一篇与选举演说无异的“施政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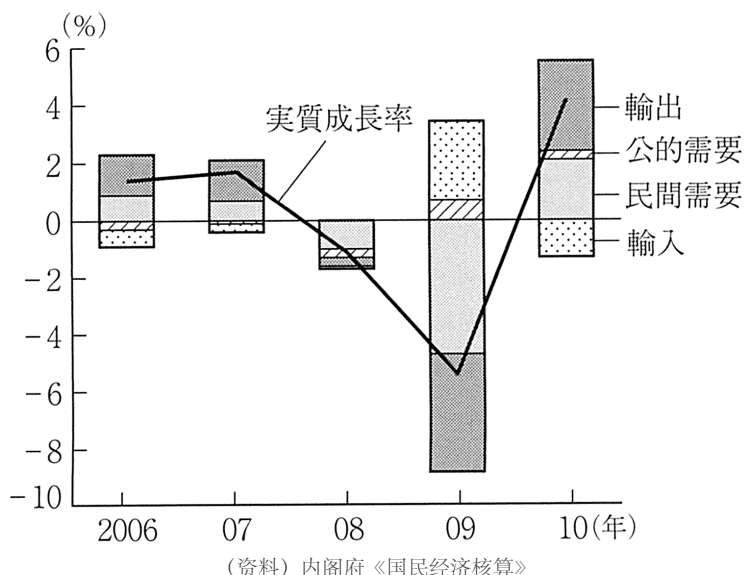
同时,它还“表明”了近乎选举公约的“施政理念”:对“长寿医疗制度(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将以一年为期,研究必要的修改,以使老年人能够接受”,“劳动者派遣制度的修改也将推进”,等等;加上这些,整篇“演说”处处流露出随时都要解散国会、投入大选的气息。

然而,尽管麻生内阁在成立之初拥有相对较高的内阁支持率,接近 50% (据各报社民意调查) (福田内阁末期的支持率在 20% 上下),却未能马上解散国会。

从前首相福田表明辞意到麻生内阁成立,就在日本政权交替的同一时期,雷曼冲击(以 9 月 15 日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了。这是袭击小泉之后三任继任内阁的大动荡中的第二个,即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动荡——也就是“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雷曼冲击之前,“危机”已经开始。面向美国低收入者的住房贷款,即次级贷款,以房价上涨为前提,并把升值收益计入偿还贷款、支付利息的财源——在房价上涨趋缓、或者不再上涨、最终开始下

图表 5-19 GDP 实际增长率与贡献度的走势④



跌的 2006 年以来的形势变化之下，开始变得难以回收，沦为不良债权。随之而来，将这些住房贷款债权证券化后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销往众多国家的次级证券，也开始大幅贬值。这就是“次贷危机”。而这场危机又延烧开来，演变成令大量持有次级证券的金融机构经营岌岌可危的“金融危机”。

日本金融机构等对次级证券的投资比欧美少，日本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似乎也不大；但是，次贷危机使欧美各国的景气转向减速，而这一减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如前所见，在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之下，日本经济国内需求增长乏力，已经彻底变成了出口依赖型经济（参见图表 5-1、5-19）。早在福田内阁后半期、2008 年 3 月起，日本经济就已进入景气下行局面。而就在此时，更大的危机——雷曼冲击——袭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到来。这

就需要拿出像样的景气对策，而且必须紧急出台；对麻生内阁而言，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的剧本已无法变为现实。

麻生内阁在成立之初似乎低估了这场危机。在前面所引的施政理念演说中，麻生首相夸口道：“政府与执政党手里有‘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2008 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并呼吁“作为〔其实实施之〕后盾的补充预算，它的成立才是名副其实的燃眉之急”，要求民主党给予配合。然而，那一政策完全不够充分。

于是，接着又制定并通过了“生活对策”（2008 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进而编制并通过了包含“保卫生活的紧急对策”的“2009 年度预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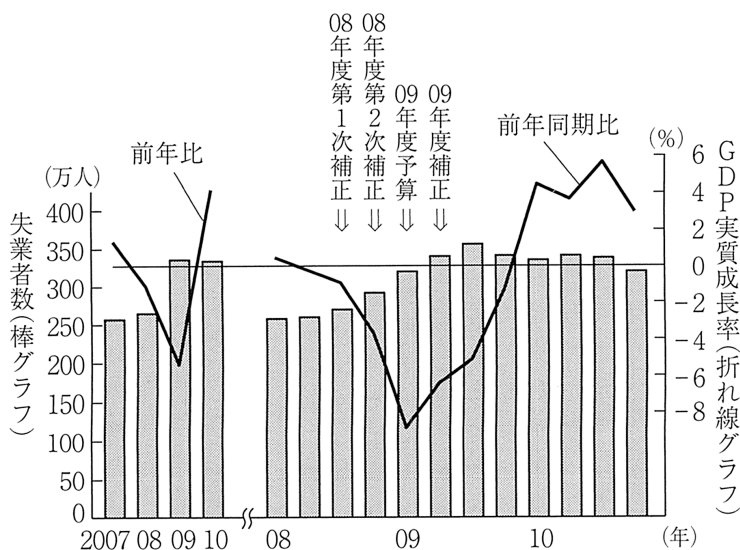
即便如此，GDP 实际增长率仍大幅负增长，失业者增加，失业率上升（图表 5-20）。能够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的局面迟迟未能出现。

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动作——想来就是如此吧。等到 2009 年度预算通过后，编制并通过了“超大型”的“经济危机对策”（第一次补充预算）（2009 年 5 月 29 日）。麻生内阁时期各项对策、预算的概要等，见（图表 5-21）。

“什么都行”的“经济危机对策”

自 2008 年 8 月开始，10 月，接着 12 月，接二连三打出的景气对策（图表 5-21）；尽管如此，麻生内阁仍不得不在 2009 年 4 月再推出新的“经济危机对策”，这既体现了雷曼冲击的冲击力之大，也体现了此前的对策半途而废、未能发挥出足以阻止经济下滑的力量。从“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保卫生活的紧急对策”之类的命名也可以看出，2008 年的三轮对策，总的说来，是以应对雷曼冲击下人们生活的恶化和中小企业经营困境为主的（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顾及选举的）对策。

图表 5-20 雷曼冲击前后的日本经济



(注) ↓标记表示麻生内阁时期的预算成立时间

(资料) 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厚生劳动省《劳动力调查》

图表 5-21 麻生内阁的景气对策

名称	主要内容	计划	
		制定日	预算成立日
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08 年度第 1 次补充预算）	・总额 11.5 万亿日元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援 紧急担保额度 6 万亿日元 紧急贷款额度 3 万亿日元 ・对老年人的支援等	08 年 8 月 29 日（计划由福田内阁制定）	08 年 10 月 16 日
生活对策（08 年度第 2 次补充预算）	・总额 27 万亿日元 ・定额给付金 2 万亿日元 ・对中小企业的支援 担保、贷款额度 30 万亿日元	08 年 10 月 30 日	09 年 1 月 27 日

(续表)

名称	主要内容	计划	
	元・下调高速公路通行费		
保卫生活的紧急对策（09 年度预算）	・总额 37 万亿日元・下调雇佣保险费・住房贷款减税・环保车减税・节能投资减税	08 年 12 月 19 日	09 年 3 月 27 日
经济危机对策（09 年度补充预算）	・总额 15.7 万亿日元・对生活者的支援・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对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援・低碳革命・基础设施建设	09 年 4 月 10 日	09 年 5 月 29 日

（资料）财务省官网

当然，作为经济对策，那也是重要的；但是，在景气下滑已经开始、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的 2008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期间，比那更为必需的，是防止景气下滑（或者减轻下滑程度）的政策，那才是更为紧迫的政策。2008 年下半年的三轮对策中，恰恰缺少这样的政策。在麻生首相的脑海里，哪怕是在无意识之中，莫非也是选举对策的念头压过了景气对策吗？

重视景气的正式对策终于推出，已是 2009 年 4 月的“经济危机对策”（2009 年度补充预算）。

在这份补充预算编制之前，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与谢野馨据说曾向各省厅发出指示：“什么都行，希望你们把‘子弹’（政策）打出来”（《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4 月 12 日）。也就是说，政权首脑的危机意识（终于）增强到了这种地步。而在这一指示之下，据说执政党的议员们也大为振奋，称“众议院选举前迎来了千载难逢的

机会”（同上）。就这样，编制出了总额达 15 万亿日元的超大型补充预算。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各省厅的设施建设费。这项经费在 2009 年度年初预算中为 6500 亿日元，补充预算又追加了 2.9 万亿日元。补充后的规模一举扩大到五倍以上。搭上这趟顺风车的还有：警察厅购入 8000 辆巡逻车，耗资 1400 亿日元增设监控摄像头；防卫省也购入 5700 辆环保车、2.2 万台数字电视，等等。

财界也没闲着。2009 年 3 月 9 日（国会尚在审议 2009 年度预算案），经团联发表了以“要求尽早执行平成二十一年度〔2009 年度〕补充预算”为副题的《摆脱经济危机的紧急建言》，罗列了种种要求事项：环保车购置支援措施、为普及节能型家电的支援措施、大都市圈环状道路提前完工、大幅扩充赠与税基础扣除额、扩充就业安全网并促使劳动力顺畅流动、扩充雇用调整补助金制度，等等，合计约三十项。

就这样，编制出了一份对政府部门的要求照单全收、对财界的要求也照单全收的补充预算。补充后的预算规模达 102 万亿日元，为战后最大。国债发行额为 44 万亿日元（决算阶段为 52 万亿日元），岁出的国债依赖度为 43.0%，这些也都创下历史之最。

在小泉内阁严格抑制岁出的政策下逐步缩小了的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一举扩大（图表 5-16）。

不管怎样，部分得益于这种超大型补充预算，已于 2009 年 3 月触底的景气（图表 5-19），开始逐步回升，GDP 实际增长率同比下降的幅度也开始趋于缩小（图表 5-20）。

2009 年 7 月 21 日，麻生首相解散众议院，毅然投身大选。

“结构改革”催生出的“派遣村”

雷曼冲击造成的景气下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苦难。

其表现之一，就是 2008 年年底至 2009 年年初出现在东京市中心日比谷公园（以及全国许多城市）的“派遣村”。

“派遣村”，就直接原因而言，是雷曼冲击造成的战后最大景气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失业者增加所催生的；但更为本质地说，它是作为“结构改革”的一环，在桥本内阁任内、继而在小泉内阁任内实施的劳动的放松管制——尤其是派遣劳动的放松管制——所催生的。

派遣劳动者的人数随着放松管制而趋于增加，尤其是 2003 年对制造业开放派遣之后。2000 年代初还为 20 万～30 万人，到雷曼冲击发生的 2008 年已达 140 万人（厚生劳动省《劳动力调查》）。这些人随着景气下滑，因雇主方面“合同到期”“不再续签”之类的做法而沦为失业者（派遣劳动者的人数到 2010 年降至 96 万人，两年间减少了约 40 万人）。2009 年至 2010 年的两年间，失业者人数增加了 70 万，据推测其中大半是以派遣劳动者为主的非正规职员。

与还有故乡农村（老家）可回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2000 年代的失业者（尤其是许多派遣劳动者）一旦失业并被赶出员工宿舍，就无处栖身，既没有肯收留自己的熟人，也没有生活的积蓄。出现了所谓“网吧难民”之类的状况，自 2007 年前后起已为人所知（据 2007 年夏厚生劳动省的调查，为 5400 人），而随着失业者大量出现，这种状况一举演变成了社会问题。

看不下去的有志之士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 月 5 日，在日比谷公园搭起帐篷，开设了“跨年派遣村”（名誉“村长”为宇都宫健儿律师，“村长”为汤浅诚，即自立生活支援中心“Moyai”事务局

长)。他们得到工会和志愿者的协助,还有来自普通市民的捐款,开展了施粥供餐等活动。据说期间有 500 名失业者到访。此外,还开展了与厚生劳动省等方面交涉、促其在东京都内设立临时住宿点、陪同申请生活保护并使其获得给付等活动。效仿此举,这一年全国共设立了 161 处“派遣村”(据全劳联统计)。

另外,次年即 2009 年至 2010 年间,政府(民主党政府)也出面,作为“紧急就业对策”的一环,在全国各地实施了失业者支援对策。在东京都,还以国立奥林匹克青少年综合纪念中心为会场,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0 年 1 月 4 日开设了“公设派遣村”等。

劳动者派遣制度因“放松管制”而扩大,对企业而言,不仅能以低廉工资雇到人,还有雇用调整易于进行等诸多好处;但对被雇用的一方来说,却是极其麻烦的制度,对社会整体而言也是有害的制度。“派遣村”以极具冲击性的形式,将这一点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第六章 “结构性改革”究竟是什么（第四、五章补论）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先在这里看一看：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的时代所推行的“结构性改革”究竟是什么，它又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1 “结构性改革”究竟是什么

“结构性改革”究竟是什么。

可以从四个侧面来把握它。

第一，它是以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名义）推行的政策：把日本经济从泡沫破裂后景气不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让景气真正好起来。

第二，它是仿效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政策而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第三，它是回应以经团联为首的财界（宽泛地说即经济界）要求的政策。

第四，它是回应来自美国的要求的政策。

以下依次来看。

号称“为了再生日本经济”的政策

先讲第一个侧面。

前文写道：“结构改革”是“以把日本经济从景气不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让景气真正好起来为目的（或者说名义）而推行的政策”。这里之所以特意写作“名义”，是因为：以此名义推行固然确凿无疑，但它是否真是以此为目的的政策，却令人怀疑。

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确实曾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然而，其原因究竟是否在于日本经济的“结构”，“结构改革”论者是否真的这样认为，都令人怀疑。关于这一点，有两条理由。其一：把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低迷同“结构”挂钩，十分牵强。这是本书已经写过的，重复一下：①泡沫破裂后的景气衰退之所以拖长，是对泡沫期景气好过了头的反作用。证据是，在还没有实施什么像样的“结构改革”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景气就已经开始回升。归根结底，那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结构”的问题。②而这场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景气回升在短时间内就结束了，1997年以后，景气再度下滑。但这次下滑并非因为日本经济的“结构”不好，而是当时的桥本内阁强行推行“财政结构改革”“金融大爆炸”等“改革”政策所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的景气下滑，可以说是一场“改革带来的萧条”。③把日本经济从这场景气下滑中拯救出来的，是小渊内阁停止了“结构改革”、或者说采用了反“结构改革”政策。④不过，小渊内阁政策见效所带来的景气回升也未能持久。2000年至2001年间，景气再度进入下行局面，这是受美国IT泡沫破裂影响所致——这样一路看来，要说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混乱”局面，并不需要“结构”论。而且——这才是关键之处——这里所写的一切，只要不抱先入之见地观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1年间日本经济的动向，任谁都看得出来。“结构改革”论者对此也应该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结构改革”？

其二：政府把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的“混乱”解释为“结构不好所致”，而其论述几乎完全没有给出论据。

例如，最先推行“结构改革”政策的桥本首相，关于其理由（或者说背景），只说到“现行机制显然反而妨碍了我国富有活力的发展”（1997年1月，施政方针演说）。小泉首相同样只是陈述了自己的“信念”：“我本着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这一信念，通过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各领域的结构改革”（2001年5月，施政理念演说）。

在政府文件中，着墨最多论述“结构改革”的，恐怕要算“经济战略会议”的《日本经济再生战略》（1999年2月）。而其中所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断言：“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式增长原动力的日本式体制，到处都已出现破绽，并一直作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在起作用”。接着，第一是“日本式的雇用·工资体系和优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是“过度重视平等·公平的日本式社会体系”，第三是“日本式的隐性资产经营、日本式间接金融体系”——应“改革”的“结构”就这样在没有任何“为什么”的证明之下，近乎“钦定”式地罗列出来而已。

这样看下来，关于第一个侧面，除了这样说之外别无他法：“结构改革”无非是一项“打着让日本经济再生这一名义推行的政策”，也只能如此表述。

仿效英美的政策

接下来讲第二个侧面。

日本的“结构改革”，是仿效英国撒切尔首相及随后的梅杰首相的保守党政权（1979～1997年）的政策、以及美国里根政权（1981～1989年）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来的，这一点众所周知。

先来看撒切尔政权的政策。第一是缩小政府部门。

其一是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以英国石油为开端，电力、煤气、自来水、邮政、铁路，等等。其二是把垃圾处理、清扫、建筑、修缮等服务委托民间承办，在这一过程中，还以“削减臃肿化了的地方政府的成本”为目的，引入了“市场化测试”。其三是调整了被誉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英国福利制度。如医院实行独立核算制、引入竞争机制等。养老金制度也进行了调整。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政策”。修改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限制封闭工厂制协定（即一旦失去工会会员资格就不能再当雇员的协议）、限制罢工，等等。此外还放宽各项劳动管制、废除最低工资制。

第三是金融与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大爆炸）。

第四是税制改革。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下调法人税率，与此同时上调增值税率（即日本的消费税率）。

撒切尔—梅杰政权的这些政策，大多也在日本的“结构改革”中推行了。

接下来看里根政权的政策。第一是削减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其理由是，福利政策“挤压财政、削弱劳动者的活力”。

第二是放松管制。在美国，放松管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里根政权诞生之前——就已从运输领域开始（放宽铁路运价管制、开放航空运输业准入等），里根政权上台后，这一进程加速并全面展开。如解除石油相关管制、停止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的指导方针，等等。

第三是税制改革。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下调法人税率，等等。

第四，军事支出则大幅增加。

里根的这些政策，大多也由桥本内阁、进而小泉内阁、乃至后来的安倍内阁，作为“结构改革”政策在日本推行。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留意。

撒切尔以及里根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背景之一，是英美两国都遭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严重通货膨胀。此外还有一点：英美两国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德国、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迎头赶上，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等，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成为国家课题”。也就是说，两国为抑制通胀、为增强产业竞争力而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各有其相应缘由的。

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又如何呢？那是一个不是通胀而是通缩的时代。再看国际收支：经常收支、贸易收支均为世界数一数二的顺差国。只要以国际收支来衡量国际竞争力（此外也没有别的衡量指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极强的。

把抑制通胀的政策（例如抑制工资上涨的政策，那是撒切尔倾力推行、里根也强力实施的政策）拿到通缩之下来实施，结果会如何？又如，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拿到经常收支、贸易收支均为顺差的国家来推行，结果又会如何？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通缩进一步加深，经常收支顺差扩大，日元升值进一步加剧——这就是2010年前后在日本经济上发生的事情。

回应财界（经济界）要求的政策

下面讲第三个侧面，即“回应财界要求的政策”。

在时隔许久才成立的自民党单独内阁——第二届桥本内阁上台（1996年11月）之前，1996年1月，经团联发表了题为“有魅力的日本——对创造的责任”的“经团联愿景2020”（通称“丰田愿景”）。其中的主张是“要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就必须废除管制’‘就应当

搞小政府’”等等。说“结构改革”政策就是照单全收了这份东西也毫不夸张——它与此后政府的政策重合之处之多，就到了这个地步。

此外，在这份“愿景”公布之后的1996年12月，经团联还公布了题为“确立财政民主主义，建设值得纳税的国家”的《面向财政结构改革的建言》。这是一份为桥本“五项改革”（后来是“六项改革”）之一的“财政结构改革”的实施推波助澜的“建言”。

还有一份，是1995年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作为处理劳资问题的团体，与处理经济全局问题的“经团联”分工，2002年与“经团联”合并）公布的《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应当挑战的方向及其具体对策》，在此也一并提及。该文称，日本的“雇用前景将分化为：①以长期持续雇用的理念为基础、企业希望其长期工作、员工也愿意长期工作的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群体，②以专业熟练技能和能力回应企业课题的、并不一定以长期雇用为前提的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群体，③根据职务，从能够完成定型业务的人员到能够完成专业业务的人员不一而足的雇用灵活型群体”，并论述了经营方采取对策的必要性（图表6-1）。

观察此后雇用的动向可以发现，经营方正沿着这一方向，将员工三分化的；而国家的制度也同样在“结构改革”政策的名义下不断推进，如《劳动者派遣法》的修改、裁量劳动制的引入与扩大等。

图表6-1 按群体划分的待遇主要内容

	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 群体	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 群体	雇用灵活型群体
雇用形态	无固定期限雇用合同	固定期限雇用合同	固定期限雇用合同
对象	管理层·综合职·技能 部门的骨干职	专业部门（企划、销 售、研发等）	一般职技能部门销售 部门
工资	月薪制或年薪制职能 工资有加薪制度	年薪制业绩工资无加 薪	计时工资制职务工资 无加薪
奖金	定率+随业绩浮动	按成果分配	定率

(续表)

	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 群体	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 群体	雇用灵活型群体
退休金·年金	积分制	无	无
晋升·升级	职务晋升职能资格升 级	业绩评价	向更高职务转任
福利措施	覆盖整个职业生涯的 综合措施	生活援助措施	生活援助措施

(资料) 日经联《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

这一点在税制“改革”上也是一样的。经团联每年向政府提交税制修改“要求·提案”，有时还提交“意见书”，而其要求也好、意见也好，大多都被政府采纳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下调法人税率”“上调消费税率”等。

如此看来，“结构改革”政策与财界的要求密不可分；而这种政、财一体化，在小泉内阁以后的自民党、公明党联合内阁时代愈发强化。因为内阁设置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延揽了两名财界人士作为民间（据部分媒体报道，是“有识之士”）议员入会。财界的意见，大半作为民间（而且是“有识之士”！）的意见在咨询会议上被接受并决定，再原封不动地由内阁会议敲定——这样一条路径就此建成了。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所说的“改革”，成了财界所要求的“改革”。顺便一提。下面来看看关于消费税的今后走向，财界（经团联）是怎么考虑的。

其“建言”（《要求切实执行增长战略、坚决推进财政重建》，2012年5月）称：“到2020年代中期之前，将消费税率上调至百分之十几的后半段，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说明，“建言”的正文如上文所述是“百分之十几的后半段”（16%~19%?），但“建言”中的图表则写明，是在“2017~2025年度期间，每年将税率上调1%，最终定

为19%”的前提下，对（将来的国民负担率）作了试算。“应当上调到19%”，这看来就是经团联的建言。

政府今后如何应对，值得关注。

“应美国要求”的政策

下面讲第四个侧面。

二战结束后的日美经济关系，大体上看，经历了如下变化：①美国保护、培育日本经济的时代（1945～1960年前后），到②日美蜜月时代（六十年代），再到③日美竞争时代（七十年代以后）（图表6-2）。在最初阶段，美国政府方面主要挑剔的，是日本在纺织品、汽车等个别商品上的出口激增；但渐渐地，美国政府的关切转向了另一个问题：日本商品大多在美国市场不断提高份额，美国商品却始终打不进日本市场。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是“结构问题”，即日本的流通机制和政府管制存在问题。时代从“日美通商摩擦”的时代转向了“日美结构磋商”的时代，九十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其开端，应当追溯到1989年前后：为了消除日美贸易摩擦，美国提议并启动了“日美结构磋商”（1989年至1990年间共举行五次，由美国（老）布什总统与日本宇野宗佑首相达成一致）。对日本，美方提出了扩大公共投资、调整土地税制、放松《大店法》管制等要求。其意图在于增加美国的出口，或者增加对日投资，以此缩小日美贸易的不平衡。其后，1993年，克林顿总统与宫泽首相商定举行“日美综合经济磋商”，进而自1994年起，日美两国政府每年互相向对方政府提交《年度改革要求书》、以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做法确立了下来。

图表 6-2 二战结束后的日美经济关系·简史

- ① 1945~60 年前后（美国作为统治者、保护者、教师，日本处于其下）（1）1945~50 年前后（同盟国占领下）·追究战争责任，要求战后赔偿·实施战后改革（成为此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2）1950~60 年前后（美国谋求强化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国力）·释放战犯，红色清洗·赔偿要求从宽处理·战后改革的回调（“逆转路线”）以追随美国为基本的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等的基本格局由此形成
- ② 1960~70 年前后（日美蜜月时代，日美间的对立关系没有表面化）·美国，黄金的 60 年代 ·日本，高速增长的时代
- ③ 1970 年代以后（日美在经济上成为竞争对手的时代）（1）1970~90 年前后（日美通商摩擦表面化的时代，美国说“别卖那么多”）·日美纺织品谈判（1970~72）以日本纺织品出口自主管制落幕·日美牛肉·柑橘谈判（1977~88）以日本下调关税、实现进口自由化了结·日美汽车问题（1981~／93~）日本的出口自主管制、制定美国产品进口计划等。移交 1993 年起的日美综合经济磋商·MOSS（市场导向型分领域）磋商（1985~86）以日本市场部分自由化、撤销计算机零部件关税等达成一致·日美半导体磋商（1985~91）以日本防止倾销等缔结协定·日美超级计算机问题（1987~90）以日本在政府采购程序方面采取措施等大致了结（2）1990 年前后以后（日美结构磋商的时代，美国说“再多买点”）·日美结构磋商（1989~90），日美综合经济磋商（1993~96）等·相互交换《年度改革要求书》（1994~2008）

从 1994 年秋开始，直到自公政权执政的 2008 年为止，每年秋天，美国政府都会向日本政府提交要求书（大多用 A4 纸写成五十页左右（日译版）的厚厚一册，罗列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看一看这些要求书就会知道，日本政府想必是认认真真地应对了，因为其中很多都作为“结构改革”得到了实现。具体说来，有《禁止垄断法》的修改（解禁控股公司）、《大店法》的废止、《建筑基准法》的修改、《劳动者派遣法》的修改、邮政民营化、法科大学院的设置、《商法》的修改（引入三角合并制度），等等。“结构改革”就是“应美国要求的政策”，这正是其由来。

尤其是小泉内阁时代的“结构改革”，在美国历年“要求书”的开头，都写着“深受鼓舞”“感到振奋”“表示欢迎”“给予评价”“寄

予预期”之类的话，从中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出色地回应了美国政府的预期（图表 6-3）。

举一个具体例子。这是小泉内阁引入“结构改革特区”时的“要求书”（2003 年 10 月 24 日）。

“美国政府将继续关注日本政府旨在日本全国设立特区的现行举措。特别是，美国对迄今由小泉首相设立的 164 个特区表示欢迎。这一面向放松管制与结构改革的崭新而创新的举措，将为日本回归可持续增长轨道提供重要机会。在日本实施这项计划之际，美国提出以下要求”（日译出自美国大使馆）。

图表 6-3 持续受到美国政府好评的“结构改革”——摘自“美国年度改革要求书”

· 美国对日本在管制改革上的持续努力，以及小泉总理“敏捷而迅速”地实施管制改革、坚持“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原则的有力发言感到鼓舞。（2001 年）
· 美国欢迎日本为达成有意义的经济改革而持续努力，并对小泉总理大臣在国会表明的坚决实行“不设禁区的结构改革”的承诺，以及“在所有领域大胆推进管制改革”的决心感到鼓舞。（2002 年）
· 美国欢迎日本为达成有意义的经济改革而持续努力，小泉总理大臣于今年 9 月 22 日表示，新内阁将“继续致力于管制改革”，并坚持“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的政策，对此感到放心。（2003 年）
· 美国强烈支持小泉总理大臣大胆的经济改革课题，……此外，小泉总理大臣在 2004 年 10 月 12 日于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再次确认“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美国欢迎日本为达成有意义的经济改革而持续努力。（2004 年）
· 美国欢迎小泉总理大臣面向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努力。……美国还高度评价一直强有力而有效地倡导管制与结构改革的管制改革·民间开放推进总部和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推进总部的出色工作。（2005 年）
· 美国欢迎安倍总理大臣推进日本经济改革的决心。……此外，美国对日本国内改革推动者的努力感到放心，并预期这些活动在今后数月乃至数年间更加活跃。（2006 年）
· （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无特别评论）（2007 年）

接下来是八项要求。“确保国内外企业双方均能在特区内开展业务的无差别准入”“在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提交特区提

案、参与既有特区以及参与特区设立的全部过程中，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推进总部须继续与这些企业合作”等等。

再问，“结构改革”究竟是什么？

这样一路看下来，所谓“结构改革”，似乎可以说：①首先是回应财界（经济界）要求的政策；加之②是回应美国要求的政策；并且③是效法英国、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更进一步说，话虽如此，毕竟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宣称这是回应财界要求、回应美国要求的政策，所以④它是一项把说辞粉饰成“重振日本经济所必需的政策”的政策——这样看才是正确的解读。

2 “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甚至包括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前半段），中间虽有小渊内阁时期的中断，但仍然持续了大约十年的“结构改革”，究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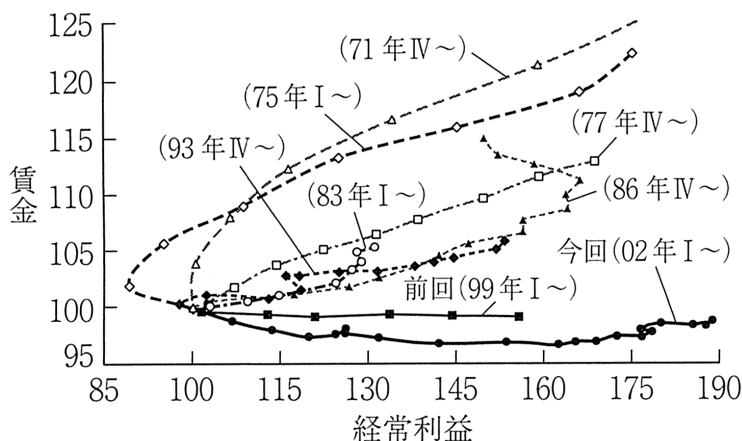
从1997年到2007年，日本经济在“结构改革”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种种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恐怕是“日本经济变成了一种即使景气好转（企业开始赚钱），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

变为“即使景气好转，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

将这一变化以简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是2007年版内阁府《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经济财政白皮书》）。

图表6-4的横轴取企业每名员工的经常利润（日本会计科目，营业利润加减营业外收支），纵轴同样取每名员工的工资，以景气谷底时点为100换算成指数，看的是两者逐季度如何变化。图中有八条线，标有“（1971年IV～）”“（1975年I～）”等字样，分别表示从

图表 6-4 景气回升局面中的企业收益与工资走势



（备注）工资为现金工资总额，经常利润换算为人均值，取后向3期移动平均，以景气谷底为100进行指数化。

（出处）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7年版）》

1971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景气回升期、从1975年第一季度开始的景气回升期。

将这八条线按大类划分，可以分为两类：①朝右上方延伸的线和②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延伸的线。①朝右上方延伸的六条线（1971年IV~、1975年I~、1977年IV~、1983年I~、1986年IV~、1993年IV~）是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半，即“结构改革”以前景气回升期的走势。在这个时代，随着景气回升，企业收益增加，工资也随之上涨，因此线条朝着右上方移动。另一方面，②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延伸的两条线（1999年I~、2002年I~）是九十年代后半以后，即“结构改革”以后景气回升期的走势。在这个时代，随着景气回升，企业收益增加，但另一方面，工资却不增长——成了这样一个时代。

顺带补充一句，厚生劳动省《劳动经济白皮书（2012年版）》刊载了与图表 6-4 几乎相同的图表，其中追加了一条自（2009 年 II~）起的线。这条线展示的是雷曼冲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景气回升期企业收益与工资的动向，它也同样朝右侧水平或右下方移动，几乎与先前那两条线重合（顺便一提，这条线一直延伸到横轴 250 的刻度，而纵轴刻度仍低于景气谷底时点的水平，只有九十多；也就是说，它显示的是企业收益膨胀到了 2.5 倍，工资却完全没有增加）。

之所以认为，经历了“结构改革”，日本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变成了即使景气好转、企业赚钱，工资也不上涨的结构”——理由就在这里。

背景：企业间竞争激化与放松劳动管制

下面把这类结构变化与“结构改革”政策之间的关系归纳如下。

大的变化首先是：①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在“结构改革”之下，各领域实施了放松管制，企业间竞争由此激化。要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比以往更加压低成本、提高收益。企业不得不比以往更加着力压低人工成本这个最大的成本项。②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感与不安情绪日益加剧。1997 年至 1998 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景气的大幅下挫，对许多企业来说恐怕都始料未及；同一时期亚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如此，雷曼冲击的发生也是如此。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却又必须预做准备；收益再多也不嫌多，留存收益也越多越好。作为企业经营，为了防备那样的时刻，必须努力削减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③恰逢此时，另一方面，劳动领域的放松管制——尤其是“派遣劳动”的放松管制——出台了。无论是为了压低人工成本，还是为了应对将来“万一”的事态，这都是求之不得的放松管制。④能够使用并且实际使用了派

遣劳动，也让企业在“正式员工”的待遇上占据有利地位：既可以抑制加薪，也更容易增加兼职、零工、特聘等“派遣”以外的“非正式员工”；⑤一方面，把员工中的大部分变成“非正式员工”，无助于人才培养，还会给企业经营的前景埋下隐忧——问题就在这里。然而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属于股东”这一“结构改革”思想的扩散，企业经营正在转向重视股价的经营，转向看重短期业绩的经营，越来越无法顾及长期视角。傅高义（Ezra Vogel）曾主张“美国应当学习日本经营”“日本第一”（1979年），但时代已变为“理想在美国”（日本战略会议咨询报告，1999年），日本的企业经营正在进入美国化的时代。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开始

这也可以说是如上所见的那种结构变化的结果。“结构改革”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第二项后果，可以举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关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认为始于九十年代以后、泡沫破裂之后的看法居多。将泡沫破裂后的十年、二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就是一例。后文将会看到，第二次安倍内阁也是如此表述的：“以九十年代的泡沫崩坏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在迄今约二十年间，总体上甘于低增长”（《基本方针》2013年6月）。

作为大致的说法，那样讲也未尝不可；不过，看得更精细一些，正如已在第三章所看到的，泡沫破裂后漫长的反动萧条时期（1991～1993年）过去之后，日本经济已开始走向复苏（1993年11月～1997年5月）。这一复苏势头虽因桥本内阁的“六项改革”而中断，但若没有那一干预，1997年以后仍会延续下去。

长期停滞的起点，应当看作是桥本内阁的“财政结构改革”导致景气下行的1997年6月，按年份说则是1998年（名义GDP：1997年534万亿日元，1998年527万亿日元；GDP实际增长率：1997年1.1%，1998年-1.2%。见图表1-4）。

而且，这样一看，对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答案也同时明了：是工资的下跌（图表1-11），以及由此导致的民间消费支出的下跌。而其背后，正是“结构改革”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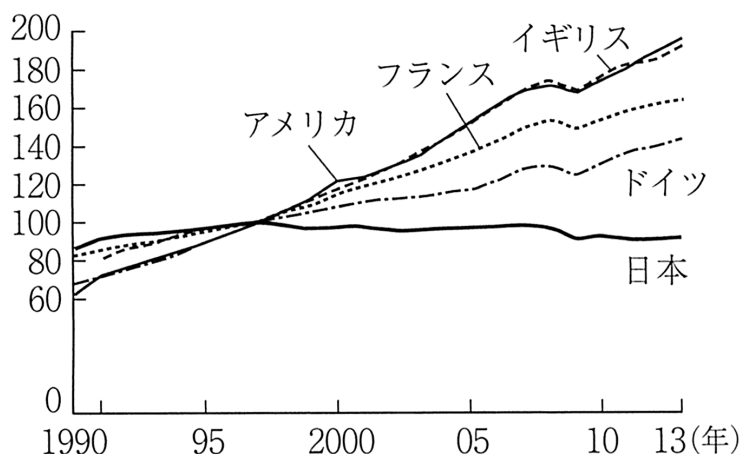
顺便一提，1998年以后，经济处于停滞基调的，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工资处于下跌（下降）基调的，也只有日本（图表6-5①②）。对于“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一疑问，答案也随之浮现：原因在于唯独日本实行了“结构改革”政策。

此外在这里，虽然稍稍偏离正题，我想谈谈读者或许会在意的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如下看法：日本的工资下跌，是否主要受全球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具体而言，日本经济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陷入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看法认为，在与工资比日本低的国家竞争之下，日本的工资不得不下降。

确实，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它并非主因。这就是这里的答案。第一，全球化的推进始于九十年代初（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也始于1992年前后）。全球化说无法回答“为什么日本的工资偏偏从1998年开始下跌？”这一疑问。第二，受到全球化强烈影响的，还有美国和西欧各国。美国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缔结（1994年生效）而与墨西哥、西欧各国因苏联阵营的崩溃（九十年代初）而与原东欧各国，都处于激烈竞争关系之中。然而，这些国家的工资并没有下跌。它同样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一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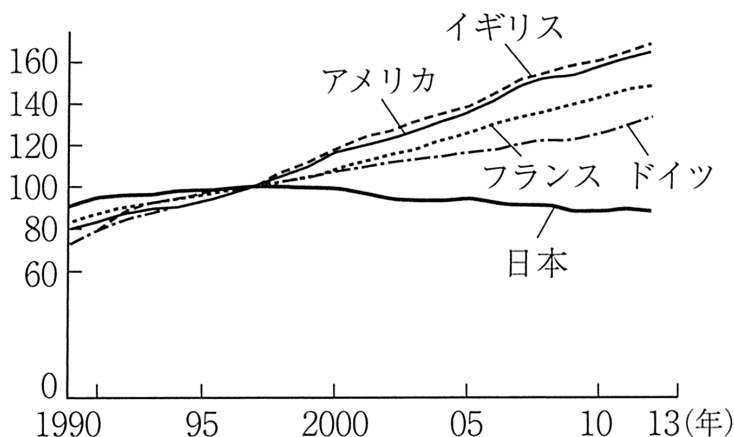
图表 6-5 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走势／②人均平均工资走势



(注) 1997 年 = 100 とする指数

(出所) 山家悠紀夫『アベノミクスと暮らしのゆくえ』

図表 6-5① 名目国内総生産(GDP)の推移
—— 日本だけ、1998 年以降経済が縮小



—— 只有日本，1998 年以后经济在缩小

(注) 以 1997 年 = 100 的指数

(出所) 山家悠紀夫《安倍经济学与生活的去向》

—— 只有日本，1998 年以后工资在下降

(注) 以 1997 年 = 100 的指数

只发生在日本的事情，必有只限于日本的原因。“结构改革”政策看来正与这个原因相符。

第二点是，且不说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欧各国，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也都采取了类似“结构改革”的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这些国家并未出现工资下跌。这又是为什么只有日本？这是第二个疑问。

其答案虽多半是推测，但我认为，工会形态的影响恐怕很大。欧美各国的工会，主流是“产业别工会”。说得粗略些，在这些国家，按产业分别由经营方（资本方）与工会方谈判决定劳动条件。企业基本上只能依照该决定来确定劳动条件，并必须使企业经营在这一劳动条件下得以成立。而日本的工会基本上是“企业别工会”，由企业与企业协商决定劳动条件。在这种谈判中，企业经营能否成立成为一个重大关键。一旦经营方主张“按这样的劳动条件，经营无法维持，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落败”，工会就屡屡被逼入困境，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断”。在日本，工会一方不得不为企业能否立足而煞费苦心，这正是日本工资下降的一个原因。尽管遗憾，却不得不这样想。

企业收益显著增加，工资下跌

这是“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第三样东西。

这一点前文各处已经谈到，即：企业收益的显著增加，以及作为其另一面的工资的下跌。试将1997年（也应视为“结构改革”起始之年）与2006年（小泉内阁的最后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和雷曼冲击发生之前的一年）作一比较（见图表6-6）。

图表 6-6 “结构改革”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1997 年 (A) (“改革” 前)	2006 年 (B) (“改革” 后)	B/A
法人企业经常利润	27.8 万亿日元	54.4 万亿日元	1.96 倍
工作满一年者的人均年 薪	467 万日元	435 万日元	0.93 倍

(注) 1. 见图表 1-7、图表 1-11

2. 企业利润为年度数据，年薪为日历年数据

其结果是：这十年间，法人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膨胀到约两倍，而劳动者的年薪（人均）减少了约 30 万日元，降幅 7%。

“从储蓄到投资”——家庭的钱并没有动起来

有一个“结构”，是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这两个强力推进“结构改革”政策的内阁合力也未能改变的。

那就是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

“结构改革”政策把如下课题视为一大要务：改变以存款（“储蓄”）为中心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使之变为以证券（“投资”）为中心的构成。

在“从储蓄到投资”这一口号之下，政府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桥本内阁提出“把日本的金融市场建成与纽约、伦敦并列的国际市场”这一目标，其“金融大爆炸”政策的一个意图即在于此。

小泉内阁的姿态也相同，在《基本方针（2001）》中写道：“基于个人投资者参与市场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一观点，为扩大其参与，将金融的应有方式从优待储蓄切换为优待投资，并以此为前提，研究包括税制在内的相关制度的应对。”

这类政策背后的想法是：家庭金融资产大多流向存款，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就不会流向虽伴有风险的“成长领域”，而会流向低风险

的“停滞领域”，因此日本经济无法增长。应当效仿美国——那里的家庭金融资产大多流向股票等风险资产——这样日本经济就能增长。

于是，在“从储蓄到投资”的名义下，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任内推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例如：允许在银行柜台购买投资信托（1998年）、放开股票委托手续费（1999年）、解禁不动产投资信托（1999年）、解禁上市投资信托（2001年）、对个人投资者的分红和转让收益减税（2003年）、解禁在邮局销售投信产品（2005年）等。

拓宽通往“投资”的窗口，使商品多样化，实行减税……这些都是引导家庭金融资产走向“投资”的政策。另一方面，为把资产从“储蓄”中驱赶出去的政策也在不断推行。虽以促成景气回升为主要目的，但政府长年累月地坚持无视储户的超低利率政策（1999～2006年。其后，在第二次安倍内阁任内也是如此），即属此类；而为保护储户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本金1000万日元以内的存款本金及其利息的制度），在限额偿付（payoff）解禁之时（2002年。即在金融危机时期曾宣布全额保护存款，此时恢复为制度原貌），政府还提醒人们“存款最多只保1000万日元哦”，把它用作吓唬人的材料，这些恐怕也都是“驱赶政策”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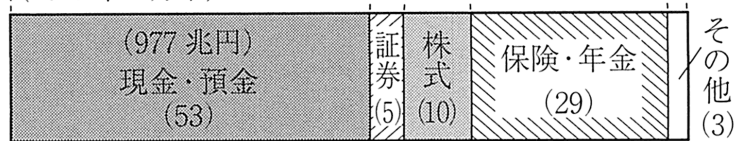
然而，该这么说了吧：家庭并没有动。将2000年3月（小泉内阁上台之前）与最近（2019年3月）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作一比较（图表6-7），在这近二十年间，家庭金融资产余额从1390万亿日元增至1835万亿日元，增至原来的1.3倍。其中现金·存款的比率仍在50%一档，“储蓄”的比率几乎可以说毫无变化。保险·年金的比率也接近30%，基本没有变动。股票·证券等“投资”的比率也只是从

图表 6-7 家庭的金融选择是“储蓄”而非“投资”

(2000 年 3 月末)



(2019 年 3 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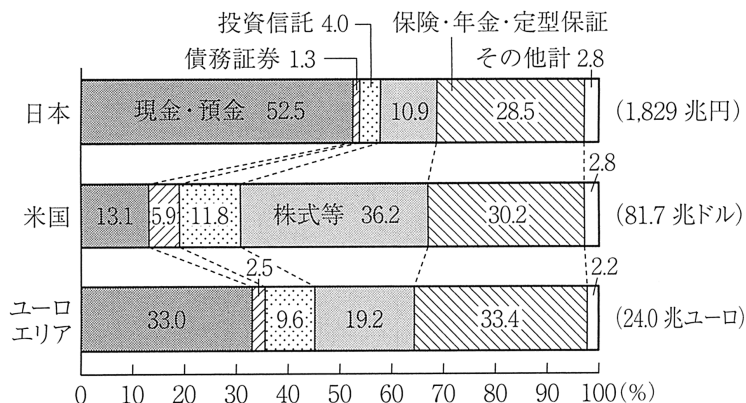


(注) () 内为 %

(资料) 日本银行《资金循环账户》

14% 变为 15%，同样没有变化。与美国、欧元区的差距也依然如故 (图表 6-8)。

图表 6-8 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日美欧比较 (2018 年 3 月末)



(出所) 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的日美欧比较 (2018 年)》

“从储蓄到投资”的政策，就这样完全落了空。

这也难怪。目前约有 1000 万亿日元的家庭储蓄，是留着以备老了以后只能靠养老金度日之时，或生病、需要护理之时，又或孩子升学之用的仅有积蓄。是为了到了紧要关头，即便在这个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和教育预算如此贫弱的情况下，也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备下的钱。到了紧要关头收不回本金可就糟了。因此，无论利率多低，也无论有没有税制上的优惠措施，这笔钱都无法离开“储蓄”。

要通过“从储蓄到投资”来改变家庭的资产选择，就需要例如改革年金制度，让人们能够安心度过晚年，或者对免费医疗之类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善。然而，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实际所做的，却是以财源困难为由，把社会保障制度改坏，一味地放大人们对未来的不安。

“从储蓄到投资”这一“结构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始终未能实现，说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七章 民主党政权的诞生与自毁 (2009~2012 年)

在 2009 年 8 月的大选中, 自民党大败, 高举“国民的生活第一”“终于要政权更迭”口号的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 (民主 308、自民 119、公明 21、共产 9、社民 7)。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国民新党就结成联合政权达成一致, 并公布了协议文件 (图表 7-1)。于是, 2009 年 9 月 16 日, 鸠山由纪夫内阁成立。

1 鸠山内阁: 从超过 70% 的支持率出发, 到“至少也要迁到县外”未能实现而下台

鸠山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达 70% 多 (各大报社的舆论调查), 极为可观。而且, 他的施政理念演说 (2009 年 10 月) 格调高雅, 十分出色。

图表 7-1 组建联合政权时的政策协议 (摘录)

2009 年 9 月 9 日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国民新党

国民在此次大选中, 作出了要求新政权的历史性裁决。这一选择所要求的, 是将长期以来安坐于既得权益结构之上、纵容官僚支配的自民党政治从根本上转变, 并从根源上改革政策。(中略) 由于以小泉内阁主导的竞争至上主义经济政策为代表的自公政权接连失政, 国民生活与地区经济疲敝, 就业不安加剧, 社会保障与教育的安全网破绽毕露。国民的托付在于: 一扫税金的浪费, 通过支持国民生活, 实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安定与增长的政策。

(续表)

联合政权把支持家计定位为最重点，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带动消费扩大。同时强化中小企业、农业等支撑地区的经济基础，把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重组为值得信赖的、可持续的制度。（中略）	
记	
1.	迅速采取流感对策、灾害对策、紧急就业对策
2.	维持消费税率不变○现行消费税 5% 维持不变，在本次选举受托执政的期间内……不上调税率。
3.	彻底重新审视邮政事业
4.	支援育儿与工作、家庭两不误○减轻生育的经济负担，创设“儿童补贴（暂名）”。○……恢复 2009 年度被废除的生活保护母子加算。○使高中教育实际免费。
5.	充实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废除“将社会保障费的自然增加每年压缩 2200 亿日元”的《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基本方针）。○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废除《残疾人自立支援法》……建立以使用者按能力负担为原则的综合性制度。
6.	强化就业对策——彻底修订《劳动者派遣法》
7.	搞活地区○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防止惜贷·抽贷（貸し渋り・貸しはがし）法（暂名）”，使贷款债务还款期限的延长、贷款条件的变更成为可能。个人住房贷款也同样可以延长还款期限、变更贷款条件。
8.	推进全球变暖对策
9.	以自立的外交贡献世界○……从减轻冲绳县民负担的角度出发，提议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对美军整编及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方式也按重新审视的方向处理。○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确立亚太地区的信任关系与合作体制，致力于构建东亚共同体（暂名）。
10.	宪法○作为唯一的核爆受害国，确认遵守《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以及“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三原则，同时把实现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置于首位，全力重建国民生活。
以上	

讲述“理念”与“决心”的施政理念演说

下面来梳理鸠山首相在施政理念演说中讲述的政治“理念”及其“决心”。

“政治上必须尊重处境弱势的人们、少数人的视角”“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主权’国家，所需要的，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珍视人的生命、守护国民生活的政治”“我们将转变以往只从财政视角一味压缩医疗费与护理费的方针，着手建设能够高效而稳定地供给高质量医疗、护理服务的体制”“育儿与教育已不再是个人问题，需要有一种思路，把它们作为对未来的投资，由全社会互帮互助、共同负担”

“把一切交给市场、只有强者才配生存的想法，以及哪怕牺牲国民的生活也要追求经济合理性的想法，显然都已经不再成立。我想提倡向‘以人为本的经济’转变。也就是说，不要再用偏向经济合理性和经济增长率的评价尺度来看待经济”

“我们将努力实现向让国民安心生活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的转变”“我们将按照‘从混凝土到人’的基本方针，转变依赖公共工程的产业结构”

“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我将断然推行‘地域主权’改革——地方的事务由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来决定，建设充满活力的地方社会”“努力充实和强化地方的自主财源”

“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环境、和平、文化、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是兼具经验与实力的国家。……不是别的，正是日本，必须挺身而出，致力于克服全球变暖、核扩散问题、以非洲为首的贫困问题等全球性课题，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多样文明之间的‘桥梁’”“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没有比核武器的存在与核扩散更严重的问题”“作为唯一的核爆受害国主张废除核武器、并始终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日本，最能富有说服力地向世界呼吁实现‘无核世界’。我将作为世界的‘桥梁’，为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作出重要

贡献，并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推进各项举措，向着给未来的孩子们留下‘无核世界’迈出重要的一步”

“日本也是地处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自古以来，在与各国的交流与贸易中，孕育了丰富的日本文化。绝不能让环绕日本的大海再次成为‘纷争之海’。重要的是继续努力，使它永远是友好与团结的‘丰饶之海’。……其基础，是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我将深化多层次的日美同盟：不仅是日美双边关系，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乃至克服全球变暖、‘无核世界’等全球性课题方面，日本与美国也将相互协作、彼此合作”“关于驻日美军整编，我将在兼顾安全保障层面、慎重核查过去日美协议等原委的基础上，充分体念冲绳人民一直以来背负的负担、痛苦与悲伤，认真倾听当地民众的心声，全力以赴地加以处理”

“连日来，我与亚洲各国领导人坦率而真诚地反复交换了意见。关于与韩国、中国乃至东南亚等邻近各国的关系，我们将在相互尊重多样价值观的同时，积极寻找共同点与可合作之处，从而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推进合作”“作为‘以人为本的经济’的一环，我希望充实‘生命与文化’领域的合作，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使其成为面向其他地区开放的、透明度高的合作体”

“从混凝土到人”——2010 年度预算

鸠山首相的施政理念演说，从政治、经济的应有状态，到全球变暖问题、世界和平、核问题，广泛阐述了理念，甚至谈及内阁的应对方针；与此同时，也提到了执政三党达成一致、鸠山内阁准备实施的具体政策，即“创设儿童补贴”“高中教育免费化”“创设农户分户收入补偿制度”等。

这些政策被编入了鸠山内阁的第一个预算（2010 年度预算）。这就是鸠山首相命名为“守护生命的预算”（2010 年 1 月的施政方针演说）的那份预算。

下面来看其概要（图表 7-2）。

图表 7-2 民主党政权下年初预算的走势

政权	内阁	年度	岁入·岁出总额	类别	项目	金额（单位：万亿日元）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岁入	租税	46.1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岁入	其他	9.1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岁入	公债	33.2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主要岁出	社会保障相关费	24.8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主要岁出	文教·科学振兴费	5.3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主要岁出	公共工程相关费	7.0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主要岁出	防卫相关费	4.7
自公政权	福田内阁	2009	88.5	主要岁出	地方交付税交付金	16.5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岁入	租税	37.3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岁入	其他	10.6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岁入	公债	44.3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主要岁出	社会保障相关费	27.2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主要岁出	文教·科学振兴费	5.5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主要岁出	公共工程相关费	5.7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主要岁出	防卫相关费	4.7
民主党政权	鸠山内阁	2010	92.2	主要岁出	地方交付税交付金	17.4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岁入	租税	40.9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岁入	其他	7.1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岁入	公债	44.2

(续表)

政权	内阁	年度	岁入·岁出总额	类别	项目	金额（单位：万亿日元）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主要岁出	社会保障相关费	28.7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主要岁出	文教·科学振兴费	5.5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主要岁出	公共工程相关费	4.9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主要岁出	防卫相关费	4.7
民主党政权	菅内阁	2011	92.4	主要岁出	地方交付税交付金	16.7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岁入	租税	42.3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岁入	其他	3.7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岁入	公债	44.2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主要岁出	社会保障相关费	26.3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主要岁出	文教·科学振兴费	5.4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主要岁出	公共工程相关费	4.5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主要岁出	防卫相关费	4.7
民主党政权	野田内阁	2012	90.3	主要岁出	地方交付税交付金	16.5

(注) 100 亿日元以下舍去

(资料) 财务省官网

总体来看，其特点是大幅削减了公共工程相关费，转而增加社会保障相关费、文教·科学振兴费和地方交付税交付金。这是“从混凝土到人”政策的实践。从具体措施来看，小泉内阁时期被废除的生活保护费中的母子加给^①，在 2010 年度预算编制之前，就已自 2009

① 母子加给，日本生活保护制度中面向单亲母子家庭的加发部分，2009 年度被废除。——译注

年 12 月起恢复（2009 年度内所需金额由 2009 年度预算的预备费支出）。

而纳入 2010 年度预算的新制度，有①“儿童补贴”、②“高中学费免费化”、③“农户分户收入补偿制度”。下面把各项连同其后来的情况（民主党政权垮台后）一并来看。

①“儿童补贴”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以 0 岁至 15 岁（至 15 岁生日后的第一个年度末为止）的儿童为对象，每月发放 13000 日元。基于儿童应由社会来抚养的理念，定为“不设收入限制”，这是一大要点。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财源，废除了所得税的抚养扣除。此外，到了 2011 年 8 月，民主、自民、公明三党达成一致，到 2012 年 3 月，废除了“儿童补贴”，由儿童津贴制度（每人每月：未满 3 岁 15000 日元，3～15 岁 10000 日元，设有收入限制）接续。

②关于“高中学费免费化”，自 2010 年 4 月起，实际免除了公立高中的学费，并对私立高中生给予学费补助（但朝鲜学校（高中）除外）。

③农户分户收入补偿制度，是对种植大米、麦类、大豆等主要农产品的销售农户，当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时，将成本与销售价格的差额作为补助金予以补偿的制度，自 2010 年度起实施。这是一种与自民党推进农业经营大规模化的立场截然相反的农政，作为可称为世界潮流（而不是日本的潮流）的“珍视家庭农业的农政”而受到关注；但在后来的自民党（安倍）政权下，大米补助金被全额削减（2018 年），正走向消亡。

金融监管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金融顺畅化”法的制定

离开预算来看鸠山内阁的政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09 年 11 月，在龟井静香金融担当大臣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小企业金融顺

畅化法》（《关于为促进面向中小企业者等的金融顺畅化的临时措施的法律》），使金融监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金融顺畅化法”是一部这样的法律：当中小企业或住房贷款的借款人请求暂缓或减轻还款时，金融机构应努力配合变更融资条件。该法律的条文只不过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努力义务”，但效果极大。

自小泉内阁（竹中金融担当大臣）时代以来，在“不良债权处置”政策的名义下，金融机构对提出变更融资条件（延长期限、降低利率等）的企业所拥有的债权被视为“不良债权”，金融厅逼着金融机构“处置”乃至“促进处置”，相关企业则被金融机构催逼提前偿还贷款。然而自该法成立以后，金融监管为之一变：金融厅要求金融机构尽最大努力顺应债务人的意向；金融机构则站在债务人的立场上与债务人商议，讨论怎样才能（以及怎样变更融资条件才能）让企业经营维持下去、让债务得以偿还。

这是一部值得庆幸的、可以说是“有人情味”的法律：对债务人自不必说，对金融机构如此，恐怕对作为监管部门的金融厅来说也是如此。

该法律原本是以 2011 年 3 月底为期限的限时立法，后经两度延长，于 2013 年 3 月底期满失效。那时政权已经移交自民党·公明党联合的安倍（第二次）内阁，但金融厅的姿态与“金融顺畅化法”存在的时代相比并无改变，让金融机构重视对企业支援的方向一直延续至今。安倍内阁恐怕也是认为：与其无谓地掀起风波、增加企业倒闭、使景气恶化，不如让对企业的支援继续下去为好。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的挫折，内阁下台

鸠山内阁自上台以来，从预算编制到相关法律的通过，虽说途中也在财源问题上吃过苦头（未能筹措到预期的财源，2010 年度预算被迫大量发行国债。参照图表 7-2），但总体上走得比较顺利；然而，让它大栽跟头的，是冲绳的美军基地搬迁问题。

关于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关闭与搬迁问题，鸠山首相主张搬迁目的地“至少也要迁到县外”，就任首相之后也曾朝着这个方向行动。但到了 2010 年 5 月，他改变了主意，28 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以迁往边野古近海为核心的政府方案（福岛瑞穗消费者担当大臣反对这一决定、在内阁会议上拒绝签字，因而被罢免；5 月 30 日，社民党决定退出联合政权）。鸠山首相于 6 月 2 日正式表明辞去首相与民主党代表职务。鸠山内阁于 2010 年 6 月 4 日总辞职。

被外务省官僚出示“伪造文件”而受骗？鸠山首相

此外，据下台后的鸠山前首相所述，鸠山本人曾本着“至少也要迁到县外”的方针，研究过迁往鹿儿岛县德之岛的方案。而之所以放弃这一方案、转而认为“边野古在所难免”，据说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绝密文件”的影响——那是 2010 年 4 月 19 日前来拜访鸠山的防卫省和外务省干部给他看的。

那份盖着“绝密”戳记的文件（题为“关于普天间搬迁问题的美方说明”），用整整三页写着据说是外务省经办人从驻日美国大使馆那里得到的“难以将普天间机场迁往德之岛的理由”。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冲绳到德之岛的距离很远，大大超过了美军手册中作为‘与常年进行训练的据点之间距离的基准’而明确记载的‘65 海里（约 120 公里）’”。

据说，鸠山看了那份文件之后，忍痛作出决断，撤回了德之岛方案（若要求在距冲绳的训练场 65 海里以内，就几乎只能限于冲绳县内了。冲绳与德之岛的距离约为 107 海里）。

这件事还有下文。据说，“65 海里”这一规定并没有写在“美军手册”里；而且，所谓的“绝密”文件在外务省也没有留存。也就是说，鸠山前首相是被外务省、防卫省的（高级）官僚出示了“伪造文件”，受骗上当了（2016 年 2 月 4 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鸠山前首相演讲会“鸠山前首相揭示‘边野古新基地’的真相”上，鸠山的发言）。

2 菅内阁制定背信弃义的“新增长战略”，因上调消费税发言而自爆

接替鸠山内阁，菅直人内阁上台。社会民主党退出后，是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联合内阁（2010 年 6 月 8 日成立）。菅内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新增长战略”的内阁会议决定（2010 年 6 月 18 日）。“新增长战略”的“纲要”早在鸠山内阁时期的 2009 年 12 月 30 日就已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是在鸠山内阁时期制定的“战略”；不过，当时的菅首相是副首相兼国家战略·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理应深度参与了这个“战略”的制定。所以，这个“战略”与其说是鸠山内阁的，倒不如看作菅内阁的“战略”更为妥当。

“新增长战略”，走向“增长第一”路线

这项“战略”，是要通过执行环境与能源大国战略、健康大国战略、亚洲经济战略、观光与地区活化战略、科学·技术·信息通信立国战略、就业与人才战略这六项战略，实现 2020 年度经济规模达到 650 万亿日元左右、到该年度为止平均超过名义 3%、实际 2% 的增长。

存在两个大问题。

一是为什么偏偏是“增长战略”的问题。

回顾小泉内阁以来自民党内阁的时代，首先，小泉内阁时期设置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在会上决定了《基本方针》。与此同时（稍稍错开一点时间，意思是在同一年或同一年度），还制定了《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财政中期展望》（“改革与展望”），并每年修订。

安倍（第一次）内阁时也是如此，制定了满篇堆砌“美丽国家”字眼的“改革与展望”（《日本经济的航向与战略》）。虽然几乎无人关注，但福田内阁时、麻生内阁时，也都有类似的战略与展望文件。

然而到了民主党政权，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不再被利用，《基本方针》也没有提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疑问。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搞“新增长战略”？

第二个问题是“新增长战略”的内容。它与自民党内阁时代的“改革与展望”有何不同？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在只顾讲述国家的未来、而不讲述人们生活的未来这一点上，在把这个国家的未来想象为“大国”这一点上，在把管制改革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加以重视这一点上，等等，都毫无二致。从具体内容来看，也塞进了把法人税率下调至主要国家水平、通过官民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出口、创设“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制度等内容，简直让人误以为是自民党内阁的政策。另一方面，鸠山内阁时期曾有的大幅改善工资与劳动条件、重建医疗、福利与教育等“重视生活”的政策退居后景，重视增长、偏向财界的政策正在涌向前台。

尽管从 2009 年 9 月政权成立算起还不到一年，但可以说，随着鸠山内阁下台与菅内阁登场，民主党政权发生了重大质变（说得保守一点，是开始显露出质变的苗头）。

“财政运营战略”的制定＝走向“财政重建最优先”路线

政策上的重大变更（路线转换）还有一项。菅内阁也是在成立后不久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财政运营战略”（2010 年 6 月 22 日）。

这项“战略”的目标是：“基础财政收支方面，最迟在 2015 年度之前将赤字占 GDP 比重从 2010 年度的水平减半，最迟在 2020 年度之前转为盈余”“2021 年度以后，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中央与地方长期债务余额占 GDP 比重稳定地降下来”。其基本思路中，作为“对财政破产风险的断然应对”写道：“必须避免像希腊等国那样，我国在国债市场上的信誉丧失，……财政陷入破产状态……只要以政治的强有力领导力致力于改革，……就还来得及”。还提出了“将国债费除外的岁出控制在 2010 年度水平（71 万亿日元以下）”（“2011～2013 年度中期财政框架”）的目标。

这等于是一份财政重建最优先主义的宣言：（需要预算安排的）新政策，若不削减其他某项岁出就无法实施（即不予实施）。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令人想起 1996 年、1997 年时自民党桥本内阁的心态。

距离上调消费税的发言只差一步——随着菅内阁的登场，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姿态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上调消费税发言”与参议院选举败北

在 2010 年 7 月 11 日参议院选举前夕的竞选纲领发布记者会（6 月 17 日）上，菅首相表明：“希望在 2010 年度内汇总出包括税率与累退性对策在内的消费税改革方案。近期的税率将参考自民党写进竞选公约的 10%。”

无从知晓他在选举前夕作出这番发言的真实意图。或许是“不能让日本变成希腊那样”这一身为首相的强烈危机意识让他说出了这番话（尽管那是一种不理解希腊与日本状况差异、毫无根据的危机意识……。究竟是谁灌输给他的？）。作为民主党党首，他或许以为“既然说的与自民党主张相同，对选举不会有太大影响”，低估了发言的影响。然而，这番发言违反了“在经由上次选举受托执政的期间内”“现行消费税率 5% 维持不变”的三党协议，是一番背叛选民信任的发言。

菅首相的发言此后几经反复，但选民的信任未能挽回，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自民 51、民主 44、大家党 10、公明 9）。政府与执政党在参议院拥有的议席数未过半数，与此前的自民党末期政权一样，民主党被迫面对严峻的国会运作局面。

另外，在此先提一下此后的 2011 年度预算编制：由于“中期财政框架”要求将国债费除外的岁出控制在上年度水平（约 71 万亿日元），岁出被严格压缩，虽然确保了社会保障支出的自然增长，但扩充医疗、福利服务等措施，因福利业务从业人员的待遇改善预算被压缩等原因而未能实现（图表 7-2）。

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的发生

就这样，在民主党政权的政策运作日益艰难之际，2011 年 3 月 11 日，大地震与大海啸袭击了东北地区，同时发生了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菅政权被迫忙于应对。

以发生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为首，国内的核电站都是在历代自民党政权下建造的；地震、海啸的发生酿成大事故，这方面的管理责任自不必说，理应追究的，完全是过去的自民党政府与电力公司的责任。事故发生时碰巧身处政权之位，这对民主党（菅政权）来说

固然是倒霉、不幸的事，但民主党自己也不能说问心无愧。就在事故发生前不久，民主党政权在前面提到的“新增长战略”中，把“绿色创新带来的环境与能源大国战略”列为第一项战略，并提出“扎扎实实地致力于原子能利用”。在同时经内阁会议决定的“能源基本计划”中，对核电站提出“通过推进新设增设、提高设备利用率等，积极扩大利用”，并规定“到 2020 年，新设增设 9 座核电站”“到 2030 年，至少新设增设 14 座以上核电站”

的。

2011 年事故发生时，菅首相在事故发生后的行动与发言等被指为问题，一般认为这正是导致首相下台（9 月 2 日）的主要原因；但客观、冷静地回顾起来，很难认为菅首相的言行有多大的过错。他甚至曾拜托中部电力公司，让因海啸引发事故的危险性极高的静冈县滨冈核电站停止了运转（2011 年 5 月 9 日）。

回顾起来，当时的应对中令人懊悔的是，菅内阁（或者说继任的野田内阁）未能让政府政策转舵驶向“弃核电”。

观察 2011 年 3 月事故之后依然运转的全国各地核电站，可以看到，它们相继进入因定期检查而停运的状态，从 2013 年 9 月起，没有一座核电站在运转的状态持续了一年以上。而且，幸运的是，当时的日本（现在依然如此）电力处于大幅供过于求的状态。也就是说，全部电力经营者的最大出力为 2 亿 2815 万千瓦，即使除去核电也有 1 亿 7930 万千瓦（《电力调查统计》2011 年 1 月）。与此相对，当时的电力需求峰值（即使上溯三年左右来看）为 1 亿 7900 万千瓦（2007 年 8 月，《能源白皮书 2010》）。也就是说，即使让全部核电站停止运转，只要让已有的火电、水电站等满负荷运转，峰值时的需求（虽然勉强）也能应付。结果，即使核电站运转率降为零，电力短缺也没有发生。再考虑到全球变暖问题，利用太阳能、风力、地

热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也在逐渐增加。从国外还传来消息：德国政府就到 2022 年为止“弃核电”，在政权内部达成了共识（2011 年 5 月 30 日）。

考虑到这样的客观形势与当时日本社会的舆论，我认为，假如民主党政权（菅内阁）提出“弃核电”的方针诉诸舆论，这项政策本来是能够实现的。

3 野田内阁，为自公政权铺路？——“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

由于参议院选举败北、核电站事故应对、以及随后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败北（2011 年 4 月）等，民主党内要求菅首相下台的呼声不断高涨。加之国会中还提出了内阁不信任决议案（虽遭否决），菅首相在 2011 年 6 月 2 日的民主党众议员大会上表明了辞职意向，菅内阁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总辞职。作为继任者登场的是野田佳彦内阁。

“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

因从鸠山内阁更迭为菅内阁而发生重大质变的民主党内阁（与国民新党的联合内阁），又因更迭为野田内阁而发生了决定性的质变。

野田内阁为了实现“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与自民党、公明党达成政策共识，使上调消费税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等得以通过，结果为此后登台的自民党·公明党政权实现上调消费税与修改社会保障制度（实际是改坏）开辟了道路。

这方面的伏笔，在野田首相就任时的施政理念演说（2011 年 9 月 13 日）中就已埋下。在那篇演说中，野田首相说道：“〔以 6 月政

府与执政党汇总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草案》为基础〕我们将认真积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协商，力争向下一届通常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为使执政党与在野党敞开胸襟对话、朝着形成法案达成共识，恳请各党、各会派参加有关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的政策协商。”

其背景恐怕（与前任菅首相一样）是对日本财政的强烈危机意识。在同一篇施政理念演说中，野田首相说道：“从大地震之前起，日本的财政就处于国家岁入的一半依赖国债、国家总债务余额逼近一千万亿日元的危机状况。大地震的发生，使财政的这种危机水平进一步提高，已处于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差的水平。在“国家的信用”正受到严厉追问的当下，像“滚雪球”那样债务换来债务的财政运营，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可以把更多的欠债推给无声的未来世代吗？活在当下的政治家的责任正被追问”，他这样说道。

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与身为政治家的“责任感”，或许使通往“上调消费税”与“削减（最大的支出项目）社会保障费”的道路，化作了对在野党达成协议的呼吁——也就是说，这一呼吁很可能导致政权放弃公约（“三党协议”）。

就这样，野田内阁依据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三党之间汇总达成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税收的三党协议》（2012 年 6 月 21 日），制定了“上调消费税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案”等六项法案，并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使其成立。

“上调消费税法”规定，消费税税率于 2014 年 4 月提至 8%、2015 年 10 月提至 10%。

此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作出了如下规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留意使自助、共助及公助得到最恰当组合的同时……通过家庭相互及国民相互扶助的机制来支持其实现”“站在

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费者的立场上，在抑制负担增大的同时，使制度成为可持续的制度”等等。这是一部无视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享有健康且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以及努力向上和增进社会保障等是政府的职责）、违宪嫌疑极强的法律。虽是一部仅十五条的法律，却也包含应当重新审视生活保护制度（即应当改坏）之类的条款。

野田内阁的使命在使这两部法律成立之时就告结束，（这属后话）安倍内阁活用这部法律上调了消费税率，年复一年地改坏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这么回事。

表明参加 T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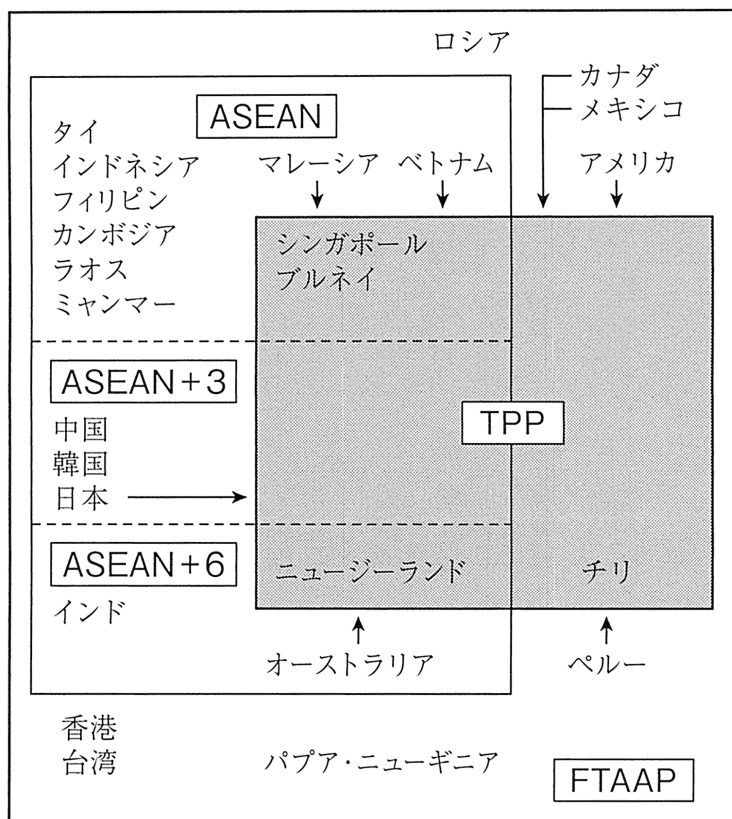
野田内阁为随后而来的安倍内阁充当开路角色的例子，（作为重要的政策决定）还有一个。那就是表明参加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原本是环太平洋小国间的协定（称 P4，2006 年成立）。美国希望加入（2008 年），与美国缔结了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加入，此外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越南，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美的秘鲁加入，共十一国开始了协商（图表 7-3）。

TPP 的本质是“尽可能消除加盟国之间的国境”的协定，正朝如下方向推进协调：①不设例外品目的零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②实现加盟国之间贸易、投资、经济活动等相关制度与管制的同一化。

美国（奥巴马总统）希望加入的理由想来有二：一是活跃与环太平洋各国的交流、通过增加美国出口来改善美国的景气，二是使美国的经济规则成为世界的规则。美国有一个构想，要把 TPP 进一步扩大、建成 FTAAP（亚太自由贸易圈）。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已有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有将其扩大为 ASEAN+3、ASEAN

图表 7-3 TPP 相关概念图



+6の构想。看来是希望赶在亚洲主导的此类经济圈启动之前，结成美国规则的 TPP。

对美国而言，能把日本诱入 TPP，获益将是巨大的。想必自然有过对日本政府的拉拢，而率先响应的就是菅内阁。在其施政理念演说（2010 年 10 月 1 日）中表明了参加的意向。就菅首相而言，鸠山内阁时期美军普天间机场“至少也要迁到县外”的搬迁问题、以及“东亚共同体构想”（其中并无美国）等，恐怕多有得罪美国之处，或许

是怀有想要多少加以化解的心情。然而或许也因政权短命而终，菅内阁终究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就下了台。继任的野田内阁，也未能参加 TPP 协商。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也为继任的安倍内阁铺平了参加之路。

就这样，为对立党的下届内阁搭建立足点而（虽说是结果使然）多方辛劳的野田内阁，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解散国会，投身大选。在选举中大败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民主党政权的时代落幕了。

4 回顾民主党政权下的三年三个月

在此回顾一下自 2009 年 9 月鸠山内阁登场、至 2012 年 12 月野田内阁下台的民主党政权时代。首先看景气的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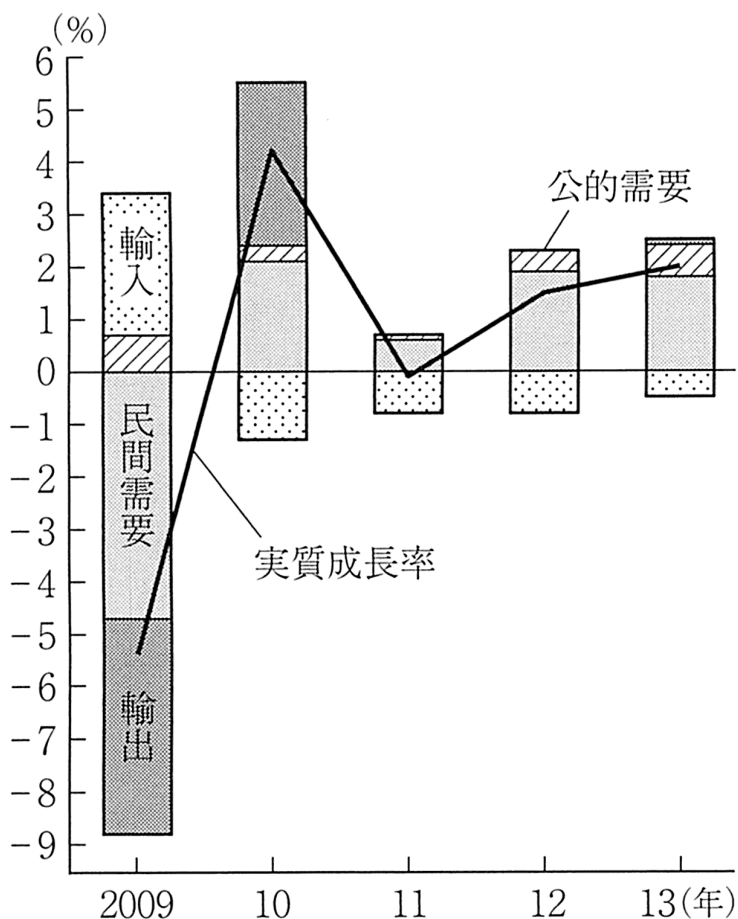
景气一度回升，但受大地震与日元升值影响而低迷

民主党政权成立于开始从雷曼冲击的大幅下跌走向回升（2009 年 4 月起。图表 1-1、1-3）的时期。即便如此，2009 年 GDP 实际增长率为-5.4%，是战后日本经济跌幅最大的一年（图表 7-4）。

而到 2010 年，GDP 实际增长率恢复为 4.2% 的正增长。带来回升的是海外景气回升带来的出口增加，与以消费为中心的国内民间需求的恢复。然而 2011 年，实际增长率以-0.1% 再度跌入负增长。3 月 11 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同时发生核电站事故，国内民间需求的增长大幅跌落（图表 7-4）。虽是极短期的下跌（图表 1-1），未被认定为景气下行期，仍是一件不幸之事。同年，日元升值大幅推进，即使按实际 GDP 口径也使出口小幅减少（对 GDP 的贡献度 0.0%。图表 7-4），并使进口增加（对 GDP 增长为负贡献）。

此外，日元升值始于 2008 年，逐渐加速，持续至 2012 年（图表 7-5）。2008 年至 2009 年前后的日元升值，似乎是受如下因素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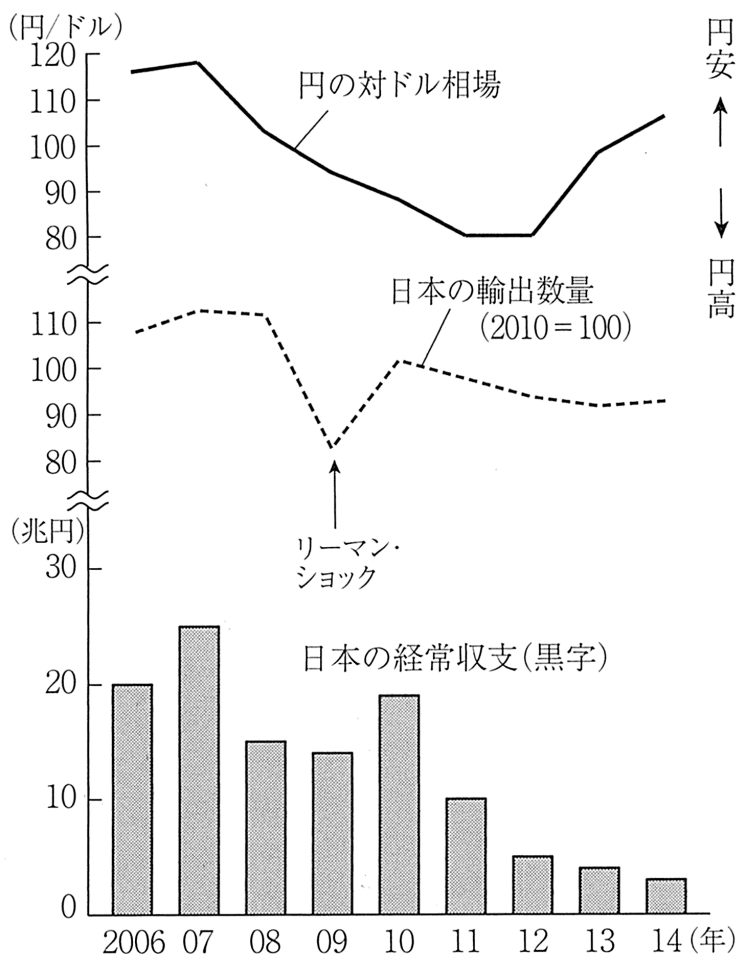
图表 7-4 GDP 实际增长率与贡献度的走势⑤



(資料) 内閣府《国民经济核算》

雷曼冲击下日本金融界、投资者、企业等所受损失相对较小；2007年之前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极大（图表 7-5）。但 2010 年以后日元升值的推进，其理由就不太清楚。虽有如下几种说法：①雷曼冲击之下，欧美各国作为景气对策下调利率、并实施量化宽松，而日本早已实行超低利率政策，量上的宽松余地也很小，结果日美欧之间的

图表 7-5 日元升值的推进与出口的下滑



(注) 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平均

(资料) 内閣府《年度经济报告 (2019 年版)》

利差缩小等（日元升值、外币贬值因素）；②因大地震，保险公司需要日元资金→预期日元将升值，市场上日元被买入。但真相不明。

无论如何，由于 2009 年至 2012 年间日元大幅升值，出口数量减少（2011 年、2012 年。图表 7-5），对 GDP 实际增长的贡献度为零的年份持续出现（图表 7-4、1-1、1-3）。

这对民主党政权而言实属不幸。

由此，景气自 2012 年 3 月至 11 月进入极短期的下行局面（图表 1-1、1-3）。加之 2011 年至 2012 年间，希腊货币危机严重深化，欧洲经济一度陷入混乱状态，日本出口也受到了影响。

无论如何，景气自 2012 年 12 月开始走向回升，而那时，民主党政权的时代即将落幕。

以不充分告终的派遣制度修订

在此，就联合政权“三党协议”所提政策之中、本文未能论及的政策，简要整理民主党政权成立后的经过（注：○表示基本实现，▲表示部分实现但不充分，●表示未实现）。

▲“邮政事业的根本性修订”——小泉内阁时期确定的邮政民营化，存在山区与离岛等地的人们将无法获得“邮储”“简保”等金融服务的担忧，为此向国会提交了纳入重新修订金融三公司完全民营化等内容的“邮政改革相关法案”（2010 年 4 月）。然而其后，因在野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审议纷争不断。最终通过了将诸多事项交由“邮政民营化委员”的《邮政民营化法等修改法》（2012 年 4 月）。

●“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对于作为废除前提的老人保健制度的恢复，全国地方政府的医疗相关人士反对者众多、进展艰难，最终以搁置废除告终。

○“废除《残疾人自立支援法》，建立以使用者按能力负担为基本原则的综合制度”——2010 年法律修改将“设定了上限的按受益负担”改为“量能负担”，2012 年 4 月起实施。2012 年 4 月公布《关

于为在地域社会实现共生而实施新的残疾人保健福祉政策之相关法律整備法》。依据这部法律，《残疾人自立支援法》变为《残疾人综合支援法》，并进行了扩充支援等修改（2013 年 4 月施行）。

▲“《劳动者派遣法》的根本性修改”——向国会提交《劳动者派遣法修改案》（2010 年 4 月）。虽被搁置一年半，经民主、自民、公明三党修正，删除制造业派遣、登记型派遣原则禁止条款等，在抽空实质之后才获通过。但日雇派遣被原则禁止（2012 年）。

●“推进全球变暖对策”——鸠山首相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谈及日本的中期目标：到 2020 年较 1990 年削减 25% 的温室气体，但此后民主党政权下并无特别动作。

●“致力于构建东亚共同体”——民主党政权下似无特别进展。

民主党政权为何自毁

“至少也要迁到县外”的政策未能实现而下台（鸠山内阁）、打出“上调消费税”而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菅内阁）、通过“上调消费税”“抑制社会保障费”的法案后解散国会、在大选中大败（野田内阁）——民主党的三届内阁，无不以自取灭亡的形式下台。

为何会走到这步田地？

重大理由之一，在于挡在民主党政权面前的高墙太厚。美国之墙、财界之墙、官僚之墙。冲绳基地搬迁问题固然如此，否定“结构性改革”的种种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也是如此。如第六章所见，“结构性改革”正是响应财界以及美国的愿望与要求的政策。挡在否定该政策、试图使其“效果”化为乌有的民主党政权政策面前，这三堵墙企图阻碍其实现，说是理所当然也确为理所当然。财界、美国这两堵墙，大概不至于直接挡在民主党政权面前，取而代之挡在前

面的是其代言人——官僚。以诡计妨害“至少也要迁到县外”方案的外务省、防卫省官员就是其例。

民主党政权未能突破那堵墙，自毁了。

高墙不仅存在于政权之外，也存在于内部。具体而言，以即使不反对政策、也不予合作的“人”的形式存在。民主党曾是一度与自民党竞逐“改革”的政党。可以推测，党内也拥有众多心底里赞成“结构性改革”的党员。同时，无论是否意识到，高墙也存在于每一名党员的心中。

面对这众多高墙，民主党政权并未充分具备突破它们的力量。

众多厚墙的存在，与突破高墙所需力量的不足——岂不正是这些，带来了民主党政权的自毁吗。

具体来看看。

首先是鸠山内阁。

我认为“至少也要迁到县外”这一鸠山首相的主张是正确的。冲绳人自不待言，这也是“本土”的人们能够充分接受的主张。只是，其后的做法不行。

“至少也要迁到县外”的主张，姑且不论美国，对外务省、防卫省的官僚而言也是无法痛快接受的主张，而这一点，鸠山首相及其周边，以及民主党与联合执政党的众人，本应都十分清楚。既然如此，就必须制定方略、采取行动。首先，谋求政权内、民主党内、联合执政党内意志的统一。其次确定分工，各人在同一意志之下行动。由此生出鸠山首相亲自赴美与奥巴马总统面谈的计划也无不可，本应生出。把政权的全部能量首先投向“至少也要迁到县外”构想的实现——鸠山内阁欠缺的，不正是这样的力量（突破力）吗。

其次是菅内阁。

首先有个重大疑问。为何要制定那份令人以为是自民党内阁之物的“新增长战略”——与鸠山首相的“施政理念”内容截然相反的“增长战略”。想来总不至于是受财界建言的产物。是官僚怂恿的产物？还是菅首相内心的“结构改革”志向起了作用的产物？完全无法理解。

这一时期的民主党政权若需要“长期愿景”，那也不该是“经济的长期愿景”，而应是“人们的生活的长期愿景”。在民主党政权之下，将来会实现怎样的生活？不正应当把那幅未来图景描绘给人们看吗。

再就是“上调消费税”发言。可以推测，其背后有财务官僚面对希腊危机的发言或忠告。“日本再这样下去可会变成希腊的哦”。

且假定确曾有过那样的发言或忠告，那时，他难道不曾想过“真是如此吗”，从而去查一查，或问一问党的幕僚、身边值得信赖的经济学家吗。若是没有问过，又或者即使问了答案也依然如故，那么从中显现的，终究还是民主党政权作为政权的知识不足、作为突破力的知识不足。

日本不可能变成希腊——因为这种事，只要稍加调查，或遇上正经的学者，马上就能明白。

事情对野田首相来说也是一样。

我想，民主党政权的困窘在于钱的问题、财源的问题。削减支出中的浪费，本应能挤出更多的钱。于是试了“事业甄别”。然而挤出的不过两三万亿日元。

话虽如此，民主党政权并未触碰最大的浪费。即军费（防卫预算）这一浪费。民主党政权下，防卫费三年间几乎编列着相同额度的资金，每年4.7万亿日元（图表7-2）。为何连军费都不曾列为“事

业甄别”的对象。“从军舰、坦克到人”。与“从混凝土到人”并列，再多一条口号不也很好吗。

税的问题也是如此。为何是下调法人税。难道不应以上调所得税（对高额收入者增税、对分红与股票出售收益增税等）来替代上调消费税吗，民主党周围难道没有能提出这类方案的税制专家或幕僚吗，等等。

遭遇难局之时打开局面所需的自由构想——可以说那也是突破力。

我不能不认为，民主党政权欠缺的正是那种突破力。

话虽如此，民主党政权的登场，纵然是一时之梦，确曾给众多国民带来梦想，这是事实。我愿珍惜这一点。期盼下一次登场的，是拥有实现梦想的力量的政权。

第八章 安倍经济学：超宽松货币政策与第三轮“结构性改革”（2013～2019 年）

2012 年 12 月的大选以自民党的大获全胜告终（自民 294、公明 31、民主 57、维新 54）。从反对“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的小泽集团退出民主党（2012 年 7 月）前后起，大势似乎就已经注定。据说，官僚们（尤其是经济产业省的官僚们）开始频繁出入自民党本部，惹人注目。2012 年 9 月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之后，势头更甚（轻部谦介《官僚们的安倍经济学》）。在官僚们看来，仿佛“属于我们的春天回来了”。据说安倍总裁本人也在 2012 年秋，给身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打国际电话，征询“有人说用货币政策来运营经济是违背常识的，您看怎么样”（同书）。安倍政权复活的准备似乎正在稳步推进着。

1 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三个特征

2012 年 12 月 26 日，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

最早推出的政策是“面向日本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2013 年 1 月 11 日内阁会议决定）。

“以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摆脱长期持续的日元升值与通缩萧条，力争扩大就业与收入”——其中早早地就打出了“三支箭”政策。“安倍经济

学”这一称呼当时尚未使用，但文中还写入了“重启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这个在民主党政权下沉睡了三年的会议，就此复活。

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政策

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几乎没过多久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它有三个特征。这就是：(1)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政策，(2)为企业服务的政策，(3)丢掉了人们的生活视角的政策。

首先来看“安倍经济学”这项政策(1)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这一点。

在有关第二次安倍内阁经济政策的早期文件中，着墨最多的是《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基本方针》，2013年6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

即便带着“为什么非要搞安倍经济学（以‘三支箭’为核心的政策）”“靠安倍经济学真的能够实现日本经济的再生吗”这样的问题意识去读这份文件，其中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完全看不明白。

文件开头写道：“以1990年代初期的泡沫崩溃〔注……顺便一提，泡沫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气泡，所以它不会‘崩溃’，只会破裂或者消失〕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从那时到现在的约二十年间，总体上只得安于低经济增长。”“回顾这期间的宏观经济运营，政府采取了景气对策以及促进金融机构处置不良债权等一轮又一轮的政策应对，日本银行也实施了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等等……然而，……始终未能走出低增长与通缩。”这些只是陈述事实的文字。为什么二十年间总体上只得安于低经济增长，为什么政府的政策不奏效，怎样做才对，这方面的分析一概没有。

没有任何这类分析，文件里就突然出现了“三支箭”政策。

文件接着写道：“安倍内阁将把处于相互补强关系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即所谓安倍经济学）合为一体，以不同于以往层次的力度强力推进。……要实现摆脱长期通缩与景气低迷，必须立足于对停滞二十年的反省，采取与以往在质与量上都不同层次的应对。”

实施与以往在质和量上都不同的政策——所以应该会奏效，这里所说的仅此而已。这样真的会奏效吗？没有任何证明。

若要谋划摆脱长期停滞的方略，通常首先要①分析和考察：长期停滞因何发生，其原因是什么。接着②分析：此前的政策为什么不奏效，是否切实针对了①中析出的原因，并思考不足之处在于质（政策是不是搞错了方向），还是在于量（是不是本应用更大力度推进）等等。经过这样的论证之后，③才会推出新政策（即认为这样应当会奏效的政策）。这才是常理。

安倍内阁没有经过这样的步骤，就突然端出“三支箭”政策，说这与以往相比在质与量上都不同，所以应该会奏效。我因此认为它是一项缺乏科学分析与逻辑思考的政策。

为企业服务的政策

接下来是(2)为企业服务的政策这一点。

“面向日本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中有一节提出，要力争建成“全世界企业最容易开展活动的国家”，手段是“综合运用财政、税制、管制改革、货币政策等工具”。

不禁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确实，（如第六章所见）“结构性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响应财界的要求、为财界（换言之即企业）服务的政策。但是，其执行者们（小泉首相、竹中大臣等人）并未公然说出“为了企业”。他们（至少表面

上)是用“为了日本经济”“为了日本经济的再生”之类的说辞包装起来实施的。堂堂正正地把建设“全世界企业最容易开展活动的国家”、把“为了企业”列为经济政策目标的,恐怕安倍首相是第一人。

要说坦率倒也确实是坦率,但这样真的好吗,我不免这样想。无论如何,为企业服务的政策,这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二个特征。

丢掉了人们的生活视角的政策

再者是(3)“人们的生活视角的缺失”。

安倍首相在就职时的施政理念演说(2013年1月)中,把“处于危机状态的我国现状”概括为“四大危机”。所谓“四大危机”是:①“日本经济危机”、②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迟迟未获推进这一“复兴危机”、③“外交与安全保障危机”、④“教育危机”。后面两项对危机的把握确实很有安倍首相的风格,但姑且不论,在他数出的这四项“危机”之中,并没有“人们的生活危机”。

距离“派遣村”的严酷境况过去才不过四年,现实却是超过60%的家庭诉说“生活非常困苦”或“有些困苦”(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3年)。看来,人们的生活之艰辛,并未进入安倍首相的意识之中。

后文将会谈到,这种“人们的生活视角的缺失”,正是安倍经济学一直未能取得成果的一大原因。

2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①——围绕“大胆的货币政策”

下面来看安倍经济学的各项政策。

说到安倍经济学,这个词有时指“三支箭”政策(狭义),有时指安倍内阁经济政策的整体(广义),这里取广义来把握,对其主要政策逐一考察。

首先是有代表性的政策“大胆的货币政策”。

为让日本银行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

安倍总裁提倡“大胆的货币政策”，并在选战中一直把实施该政策作为头号招牌，可真当选就任首相、要着手实施政策时，却横着一大障碍。那就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日本银行。即《日本银行法》在其第一条规定：“日本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以发行银行券并调节通货与金融为目的。”其第三条还规定：“日本银行在通货及金融调节上的自主性，必须受到尊重。”这里所说的“通货及金融的调节”就是货币政策。第一条与第三条规定的就是：货币政策由日本银行实施，日本银行可以自主实施政策。

安倍首相想要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不同意就实施不了——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应对，安倍首相首先想到的似乎就是修改《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日本银行的高管……在任期内，不得违背其本人意愿予以免职。”要修改这一条款，重新规定为：不遵从政府意愿的日本银行总裁，可由政府予以免职。

2012年11月16日，在众议院解散后的记者会上，自民党总裁安倍说：“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型金融，……把修改日银法也纳入视野……将实施以往自民党从未挑战过的大胆的货币宽松。”自民党的竞选公约（11月21日公布）中也写道：“把修改日银法也纳入视野，建立政府与日银加强协作的机制。”

确保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这一规定，是汲取了二战期间的教训制定的：当时各国中央银行顺从政府的意愿大量认购国债（结果政府得以筹措到军费），国民却在战后饱受剧烈通货膨胀之苦；许多国家都设有这类规定。《日本银行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等规定，也是为了确保中央银行应有的样子（独立于政府决定货币政策的权限）。哪怕要修改这部法律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自民党总裁安倍的意向。

然而，结果对日本银行而言（对日本国民而言也是）幸事一桩：《日本银行法》最终未被修改。

其一，2013年1月22日，政府与日本银行的磋商达成一致，日本银行作出政策决定，将此前作为“物价稳定的参考值”“1%”的提法改为“物价稳定的目标2%”，并与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关于此事，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后来写道，鉴于“明确亮出主张的政党获得了国民压倒性支持这一事实”，他“判断不得不拟定某种共同文件”（白川方明《中央银行》）。安倍首相未经修法，就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其二，2013年3月，日本银行两名副总裁五年任期届满卸任，与此同时，原定5月任期届满的白川总裁也辞了职。安倍首相由此得以任命赞同自己政策的黑田东彦（原财务省财务官）为总裁，并任命两名同样赞同其政策的人物为副总裁（按规定，日本银行总裁与副总裁须经国会同意，由首相任命）。

就这样，日本银行在新总裁黑田手下，开始实施秉承安倍首相意旨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此后，黑田总裁在五年任期届满后仍被安倍首相再次任命，“大胆的货币政策”在2019年的今天仍在实施）。

“大胆的货币政策”的实施

下面来看黑田总裁就任后的日本银行。

2013年4月4日，日本银行宣布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即黑田总裁所称的“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将其主要内容浅显地概括一下，就是：①从民间金融机构大量买入其持有的国债（规模达到使

日银的持有国债余额每年增加 50 万亿日元)，②同时增加 ETF（股价指数联动型上市投资信托）等的买入，③其结果，使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每年增加约 60 万亿～70 万亿日元。

这项政策究竟有多么“超常规”，看看此时日本银行发表的资料（图表 8-1），就能想象一二。

图表 8-1 基础货币目标与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展望（万亿日元）

	12 年末（实绩）	13 年末（预期）	14 年末（预期）
基础货币	138	200	270
（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明细）			
长期国债	89	140	190
CP 等	2.1	2.2	2.2
公司债等	2.9	3.2	3.2
ETF	1.5	2.5	3.5
J-REIT	0.11	0.14	0.17
贷款支援基金	3.3	13	18
其他 资产总计	158	220	290
银行券	87	88	90
活期存款	47	107	175
其他 负债·净资产总计	158	220	290

（出所）日本银行《关于导入“量与质的货币宽松”》（2013 年 4 月 4 日）附件资料

也就是说，是要把 2012 年末约为 138 万亿日元的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增加到 2013 年末的 200 万亿日元、2014 年末的 270 万亿日元。

日本银行的意图是：手头资金增加了这么多，民间金融机构自然会据此放贷，民间经济主体（企业与个人）持有的资金量（货币供应量）也会增加，增加的资金会流向消费与投资，民间经济活动将活跃起来，物价也会上涨。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银行正为实现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2% 的目标而努力，民间的企业与个人也会渐渐相信物价上涨率终将达到 2%，心想：赶在物价上涨率达到 2% 之前，进一步增加消费与投资。这就是日本银行、也是安倍首相所描绘的剧本。

此后，日本银行又实施了“‘质与量的货币宽松’的扩大”（2014 年 10 月），将基础货币增加额目标从每年 70 万亿日元上调至 80 万亿日元。进而导入了“附带负利率的量与质的货币宽松”（2016 年 2 月），对 2013 年 4 月以来的宽松所供应的资金中仍留存在日本银行（作为各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的部分，收取 0.1% 的利息，以此谋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从日本银行活期存款中驱赶出去。

这些“大胆的货币政策”结果如何？只能说是惨败。

来看“大胆的货币政策”导入后第五年即 2018 年的实际结果（图表 8-2），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从 2012 年末的 138 万亿日元按计划增至 2018 年末的 504 万亿日元，达到 3.65 倍，但民间企业、个人持有的资金量（货币存量）仅从 862 万亿日元增至 1014 万亿日元，只有 1.2 倍左右。GDP 也未见多少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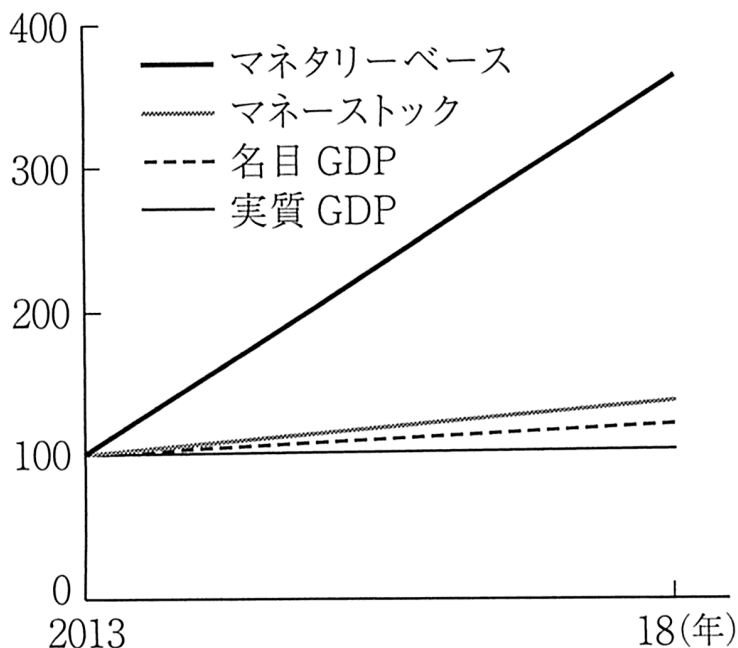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日本银行不断向民间金融机构供应资金，但这些资金并未从金融机构流向民间（企业与个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大胆的货币政策”实施之时，日本的货币环境无论与美国相比还是与欧元区相比，都已处于宽松状态（图表 8-3、8-4），民间本就有充足的资金。在此基础上再获供应资金，民间也几乎没有借入的必要。当时的情形是，金融机构想贷也贷不出去。

3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②——“机动的财政政策”“增长战略”及其他

本节讲“第二支箭”。

图表 8-2 日本银行的资金供应量增加，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随之增加，但民间的资金量（货币存量）却未见多大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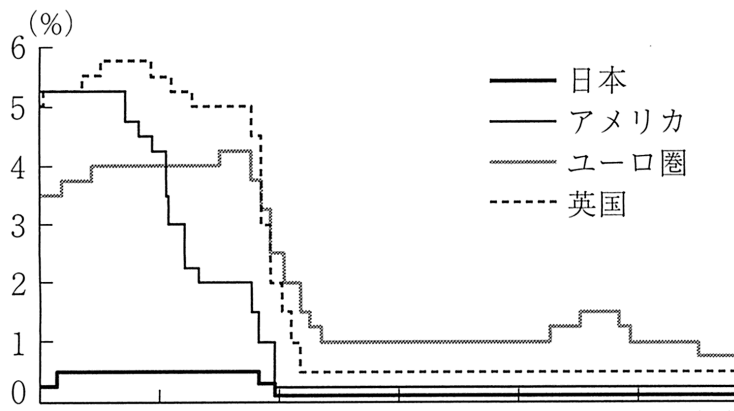
(注) 以 2013 年=100 计算的指数

(資料) 日本銀行《金融経済統計月報》

虽在辞藻上冠以“机动的财政政策”，其实质却是“根据需要扩大公共投资”，而这一政策，安倍内阁一上台就接二连三地付诸实施。

第一，编制了以总额达 10 万亿日元的巨额公共工程追加为支柱的 2012 年度补充预算（2013 年 1 月）。其结果，2012 年度补充后预算的规模超过 100 万亿日元，仅次于东日本大地震之年（2010 年度）的 107 万亿日元与雷曼冲击次年（2009 年度）的 102 万亿日元，位列史上第三，为平时时期最大规模。

图表 8-3 政策利率水平的国际比较——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时，日本的利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注) 2008 年 12 月 16 日以后，美国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为 0~0.25%，准备金存款的付息利率为 0.25%。2010 年 10 月 5 日以后，日本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为 0~0.1% 左右，补充活期存款制度的适用利率为 0.1%

(出所) 日本银行《经济·物价形势展望》(2012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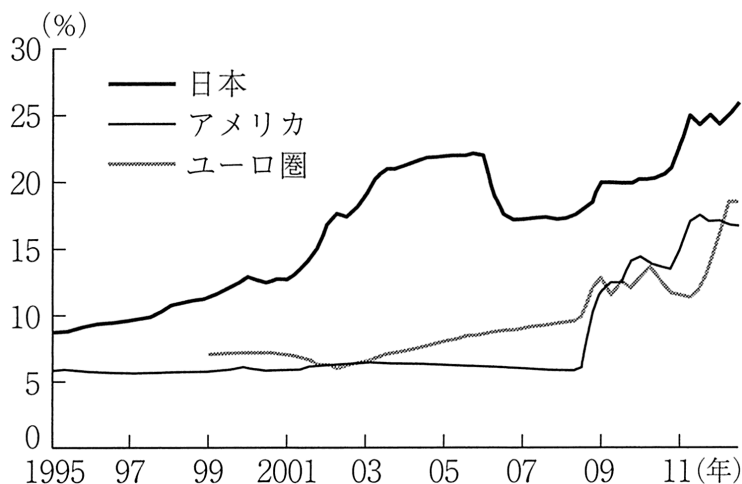
接着，将 2013 年度预算编为 92.6 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年初预算增加 2.5%）的大规模预算。公共工程相关费用列入了 5.3 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15.6%）。

第三是 2013 年度补充预算。编制了总额达 5.5 万亿日元的大规模补充预算。其中心仍是公共工程。

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 GDP 统计来看，2013 年的公共资本形成（政府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率（实际）高达 6.7%（图表 8-5），并将 2013 年的 GDP 实际增长率推高至 2.0%（与政府消费支出合计的公共需求贡献度为 0.6%。图表 8-12）。

随着安倍内阁的登场，“第二支箭”在营造“景气变得好极了”这一印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图表 8-4 中央银行资金供应量的国际比较——量化宽松在发达国家中也是规模最大



(注) 1. 基础货币占 GDP 比重

2. 基础货币为银行券发行额、货币流通额与中央银行活期存款之和

3. 日本、欧元区的 2012/3Q 名义 GDP 为 2012/2Q 的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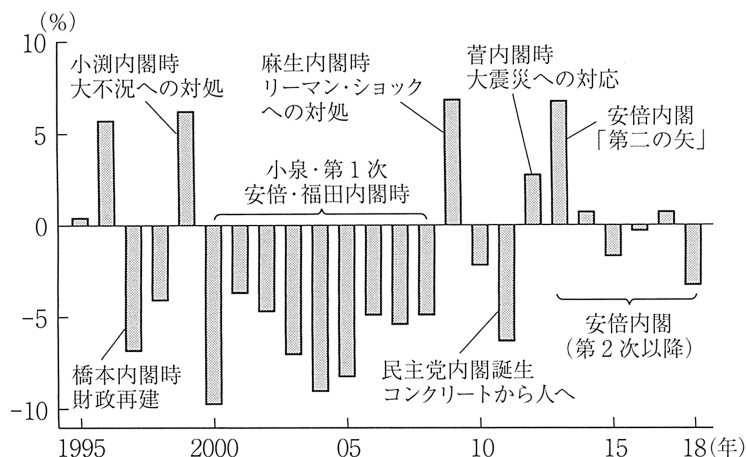
(出所) 同图表 8-3

因财源等问题而放不出箭来的“第二支箭”

然而，“第二支箭”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扩大公共工程引发连锁反应(建筑工人就业扩大、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增加,建筑行业的设备投资增加)之类的事情并未发生,公共投资此后也没有持续增加。建筑行业把公共投资的增加视为暂时现象,既没有借此机会增加正规就业,也没有购入建筑机械和车辆等来应对进一步的需求增长。

此外还有财政上的制约。安倍内阁方面似乎也认识到,由于民主党政权时期(2012年12月)开始的景气回升已得到确认,“第二支箭”的作用已经结束。2013年公共投资的同比增长率实际高达6.7%,2014年降至0.7%,此后或转为负增长(2015年、2016年、2018年),

图表 8-5 支撑第二次安倍内阁初期景气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公共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率（实际）



即便增长也不足 1%（2017 年）（图表 8-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图表 8-12）。

“减税”与“放松管制”，内容丰盛的“第三支箭”

“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第三支箭”，可以说正是为实现“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便于企业活动的国家”——而射出的“箭”。“第一支箭”“第二支箭”旨在实现眼下的目标、让日本经济走上“再生”之路，可以说是实现短期目标的“箭”；与之不同，这支箭可以说是实现长期（终极）目标的“箭”。

这支“箭”列举在与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同时设置的“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本部长＝安倍首相，成员＝全体国务大臣）所制定的“增长战略”之中。“增长战略”始于 2013 年的“日本再兴战略”，此后依次为“日本再兴战略修订”（2014 年、2015 年）、“日本再兴战

略”（2016年）、“未来投资战略”（2017年、2018年）、“增长战略执行计划”（2019年），名称逐年稍有变化，每年制定。

看最初的“日本再兴战略”（2013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其中提出了①通过实施“日本产业再兴计划”，强化产业基础；②通过实施“战略市场创造计划”，以社会课题为跳板创造新市场；③通过实施“国际展开战略”，夺取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这“三个行动计划”，并记载了实现各项计划的具体战术与战略等。这一“战略”逐年根据实绩重新打磨，一直延续到最近的“增长战略执行计划”（2019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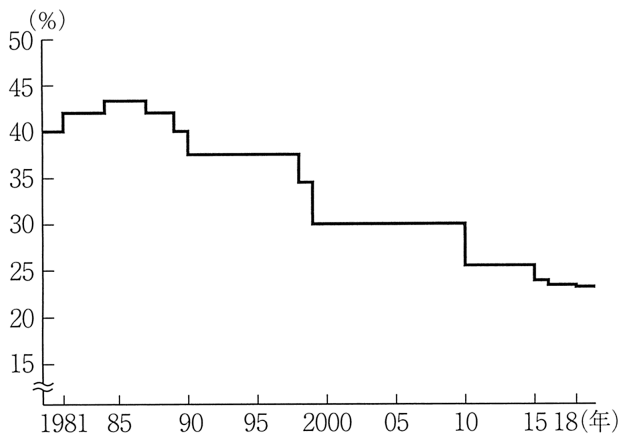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提出（并付诸实施）的种种政策（即“第三支箭”），实在无法在此尽数列出，而且我认为也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这里只选取我认为主要的几项，附上简单的注释。

①法人税减税

日本的法人税（实际税率）过高，希望下调（应当下调），这是经团联长期以来的主张。想必是接受了这一主张，第二次以后的安倍内阁从2014年度起连续下调法人税率，2018年度降至23.2%。实际税率（与属于地方税的事业税合并计算的税负担率）降至29.74%，进入20%~29%的区间（图表8-6）。经团联还进一步要求将实际税率下调至25%。

不过，“日本企业的税负沉重”这一说法，是经团联拿表面上的实际税率（图表8-6）与他国比较提出的主张；也有调查结果显示，若把税制上的特别措施（投资税额抵免等优惠措施）考虑在内，并将社会保险费合并计算进行比较，日本大企业的负担比欧洲企业轻（图表8-7）。这是财务省委托大型会计事务所所做的调查，按行业算

图表 8-6 持续下调的法人税率



②実効税率の推移 (%)

	2014年度 (改革前)	2015年度 (2015年度 改正)	2016年度 (2016年度改正)	2018年度
法人税率	25.5	23.9	23.4	23.2
大法人向け法人事業 税所得割 * 地方法人特別税を 含む * 年 800 万円超所得 分の標準税率	7.2	6.0	3.6	3.6
国 + 地方の法人実効税率	34.62	32.11	29.97	2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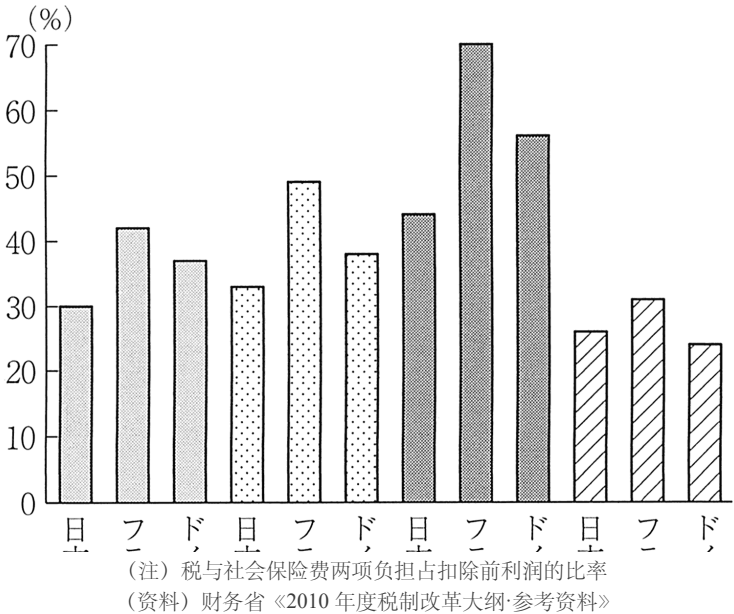
(資料) 財務省网站

出了主要企业的负担率；调查虽然稍旧，但其趋势想必与现状并无不同。

②创设国家战略特别区域制度

安倍内阁在成立伊始的 2013 年就制定了《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着手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关于创设该制度的目的，首相官

图表8-7 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的国际比较——日本企业的社会负担比欧洲企业轻



邸网站上记载：“实现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所必需的大胆的管制·制度改革，创造出‘世界上最便于经商的环境’。”其中还写道：“以往的特区，是由地方政府·团体向国家提出计划，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型的管制改革尝试。而国家战略特区，则是由国家主动参与对象区域的选定，以快速的态势突破岩盘管制的机制。”

图表 8-8 国家战略特区一览及其中的获批事业示例

①国家战略特区的指定区域	
秋田县仙北市，仙台市，新潟市，东京圈（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市，成田市），爱知县，关西圈（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兵库县养父市，广岛县·爱媛县今治市，福冈市·北九州市，冲绳县	
（截至 2019 年 3 月）	

②广岛县·今治市“特区”的获批事业	
广岛县·今治市事项数：8 事业数：14 (广岛县：7/今治市：6/广岛县·今治市：1)	
与接纳创业人才相关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特例	广岛县，今治市
与支援创业者确保人才相关的《国家公务员退职津贴法》特例	株式会社 OTTA 株式会社 B·S 涡之鼻通讯株式会社
关于特定实验试验局制度的特例	株式会社 Energia CommunicationsLuce Search 株式会社
设置雇用劳动咨询中心	内阁府，厚生劳动省，广岛县
设置人才流动化支援设施	内阁府，广岛县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特例	爱媛县广岛县，广岛市
“道之驿”设置者向民间扩大	民间经营者（今治市吉海町）民间经营者（今治市伯方町）民间经营者（今治市上浦町）
与新设兽医学院相关的许可标准特例	学校法人加计学园

（出所）首相官邸网站

截至 2019 年 3 月，全国有十个地区（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等）被指定为“特区”（图表 8-8。加计问题所涉的广岛县·今治市也是其中之一），在城市开发、医疗、教育、护理、保育、农林水产业及其他各种领域实施放松管制。可以说，其目的就是要将岩盘管制蛀出一个个缺口，最终导向废除管制吧。

③放松劳动管制（制定“役使方式改革”法）

安倍内阁于 2018 年 6 月通过了《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对加班时间的上限加以管制；②将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专业职业排除在劳动时间管制的适用对象之外（引入“高级专业人才制度”）；③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不合理的待遇差（“同工同酬”）等。安倍内阁最初想要纳入的“扩大裁量劳动制”，因政府提交的统计资料存在重大错误而被剔除；但即便如此，

此次法律修改仍可能给劳动者今后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对资方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的——毋宁说，称之为“役使方式改革”才更为贴切。

也就是说，①关于加班时间，此前一直交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法律上并无管制。设置管制可以视为一个进步，但其上限允许的时间实在太长，存在让劳动者被迫工作到“过劳死”边缘的危险。又或者，即便发生了过劳死，也可能因加班时间在法律框架之内，而使资方得以免责。顺带一提，《劳动基准法》第一条规定：“劳动条件必须满足劳动者过上作为人应有的生活之所需”“本法所定劳动条件的基准是最低基准，因此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必须努力谋求其提高”。此次允许长时间加班的法律修改，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

此外，与许多按日、按周、按月设定加班时间上限的欧洲国家相比，此次修改对劳动者而言严苛得无可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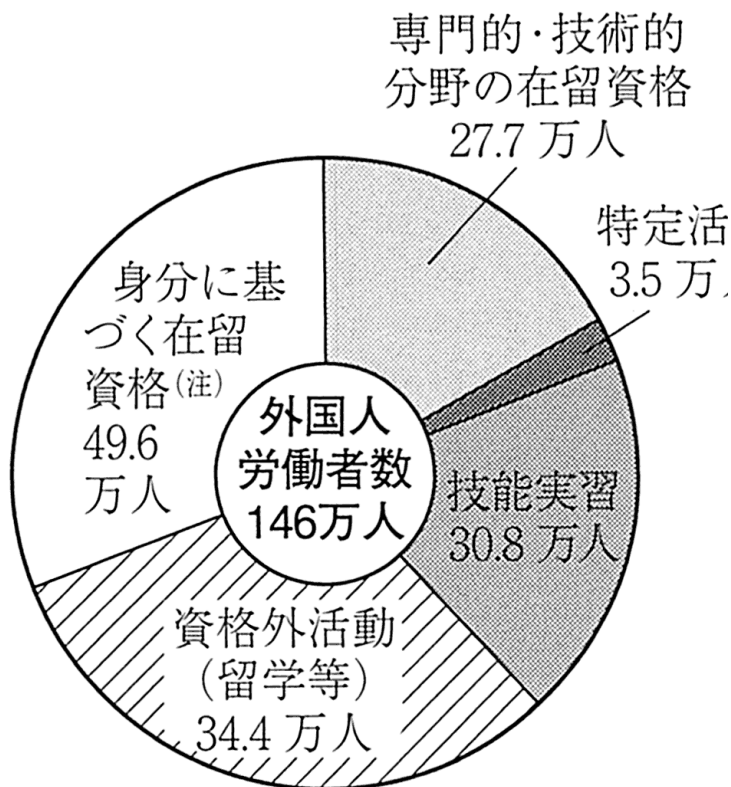
其次，②“高级专业人才制度”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年收入1075万日元以上的人。然而，立法时定下的基准，在法律制定之后（朝着对企业有利的方向）逐步放宽，是常有的事（近年就有派遣劳动的先例）。适用对象有可能逐渐扩大到收入较低的劳动者。

③“同工同酬”本身固然好，但令人担忧的是，它可能通过压低正式员工的待遇来实现。工会固然需要奋力争取，但对“将非正式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的运动，也必须投入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④新设外国劳动者接收名额

安倍内阁改变了政府此前除专业、技术领域（研究人员、工程师等）外不接收外国劳动者的方针，设立“特定技能一号”及“特定技能二号”的名额，宣布专业职业以外也可接收劳动者，修订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2018年12月公布，2019年4月施行）。

图表 8-9 按在留资格分类的外国劳动者人数



(注) “基于身份的在留资格”指永住者、日本人的配偶等、永住者的配偶等、定居者

(资料) 厚生劳动省《关于外国人雇佣状况的申报情况》

“特定技能一号”是指具有“属于应确保紧缺人才的产业领域、需要相当程度知识或经验的技能”的人员，“特定技能二号”是指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员。前者的在留期限累计五年，不允许家属随同；后者可更新在留期限、可携带家属。接收行业为护理、餐饮、建筑等 14 个行业，接收名额为五年约 34.5 万人。

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关于外国人雇佣状况的申报情况》（2018年10月）），调查时点约有146万人在日本工作（图表8-9）。其中，“技能实习”原本以“在日本接受研修后回国运用所学技术”为宗旨，是一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制度，但在现实中却被强烈批评为“成了以低工资驱使外国人劳动的制度”。“被迫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长时间劳动”“这是侵犯人权”等调查报告为数众多，日本律师联合会“要求改善的建议书”、工会“要求彻底重审的意见书”等也已提交给政府。

随着新接收名额的扩大，这种无视人权的雇佣会不会被扩大再生产，结果会不会导致劳动者整体劳动条件的恶化——正因为防范对策尚未充分备好，制度改革就以临阵磨枪的方式仓促进行，着实令人担忧。至少对于技能实习生的劳动条件，理应尽快开展切实的实况调查并研究改善对策，这是最低限度该做的事。

⑤致力于“社会（Society）5.0”

“增长战略”于2017年更名为“未来投资战略”。此后引人注目的，是“社会（Society）5.0”一词的频频出现，以及为实现“社会5.0”而提出的众多建议与对策。

先说“社会5.0”这个词：政府把不远的未来描绘为“通过高度融合‘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现实空间）’的系统，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课题解决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Society）”，并将这样的社会命名为“社会5.0”（内阁府官网）。

这里之所以定为5.0，似乎是因为它是继狩猎社会（社会1.0）、农耕社会（社会2.0）、工业社会（社会3.0）、信息社会（社会4.0）之后的“新社会（社会5.0）”。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政府、企业、

个人都必须加以应对，为此就需要“结构性改革”——这就是政府的主张。评论就免了。

⑥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

安倍经济学继以“三支箭”为核心的“第一阶段”之后，还有所谓的“第二阶段”

这么一说。

2015年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安倍首相举行记者会，称安倍经济学进入了“第二阶段”。

“目标是‘一亿总活跃’社会。……为此，将射出新的‘三支箭’。第一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劲经济’。第二支箭，‘编织梦想的育儿支援’。第三支箭。……是‘通向安心的社会保障’。……〔第一支箭的〕目标是‘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希望提出实现GDP 600万亿日元的目标。……第二支箭是……实现希望出生率1.8。……第三支箭是……‘护理离职为零’……希望正式着手建设工作与护理能够兼顾的社会。”

听了这番话，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豁然明白。说是三支箭，可这些不全都像是靶子（目标）吗？箭在哪里？

说到底，为什么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怎么样了，又打算怎么办？

这是一场让人顿时冒出这些疑问的记者会，不过，过多地从逻辑上深究也不一定有意义。

面对预计最迟次年夏天举行的大选，这番话或许就是意在抛出抢眼的目标（GDP 600万亿日元、出生率1.8、护理离职为零之类的

华丽目标)，把选民的视线从“第一阶段”几乎毫无成果的安倍经济学身上引开。

心里刚想着“接下来……”，箭就出来了。

那就是记者会后匆忙设置的“一亿总活跃国民会议”（由13名内阁僚与经团联会长、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等“15名有识之士”组成）汇总提出的《为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应紧急实施的对策》（2015年11月）。为实现三个目标该做些什么，大大小小合计约200支箭被罗列出来。

那么，结果如何？

“第二阶段”的目标，截至2018年一个也没有达成。

• GDP 600万亿日元→2018年的GDP约为550万亿日元。要达到600万亿日元，至少还需要六年。

• 出生率1.8→2018年的出生率为1.42，与召开记者会的2015年的1.45同样低迷。

• 护理离职为零→2017年为9.9万人（总务省《就业结构基本调查》），距目标还很远。

GDP姑且不论（本来也不是越大越好），要提高出生率，需要大幅提高年轻人的工资、缩短过长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营造能够生儿育女的生活环境），但这些完全没有做。而且，要实现护理离职为零，需要大幅改善护理保险制度，却反而推行了相反的政策（把护理保险制度改坏），所以说未能达成也是理所当然。

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实在是一场闹剧。

⑦上调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关于上调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早在民主党政权时代法律已经制定、轨道已经铺好。安倍内阁只需照此实施即可。

话虽如此，上调消费税却进展艰难。第一次于2014年4月按预定从5%上调至8%，但按法律预定随后应于2015年10月实施的第二次上调（上调至10%），却①在2014年11月被推迟一年半，延至2017年4月；接着②在2016年6月又被推迟两年半，延至2019年10月。两次推迟，想来都是出于对迫在眉睫的国会议员选举的影响的顾虑。

经过这样的波折，法律预定的第二次上调（上调至10%，食品维持8%）的时间定在了2019年10月。景气形势极为严峻，但或许也是因为眼下没有大型选举，这一次付诸实施了。

图表 8-10 一般会计税收的走势
（单位：万亿日元）

年度	税收合计	消费税	所得税	法人税
1988	50.8	* 2.2	18.0	18.4
1989	54.9	3.3	21.4	19.0
1990	60.1	4.6	26.0	18.4
⋮				
1996	52.1	6.1	19.0	14.5
1997	53.9	9.3	19.2	13.5
1998	49.4	10.1	17.0	11.4
⋮				
2013	47.0	10.8	15.5	10.5
2014	54.0	16.0	14.0	11.0
2015	56.3	17.4	17.8	10.8
2016	55.5	17.2	17.6	10.3
2017	58.8	17.5	18.9	12.0
2018	59.9	17.8	19.5	12.3
2019	62.5	19.4	19.9	12.9

（注）1. 2018 年度及以前为决算，2019 年度为年初预算

2. 1988 年度的 * 号为物品税

（资料）财务省官网

至此，1989年4月以3%开征的消费税率，在开征三十年后的2019年10月达到了10%。这期间的消费税税收，从全年消费税税收完整入库的1990年度的4.6万亿日元，增加到2019年度（预算口径，计入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这六个月的税收）的19.4万亿日元，算下来增加了约15万亿日元（图表8-10）。到能够预计增税后全年税收的2021年度，消费税税收将大大超过20万亿日元，无疑会成为国家一般会计中最大的一项税收。与“按负担能力负担”这一近代国家税收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的“不公平税制”——消费税的税收成为最大的税收，就是这么回事。该说是事态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还是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税制也已颓废到了极点。消费税税收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法人税税收却大幅减少（图表8-10），每每看到这一现实，这种感受就愈发深切。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依据民主党政权时期由民主、自民、公明“三党协议”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扎实推进（图表8-11）。也就是说，一方面削减各种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增加使用者的个人负担，两者并举，是朝着“谋求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方向的“改革”。

此外，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2015》（2015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中，确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今后的具体措施，其中写入了：①医疗·护理提供体制的合理化（＝通过强化竞争体系降低提供成本），②促进社会保障的产业化（＝营利企业进入医疗·护理业务领域），③公共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的进一步“改革”。①提出“〔通过有张有弛的资金分配等〕重点支持致力于改革的都道府县”，也就是说，研究一种以削减了医疗费·护理费的都道府县为样板、让其他都道府县向该样板靠拢的机制；②提出“促进企业等与医疗机构、护理服务机构、保险人、保育服务机构等合作，扩大新服务的提供”；

年）

③提出“公共医疗保险”、“就公共护理保险研究将其适用范围合理化〔=缩小〕”等等。

图表 8-11 已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主要项目）

医疗	70～74 岁医疗费窗口负担提高到 2 成	2014 年起分阶段实施
	普通病床伙食费患者负担增加	2015 年实施
	无介绍信到大医院就诊时收取定额负担	2016 年实施
	普通病床水电燃气费患者负担增加	2017 年起分阶段实施
	提高高额疗养费（70 岁以上）的负担限额	2017 年起分阶段实施
	废止后期高龄者（75 岁以上）保费减免特例	2017 年起分阶段实施
护理	需支援 1、2 级的上门护理·日间照料转入综合事业	2017 年度末前全面实施
	特别养护老人院入住者原则上限定为需护理 3 级以上	2015 年实施
	年收入 160 万日元以上时，使用费负担提高到 2 成	2015 年实施
	补充给付条件严格化（新设资产、配偶条件）	2015 年实施
	特别养护老人院多人间收取室费	2015 年实施
	补充给付的收入认定对象追加遗族年金、残疾年金	2016 年实施
	第 2 号保费（40～64 岁）引入总报酬分摊	2017 年 8 月开始
	提高高额护理服务费负担上限额（在职水平收入）	2017 年 8 月开始
	年金 物价·工资滑动调整、取消“特例水平”、以宏观经济滑动机制削减年金	2012，13，15，17 年
生活保护	生活扶助费、冬季加给、住宅扶助等的削减	2013～15 年

（出所）全日本民医联（全日本民主医疗机构联合会）事務局编“学习会资料”

对使用者而言，局面看来会愈发严峻。

⑧TPP、对美谈判等

关于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第七章所述，开始朝着参加的方向行动的是民主党政权。自民党（安倍总裁）在 2012 年 12 月

的大选中表明了反对参加的姿态，但在夺取政权后的 2013 年 3 月，安倍首相正式宣布参加谈判，改变了态度。

另一方面，在 2016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当选、于 2017 年 1 月就任的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美国退出了 TPP 协定。

如前所述，此前主导 TPP 谈判的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日本（民主党政权，恐怕最初的安倍内阁也是）受到美国的邀请，可以说是碍于美国的情面参加了谈判。这是因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农牧业大国都参加，TPP 又标榜原则上关税为零，人们认为参加这样的 TPP，日本农牧业所受的打击会太大（过大）。

然而，美国退出后将会如何，安倍内阁的应对备受关注，但日本（安倍内阁）反而积极对其余十个国家做工作，开始推动由十一个国家成立 TPP。

想来，对参加 TPP 是积极还是消极，以国家为单位来区分就会搞错，事情就是这样。积极派是出口产业、出口商社之类，消极派是面向国内的产业，再加上工会、消费者，我想大致可以这样区分。总之，出口产业等会因对方国家关税归零而大获其利，国内产业反而遭受打击；工会方面，内外竞争激化，令人担心劳动条件恶化；消费者方面，则会在食品安全等方面产生不安（TPP 的目的不只是零关税，还把各种管制、各种制度的一体化作为重大目标，比如让食品安全及其他规则也在成员国之间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利害对立不存在于各国之间，而存在于各国内部，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解释的话，日本政府（安倍内阁）从 TPP 加盟的消极派变成积极派的理由，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其立场从重视农牧业和国民生活，转变为重视出口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

而这一 TPP 于 2018 年 12 月生效。生效才半年，就已有报纸报道说，牛肉、猪肉、奶酪、水果等的进口明显增多。影响要到今后才会显现。

另外，至于退出了 TPP 的美国，特朗普政权要求与日本举行双边谈判，安倍首相应允，谈判开始，并以安倍首相全面接受特朗普政权主张的形式达成了协议。

国会审议还在后头，但对日本的农牧业而言，还有，在确保人们的生活安全等方面，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

4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政策启动至今，已经过去六年多。在这一政策下，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首先来看景气的动向。

景气已处于即将进入下降局面的状态

用景气动向指数观察这期间景气的走势（图表 1-1），从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之初（2013 年 1 月）到次年的 2014 年 3 月，扩张势头强劲。其背景是：①在仍是民主党政权的 2012 年 11 月，景气的下降局面结束，景气回升，转入上升局面；②与此同时，因景气下行而中断的雷曼冲击后的复苏动向重新启动；③安倍政权扩大公共工程的政策使需求膨胀（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的效果）；④出于对货币大宽松政策效果的预期，股市走高、日元贬值加剧；等等。此外，从 2013 年末到 2014 年初，由于预定自 2014 年 4 月起上调消费税率，还出现了突击需求。

但是，这一势头只持续到 2014 年 3 月。2014 年 4 月景气动向指数大幅下挫，此后一直保持在下挫后的水平（其实还略有下降），直到 2016 年秋前后。其后也曾有过一段略有回升倾向的时期（2016

年秋至2017年)，但2018年起再度转为下降走势，直至今日（2019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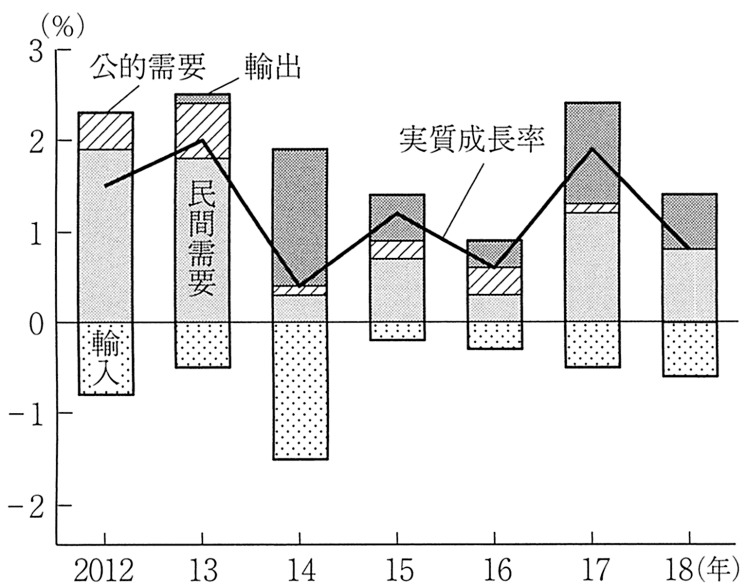
以上看得稍细了一些，但粗略来看，总之就是：自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率以后，景气下挫，至今几乎呈持平状态。

这期间，政府的景气判断（见于《月度经济报告》的景气判断）一贯是“景气正在缓慢回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景气呈持平走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夏以来，指数虽呈锯齿状波动，但趋势上正在走低。其背景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强硬姿态，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开始蒙上阴影。虽说这取决于今后两国关系如何变化，但日本还有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这一问题。

在2019年秋这一時点，应当认为日本景气正处于即将进入下降局面的状态。

图表 8-12 GDP 实际增长率与贡献度的变化⑥



GDP 实际增长率六年间年均 1.0%

下面用 GDP 统计看看逐年实际增长率的变化（图表 8-12）。增长率最高的是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的 2013 年，为 2.0%；此后 0% 档的年份与 1% 档的年份交替排列，总体为低增长。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六年间（2013 年对 2012 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1.0%。

在成立后不久的 2013 年，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的开头这样写道：“以 1990 年代初的泡沫破裂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在迄今约二十年间，总体上甘于低经济增长。这期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 GDP）增长率为 0.8%”。也就是说，安倍内阁的六年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按需求项目来看，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民间消费支出增长率之低，二是出口增长率之高。

首先看民间消费支出，从 2012 年的 292 万亿日元（实际值。按 2011 年价格换算。下同）到 2018 年为 300 万亿日元。六年间仅增加了 8 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 0.5%。若剔除虚拟房租（假定自有住房者支付了房租而计入 GDP 消费支出的部分）这一假定计算的部分，看实际消费额（“剔除虚拟房租的家庭消费支出”），则从 2012 年的 235 万亿日元到 2018 年的 238 万亿日元，六年间仅增加了 3 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 0.3%。

另一方面看出口，从 2012 年的 73 万亿日元增至 2018 年的 93 万亿日元，六年间增加了 20 万亿日元。这期间实际 GDP 的增加额为 36 万亿日元，其中 55% 来自出口的增加。这里再算一下剔除出口的 GDP 实际增长率，六年间平均为 0.6%。这与第五章所见小泉内阁执政下的五年间（2001～2006 年，图表 5-18）的数值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依旧依赖出口的经济、依旧消费不振的经济仍在持续。

图表 8-13 安倍经济学下人工成本等的变化
图表 8-13 安倍经济学下人工成本等的变化

(单位：万亿日元)

	2012 年度	2017 年度	12 年度比
经常利润	48.4	83.5	73% 增
支付股息	14.0	23.3	66% 增
支付人工成本	197.0	206.5	5% 增

(资料) 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企业利润增至 1.7 倍，支付人工成本仅止于 1.05 倍

消费不振的背景是收入增长乏力。要看收入，原本用同一 GDP 统计中的雇员报酬即可，但作为其数据来源的《每月劳动统计》的数字存在统计造假问题、缺乏可靠性，所以这里改用其他统计来推测。

首先，用《法人企业统计年报》(财务省)看企业支付的人工成本总额。由于最新统计只到 2017 年度，这里给出 2017 年度对 2012 年度之比的数字(图表 8-13)。法人企业(剔除金融、保险业)的人工成本支付总额为 206.5 万亿日元，比 2012 年度增 5%；这期间消费者物价上涨了 4.3%，按实际看几乎持平。民间消费支出仅止于极低的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用国税厅《民间工资实况统计调查》(这一统计也只公布到 2017 年)来看“工作满一年的人的平均工资”，2017 年为 432 万日元，比 2012 年的 408 万日元增 5.9%；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 1.4%，年均增 0.3%，与前面看到的消费支出(剔除虚拟房租)年均增 0.3% 大致吻合。

总之，(这毫不奇怪)消费不振的背景是工资(从企业角度看是人工成本)的低增长。

此外，既然看了法人企业统计，顺便把企业经常利润与支付股息的数字也列出来（图表 8-13）。2017 年度的数字是：经常利润增 73%，支付股息增 66%。安倍经济学“成为世界上最便于企业开展活动的国家”这一目标，似乎正在稳步实现。

5 安倍经济学失败了，但似乎仍将继续下去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即将满七年。从统计看，六年的结果已经出齐，在此应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

只能说是失败了。

认为其失败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它至今未能实现自己提出的政策目标。

增长率目标与物价上涨率目标均未能达成

安倍内阁将“摆脱长期通缩与景气低迷”即“日本经济的再生”视为经济政策的课题，并提出要以安倍经济学完成这一课题。提出的目标是名义增长率 3%、实际增长率 2%。即《基本方针（2013）》中这样写道：

“今后十年间（2013 年度至 2022 年度）平均而言，要实现名义 GDP 增长率 3% 左右、实际 GDP 增长率 2% 左右的增长。到 2010 年代后半期，争取实现更高的增长”。

结果如何（图表 8-14）。按逐年数字看，①名义增长率超过 3% 的年份只有一次——只有受上调消费税率影响而名义 GDP 膨胀的 2015 年——。其余五年远未达到 3%。2013 年至 2018 年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1.7%。②实际增长率达到 2% 的年份只有一次，其余年份停留在 1% 档或更低。六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1%。两者都是大幅低

于目标的实绩，“到 2010 年代后半期争取实现更高的增长”也无从谈起。

另外一点，③关于克服通缩，日本银行提出了消费者物价（剔除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的上涨率达到 2% 的目标。在“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启动时”（2013 年 4 月），原本说要“以两年左右的时间为预期，尽早”达成，但至今未能实现，这一点众所周知（图表 8-14）。

如上所述，安倍经济学未能达成自己提出的目标。这正是只能将其评价为失败的原因所在。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认为安倍经济学失败，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说到底，一切经济政策都应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目标。一项政策若使人们的生活变好，就应视为成功；若使之变坏，就应视为失败。这种评价在短期内难以做出，但安倍经济学自政策启动以来已经超过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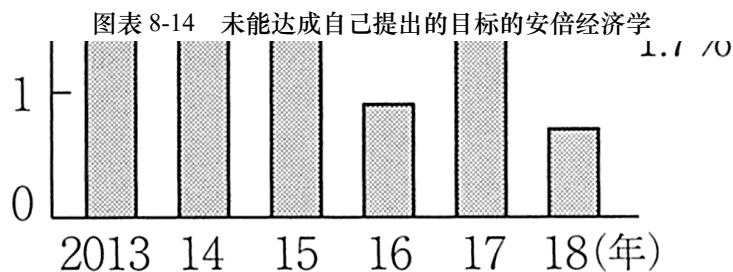
这六年多来，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这就是问题所在。

指标多种多样，这里以总务省《家计调查》中的工薪家庭（两人以上家庭）为对象，将 2018 年的数字与 2012 年相比，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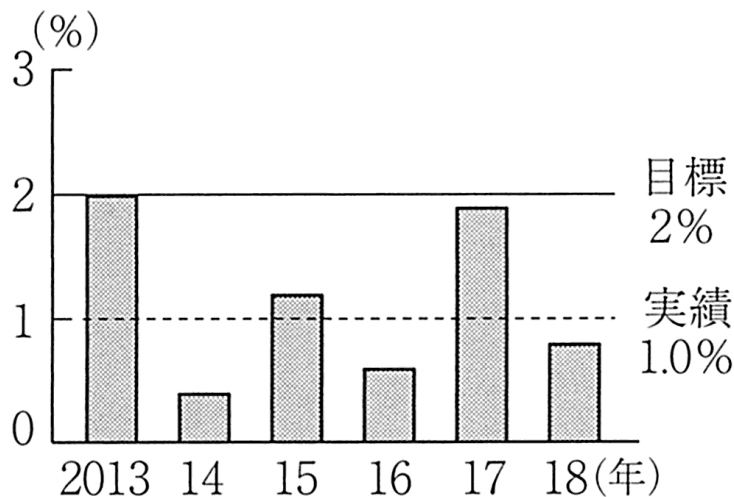
①户均可支配收入按月换算（以下同），2018 年为 45.5 万日元，与 2012 年的 42.5 万日元相比，六年间增加 3 万日元。增长率 7%。这六年里，消费者物价受上调消费税的影响上涨了 5.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收入六年间仅增加 1.6%。

②消费支出 2018 年为 31.5 万日元，与 2012 年的 31.3 万日元相比只增加了 2000 日元（0.6%）。把物价上涨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消费减少 4%。也就是说，工薪家庭在安倍经济学之下，六年间实际消费下降了 4%，生活也就相应地变穷了。

年)



② 実質成長率(目標 2%)



③ 消費者物価上昇率(目標 2%)



(資料) 内閣府《国民经济核算》、总务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③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也就是说，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在下降（2012年73.6%→2018年69.2%）。这意味着即使收入不见增长，各家庭也在压缩消费、转作储蓄，即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在加剧。这正是安倍内阁改坏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影响：消费增长乏力，也给景气带来了恶劣影响。

④话虽如此，压缩食品支出总有极限，结果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消费支出）显著上升（2012年23.2%→2018年24.2%）。

⑤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家计调查》中从低端算起20%——第1分位——的家庭），2018年的医疗费、教育费支出均较2012年压缩了10%。这些已经足够了吧。安倍经济学给工薪家庭带来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众多民众正苦于生计。

不得不说，安倍经济学失败了。

安倍经济学为什么失败了

安倍经济学为什么失败了？明确的理由有两个。

其一是，“三支箭”全都是脱靶之箭，没有触及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如前所见，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在于消费增长乏力，其背景则是工资的下降与增长乏力。无论怎样放松货币（“第一支箭”），也无论怎么想方设法让企业赚钱（“第三支箭”），只要工资不涨，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再生”，也无法摆脱通货紧缩。此外，扩大公共投资（“第二支箭”）在弥补消费不振造成的需求不足这一点上，算是“三支箭”中飞得相对接近靶心的一支，但无奈还有财源问题，箭数有限，效果也只能是暂时的。

其二是，安倍经济学对民众生活的走向漠不关心。本来需要的是提高工资等改善生活的政策，它却反其道而行，持续采取伤害生活的政策（上调消费税、改坏社会保障制度等）。

搞不好是理所当然，这样还能搞好、取得成果，那才叫奇怪——这就是安倍经济学。

尽管如此，安倍内阁并不承认安倍经济学显而易见的失败，而是不断变换花样（准备了“役使方式改革”“社会 5.0”等新的障眼法），似乎仍打算把安倍经济学继续下去。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成“世界上最便于企业活动的国家”，在实现之前都要继续下去——是这个意思吗。

6 今后的经济与人们的生活，会怎样？ 该怎么办？

假定安倍内阁还将再持续一段时间，经济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那么无论对日本经济还是对民众的生活，都几乎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了。

上调消费税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

景气正在缓慢下行，前文已经看过（图表 1-1）。若再加上消费税率上调（至 10%，2019 年 10 月）的恶劣影响，再加上中美经济摩擦导致中国经济减速（乃至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则景气进入下行局面将不可避免。即便是被认为描绘了乐观情景的“政府展望”（2019 年 7 月内阁会议通过），也预计 2019 年度（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的 GDP 实际增长率为 0.9%，与 2018 年度实绩（0.7%）持平。据被认为更为客观的 OECD 展望（2019 年 5 月），日本 2019 年的增长率为 0.7%，2020 年为 0.6%。

在“结构性改革”之下，日本经济已经变成了“景气变好工资也不涨”的结构，而“景气变差工资就会下降”的结构依然如故。今后民众的生活将更加严峻。

此外，安倍经济学对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在并非“工作方式改革”而是“役使方式改革”之下，劳动现场恐怕会更加严酷（长时间劳动常态化、正式员工待遇下调，等等）。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之下的福利服务恶化、个人负担增加，等等。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安倍经济学终结之时迟早会到来，那时必将产生的诸多问题该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安倍经济学终结之时发生的问题

可以说，安倍经济学是一种拖延矛盾型的政策。第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银行在未能见效的情况下一味堆积的供给资金量（基础货币），到2019年3月末已超过500万亿日元，正逼近GDP的100%（政策发动前的2012年末为140万亿日元，约为GDP的30%）。这要如何收敛、如何正常化？正常化过程中利率上升在所难免。从消费者物价上涨率2%左右的现状考虑，目前0%区间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势必向1%左右攀升。其结果将是已发行国债价格的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持有国债的金融机构（包括日本银行）遭受巨额损失。此外还有利率上升引起的股价下跌（正因为是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价，甚至有可能暴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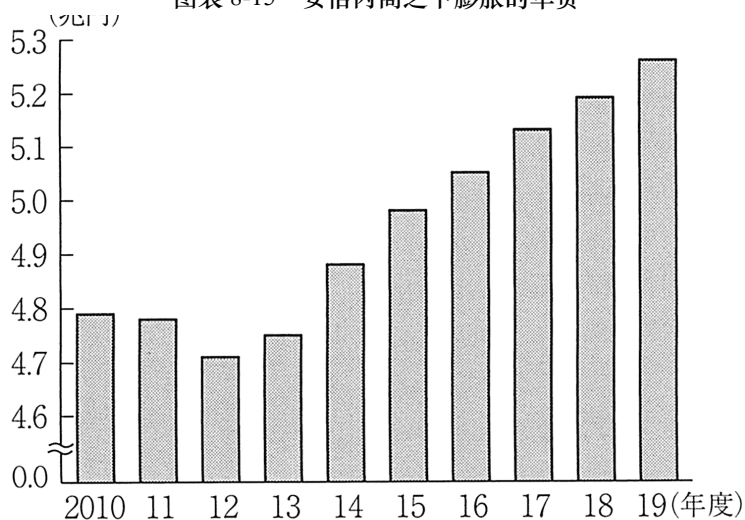
再有，新发国债（为筹措当年财政支出而发行的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负担增加，等等。隐患无穷无尽。

安倍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的应对也一直向后拖延。这是第二个代表性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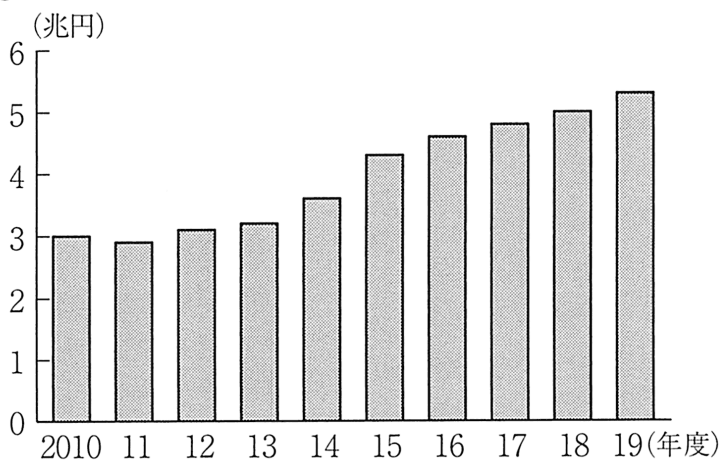
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防卫相关费。年年增加（自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的2013年度起，到最新的2019年度为止连续七年）（图表8-15①）。此外，贷款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拖延下来的欠账越滚越大，“后年度负担金”年年膨胀（图表8-15②）。2019年度的后年度

年)

图表 8-15 安倍内阁之下膨胀的军费



②防衛関係費後年度負担金の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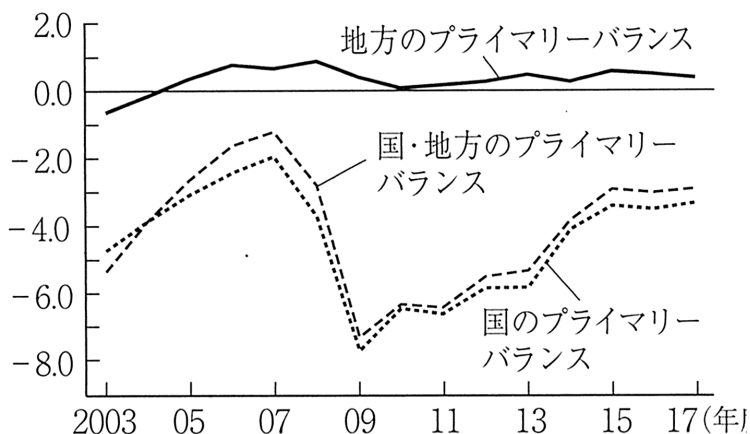


(資料) 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

(資料) 財務省官网

图表 8-16 中央与地方基础财政收支等的变化

(对名目GDP比, %程度)



(资料) 财务省官网

负担额超过 5.3 万亿日元, 已经超过了年度预算额 (5.26 万亿日元)。今后的防卫相关费势必进一步膨胀。

关于财政重建, 安倍内阁最初经内阁会议通过了“面向当下财政健全化的举措等——中期财政计划”(2013 年 8 月), 一直以“中央与地方合计的基础财政收支, 到 2015 年度将赤字占 GDP 之比较 2010 年度减半, 到 2020 年度实现盈余”为目标。

截至 2019 年度的实绩如图表 8-16 所示, “到 2020 年度实现盈余”这一目标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安倍首相在此期间似乎也没有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想必正是因此, 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2018)》中重新提出“扎实致力于经济再生与财政健全化, 以 2025 年度中央与地方合计 PB(基础财政收支)实现盈余为目标”, 将目标达成年度推迟了五年(而目标达成多半是安倍内阁下台之后的事)。

不过，要在这一年度达成目标，也只能认为极为困难。据内阁府提交给“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关于中长期经济财政的测算”（2019年7月），若经济增长率按安倍内阁迄今的实绩（实际增长率1%～1.3%，名义增长率1.5%左右）计算，2025年度的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中央与地方合计将占GDP的1%多（仅中央则接近2%）。

若增长率超过名义3%、实际2%的政府目标，则另一项测算结果是“2026年度收支大体均衡”。

财政重建也很可能被进一步推迟。

对于“今后会怎样？”这一问题，只能回答：“只要安倍内阁继续执政，就没有变好的前景。”所能做的，只有“尽量阻止情况变坏”的吧。针对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只能寄希望于与之相关的市民和工会等各自的努力。

如何才能改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才能改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一问题，可以给出若干积极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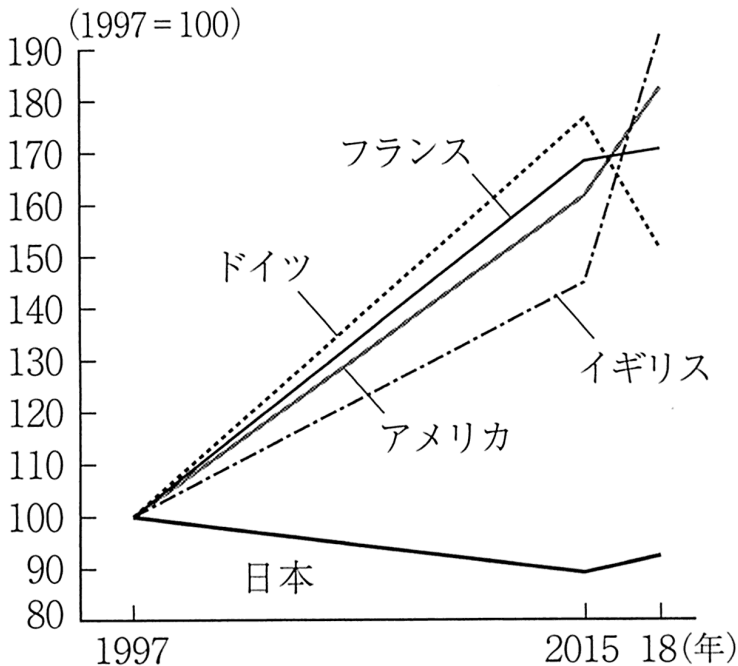
第一，必须大幅上调工资，并从根本（拔本的）上改善劳动条件。

第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好。要紧的是，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变好了，日本经济也会随之变好。

先看第一点。工资下降（通过民间消费支出的增长乏力）拉低了日本经济的增长率，这一点前文已经看到（第六章、图表6-15①②）。日本工资增长率至今依然低迷（图表8-17）。1997年至2015年间，欧美主要国家的工资上涨了50%～80%，唯独日本一国的工资下降了10%左右。2015年至2018年间，日本的工资也转而上升，但其上升率不足3%，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5%～8%的水平。如果这一偏低

图表 8-17 日本工资上升率依然偏低



（注）将含加班费在内的民间部门总收入换算为每名劳动者的金额
（资料）“OECD” “Hourly Earnings Private Sector index, SA”

的工资上升率得到改善，日本相对于美国、欧盟偏低的增长率（图表 8-18）也会提高。

也就是说，日本处于一种得天独厚的状况：人们的生活变好，经济也会变好（反之未必成立）。

图表 8-18 日本、美国、欧盟的经济展望

图表 8-18 日本、美国、欧盟的经济展望（实际增长率（实绩与预测）：％）

年	2018	2019	2020
日本	0.8	0.7	0.6

(续表)

年	2018	2019	2020
美国	2.9	2.8	2.3
欧盟	1.8	1.2	1.4

(出所)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9. 5)

关于第二点，前文已经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在安倍内阁执政期间尤其如此——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压低了消费倾向，从而抑制消费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完全有可能遏制近年来的这一趋势，甚至扭转这一潮流。在这里，让人们的生活变好，同样会带来日本经济的好转。

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可能的

问题在于，上调工资等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是否可能。

这里的答案是：完全可能。

第一，劳动条件的改善与企业的支付能力密切相关。从近年来的收益水平之高、留存收益之多来看，企业整体完全具备这一能力，应该无需证明。如何让其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吐出这些收益，或者说这些留存收益，这是政治问题；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推动低工资的非正规就业者实现正规就业（加强对非正规雇用、派遣劳动的管制等），办法多种多样，吧（顺带一提，对于中小、小微企业这类缺乏支付能力的企业，眼下需要由政府提供支援，中长期则需要改善这些企业与交易对象大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等）。不过，在此仅指出一点：企业整体的支付能力是充足的。

第二，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问题在于财源。至于财政问题，桥本内阁、小泉内阁这类“结构改革”内阁曾以强烈的意愿（在错误的方向上）致力应对。安倍内阁虽然似乎并未正面应对财政问

题，但在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后，同样有对财政问题的考量。

本书在此前的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结构性改革”派内阁应对“财政问题”的做法，给日本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严酷的影响；但至于应如何看待日本的财政问题，则尚未论及。

因此，本书最后设置第三部“第九章”作为独立的一章，就日本的财政问题展开论述，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

第三部 如何看待日本财政

第九章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不会变成希腊（第三至八章补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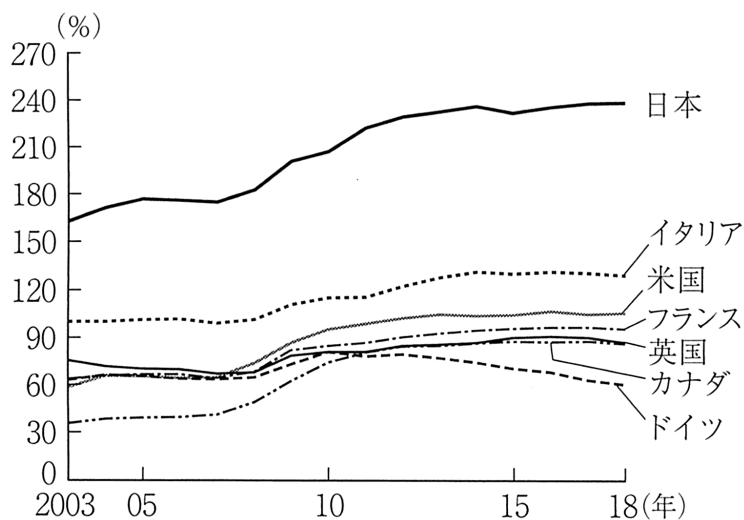
日本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然而……

日本政府背负着巨额债务。仅看国债，到 2019 年度末也将达到 897 万亿日元（财务省估算）。加上其他形式的国家借款，以及地方债等地方政府的借款，政府部门整体的借款余额已经超过 1300 万亿日元。这一余额占 GDP 的比重接近 2.4 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中，意大利为 1.3 倍，美国为 1.2 倍，其余更低。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政府的借款明显偏多（图表 9-1）。日本政府持有的养老金储备金、外汇储备等金融资产比其他国家多，但即使剔除所持金融资产，按纯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来看，日本依然偏多（图表 9-2）。评价这一现状时，财务省写道“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差的水平”（财务省网站）。“最差”与否姑且不论，“最大”则是确定无疑的。

不过，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政府借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虽是衡量政府借款多少的一个尺度，但也仅仅是一个尺度。它并不是超过 1 倍或 2 倍就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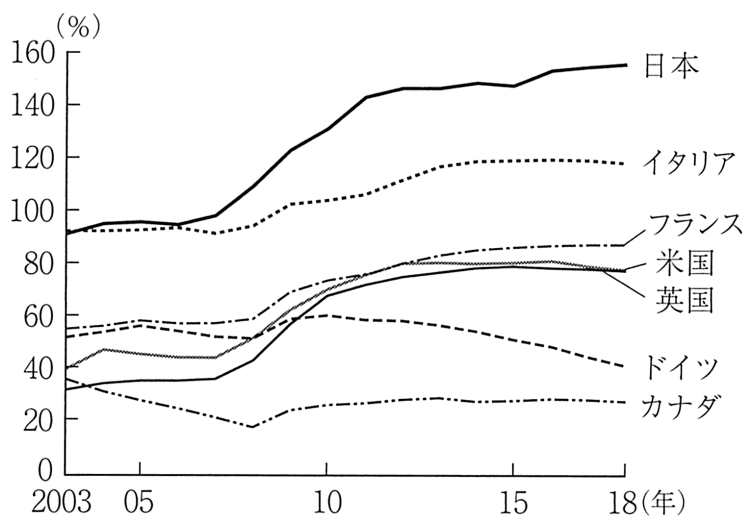
第二，看到国债余额约 900 万亿日元、政府部门总借款余额 1300 万亿日元这样的数字，没有必要悲观地认为“怎么也还不清”。短期内自不必说，即使花上相当长的时期也还不清，这是事实；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图表 9-1 债务余额的国际比较（占 GDP 比重）



（資料）財務省网站

图表 9-2 纯债务余额的国际比较（占 GDP 比重）



（資料）財務省网站

借款人是政府。还款期限一到，需要偿还时，能筹措到相应份额的资金就可以了；至于在到期之前“一次性全部还清”，基本不会有这种事，也没有必要。现在，国家每年发行新国债 30 多万亿日元、用于借新还旧的国债（借换债）100 多万亿日元，合计约 140 万亿日元，而这些国债都被顺利消化了。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政府固然为缺钱所困，但日本国内的资金却有富余，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

把在日本国内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大致分为三个部门——政府部门、法人企业部门（不含金融机构）、家庭部门——来看看每个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与负债余额（图表 9-3）。

图表 9-3 按经济部门划分的资金盈缺（2018 年末）

（单位：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余额	负债余额	盈缺（△为不足）
政府	565	1304	△739
法人企业	1142	1632	△490
家庭	1830	321	1509
其他（非营利团体等）	（略）		61
国内部门合计			341

（资料）日本银行《资金循环》

按 2018 年末的统计来看：首先，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养老金储备金等）为 565 万亿日元，而负债余额（国债、地方债等）为 1304 万亿日元，如前所述，是约 740 万亿日元的巨额净负债。其次，法人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为 1142 万亿日元，而负债余额（股票、公司债、借款等）为 1632 万亿日元，收支相抵，净负债 490 万亿日元（借款等资金大半应该已变为工厂与设备、总部与事务所、营业所大

楼等固定资产——图表 9-3 只列出金融资产与负债，为慎重起见附此说明）。第三，家庭部门方面，全部家庭合计持有约 1830 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现金、存款、证券、保险等）。扣除住房贷款等借款 321 万亿日元，资产盈余 1509 万亿日元。这三者加上剩余部分（财团等非营利团体、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等），日本整体就有 341 万亿日元左右的金融资产盈余。

这些盈余资金去了哪里？它们是国内用不完的剩余资金，因而以各种形式流向海外（证券投资、出资、外币存款等）。严格地说，海外也有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日本，所以这项统计是按日本流向海外的资金总量与海外流入日本的资金总量之差编制的；正如 341 万亿日元这一金额所示（图表 9-4），日本就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如此）。

图表 9-4 主要国家的国内剩余资金（2018 年末）

日本	341 万亿日元
德国	260
中国	236
香港	143
瑞士	99
加拿大	42
俄罗斯	41
意大利	△8
英国	△20
法国	△33
美国	△1076

（注）△为短缺资金

（资料）财务省《日本对外资产负债余额》

政府缺钱就举债。借了又借，总能借得动，即便如此，国内依然有用不完的资金剩下来——这就是现实。

图表 9-5 按国内·海外划分的国债持有明细（2017 年 12 月）

アメリカ	38%
イギリス	27
ドイツ	50
フランス	55
イタリア	36

（资料）财务省网站

日本绝不会变成希腊

从这种状况来看，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那就是：日本绝不会变成希腊那样。

希腊政府也和日本政府一样没有钱，靠举债（主要是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不过，其借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1.3 倍左右，想必比如今的日本低不少。尽管如此，希腊危机还是爆发了。这是为什么？

希腊与日本的重大区别在于：日本国内资金富余，而希腊国内资金并不充裕。希腊国债相当大一部分由海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持有；当希腊政府发表的数字有假、希腊财政比外界所说的更为严峻之类的传言流出时，这些国债被抛售，无人接盘，价格暴跌，希腊政府想发行新国债也无从发行，于是陷入危机。

日本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日本国内资金充裕。日本国债近90%由国内持有（图表9-5）。即使包括海外持有者在内的日本国债持有者，因对日本财政的前景感到不安而抛售，多半也立刻会有人接盘。

另外还有一点：希腊国债与日本国债存在重大差异。希腊国债基本以欧元计价。对希腊国债感到不安的投资者卖出国债、拿到欧元，用这些欧元可以立刻买入德国国债、法国国债等，转投既不用担心，也不费事。而卖出日本国债拿到手的基本是日元，日元无法直接用来购买他国国债；无论换成美元还是欧元，都必须承担汇率风险（美元贬值或欧元贬值，即日元升值，就可能因此蒙受损失）。转投日元计价的公司债等是可行的，但如果日本国债可能暴跌，日本的公司债等恐怕也会跟着暴跌。现实是：即使卖出日本国债，也会为到手的资金派什么用场而犯难。

可以设想的情形，是日元开始全面贬值，而且看上去停不下来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但那已经应当看作日本经济整体的问题，而不是日本财政的问题了。

目睹希腊危机的爆发，民主党政权时期的菅内阁与野田内阁，如果因为担心“日本也这样就糟了”而把舵转向上调消费税的路线，那只能说是无知而愚蠢的选择。

财政重建，以及扩充社会保障等，都是必要的

暂时来看，日本恐怕不至于变成希腊，但即便如此，日本财政的现状——背负巨额债务，而且每年还在进一步增加债务——实在是不健全的。

此外，政府还以这种严峻的财政状况为由，把社会保障制度改坏，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为了走向健全化，也为了守护人们的生活、为此筹措财源，财政重建都是必要的。

需要多少资金呢？

现在的政府把实现基础财政收支（PB）均衡作为眼下的目标提了出来。也就是说，要使国债费以外的支出能够用税金和其他一些经常性收入来支付。从2019年度预算来看，国债费以外的支出为78万亿日元。与此相对，税收及其他经常性收入（发行国债以外的收入）为69万亿日元，要使基础财政收支达到均衡，就需要筹措约9万亿日元的资金。也就是说，就需要相应规模的增税或削减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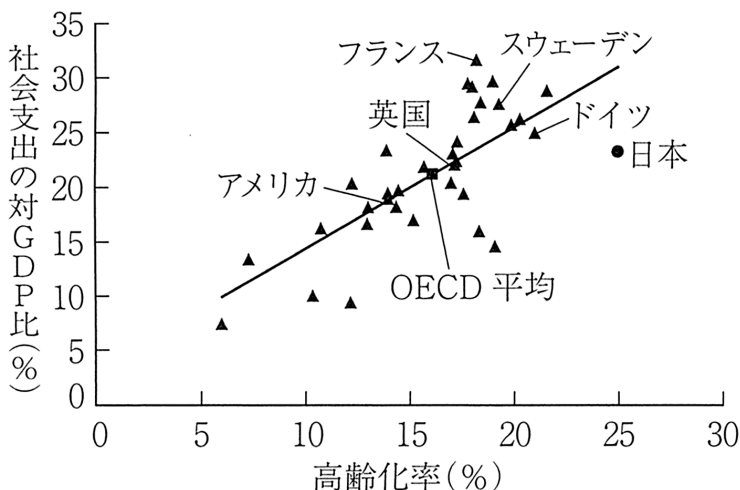
若从更大的视角出发、以恢复均衡财政为目标，就需要把2019年度的国债发行额33万亿日元（其中特例国债26万亿日元、建设国债7万亿日元）降为零；或者，财政法所认可的建设国债姑且不论，至少需要把靠制定特例法发行的特例国债降为零。也就是说，需要筹措26万亿至33万亿日元的资金。

眼下是9万亿日元，再往后是17万亿至24万亿日元，从理想来讲，最终需要为财政重建筹措33万亿日元的资金——无论哪笔都是巨款，但问题不止于此。考虑到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贫弱，为了扩充制度也需要资金。

必须扩充贫弱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的制度”——这似乎是政府的官方见解（《社会保障与税一体化改革大纲》，2012年2月内阁会议通过），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存在几个大问题。

图表 9-6 老龄化率与社会支出的国际比较（2013 年）



（注）老龄化率指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出所）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7 年版）》

第一，虽有制度，内容却很贫弱。比如无法保障晚年生活的养老金制度，等等。

第二，存在大量未能利用制度的人。比如覆盖率据推测仅三成左右的生活保护制度，等等。

第三，制度利用者的负担沉重，许多制度让贫困的人难以利用。比如原则上由个人负担三成的医疗保险制度，等等。

第四，在制度一线工作的人员待遇恶劣（工资低、劳动条件严酷等），制度建立在这些一线人员的牺牲之上。比如照护、护理、保育等。

这些方面亟待改善，但为此，政府必须向社会保障投入更多资金。

政府需要为扩充社会保障制度投入多少资金呢？来做个国际比较吧。

图表 9-6 以横轴表示老龄化率（65 岁以上人口÷总人口）、纵轴表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标示出各发达国家（OECD 成员国）的位置。图中有一条斜线，它表示这样一种倾向：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深，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率也会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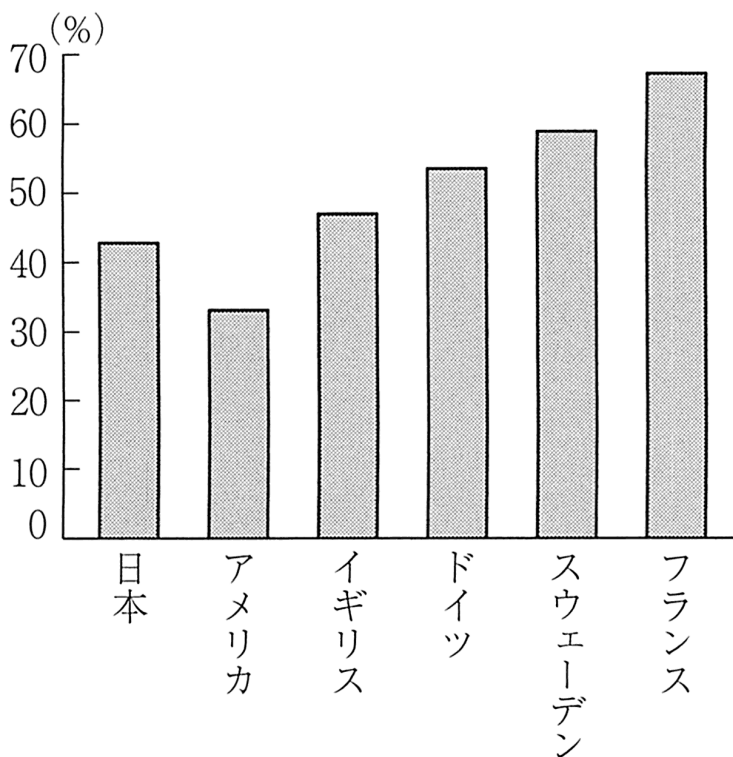
日本的位置在哪里？找一找就会发现，它在图的右上方，比倾向线低出相当一段距离。这张图表明：日本是 OECD 各国中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但就其老龄化程度而言，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例却偏低。若把位于纵轴 23% 处的日本向上（与纵轴平行）移动，放到与倾向线（斜线）相交的位置，会是多少呢？大约是 31%。也就是说，把社会保障支出按占 GDP 的比重再增加 8%，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能达到与 OECD 各国大致相当的水平。

日本的 GDP 约为 550 万亿日元。 $550 \times 0.08 = 44$ ，也就是说，只要再增加 44 万亿日元的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能达到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前面看到的现存诸多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吧（可以把养老金制度改造成能让人安度晚年的制度，可以向所有需要的人发放生活保护费，可以实现医疗费等免费，让任何人都不用为钱发愁就能接受治疗，可以改善在照护、医疗等一线工作的人员待遇，使之成为人人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的职场，等等）。

财政健全化是可能的，扩充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可能的

前文说过，为了财政健全化，要实现最大限度的目标（确立均衡财政）需要 33 万亿日元的资金。此外，扩充社会保障制度需要 44 万亿日元。合计 77 万亿日元。此外还有：增加日本贫弱的文教预算（按占 GDP 比重看，在 OECD 成员国中最低），把国家和地方都大量存在的非正规职员转为正规职员，等等。

图表 9-7 日本的国民负担率偏低（与主要国家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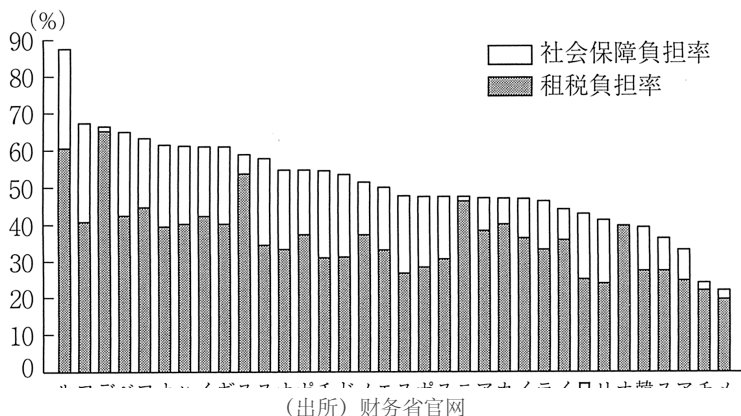
（注）2016 年（日本为 2016 年度）的数字
（资料）财务省官网

不过，话题不再扩大，这里就看看这 77 万亿日元（因为是粗略估算，姑且按 80 万亿日元计），考虑一下这笔资金能否筹措得到吧。

这里的答案是：能够筹措。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国民负担率（（税＋社会保险费）÷国民收入）很低。

日本的国民负担率，2019 年度为 42.8%，与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极低的（图表 9-7）。图中是 2016 年的比较，日本 2016

图表 9-8 国民负担率（占国民收入比重）与 OECD 各国的比较



年度与2019年度相同，为42.8%。即使与OECD成员国相比，也是从低往高数第八位，属于偏低水平（图表9-8）。

负担率较高的一方，有代表性的国家是法国和瑞典。这两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很高，可以认为，它们是在高国民负担之下实现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就以法国为例吧。

法国的国民负担率为 67.2%，比日本的 42.8% 高出 24.4 个百分点。假如把日本的国民负担率提高到法国的水平，日本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费收入能增加多少呢？

日本的国民收入（不仅是个人，也包括企业的收入）目前约为400万亿日元。 $400 \times 0.244 = 97.6$ 。也就是说，可望增加97万亿日元、约100万亿日元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费收入。

前面已经给出数字：财政健全化加上扩充社会保障制度，大约需要 80 万亿日元。与此相对，若把国民负担率提高到法国的水平，可获得的政府收入约为 100 万亿日元，足以支付所需金额而有余。

说这是理所当然，也的确理所当然。因为日本拥有与法国相当的国力。若要求国民承担与法国相当的负担，财政赤字就不会出现（尽管法国是与日本相当的财政赤字国），社会保障制度即使达不到法国的水平，也能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相当（如图表 9-6 所示，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位于倾向线相当靠上的位置，制度水平之高十分突出）。

这里为慎重起见附记一笔。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约有 100 万亿日元的负担能力——但这并不是说消费税还可以继续上调。如本书至此所看到的，贫困的人已经没有负担能力了。上调消费税是行不通的。负担应当由有负担能力（有余力）的一方来承担。每年赚取巨额利润的大企业、靠股票投资和分红获得巨额收入的富豪、年收入超过数千万日元的公司高管、实业家等等。这些方面应当有相当的负担余力，增加负担应当按其负担能力来要求。

另外，虽说无须赘言，但这里给出的数字，终究只是为了表明日本也具备充分的可能性。能否实现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能否朝着这种可能性迈出脚步，是政治的问题。

不过，这难道不是一个能让人多少怀有一些希望的话题吗？

参考文献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批判类著作

内桥克人编《经济学为谁而存在——市场原理至上主义批判》
(岩波书店, 1997)

皮埃尔·布尔迪厄《市场独裁主义批判》(加藤晴久译, 藤原书店, 2000)

内桥克人《噩梦的循环——新自由主义循环》(文艺春秋, 2006)
斯特凡·埃塞尔《愤怒吧! 愤慨吧!》(村井章子译, 日经 BP 社, 2011)

“结构改革”政策批判类著作

内桥克人编《改革为了谁》(对话集, 岩波书店, 2002)
关冈英之《无法拒绝的日本——美国的日本改造正在推进》(文春新书, 2004)

中野麻美《劳动倾销——雇佣多样化的尽头》(岩波新书, 2006)

安倍经济学批判类著作

汤浅诚《反贫困——逃离“滑梯社会”》(岩波新书, 2008)
高桥伸彰、水野和夫《安倍经济学将带来什么》(岩波书店, 2013)

- 伊东光晴《安倍经济学批判——折断四支箭》(岩波书店, 2014)
- 服部茂幸《安倍经济学的终结》(岩波新书, 2014)
- 中野晃一编《彻底检验安倍政治》(岩波书店, 2016)
- 滨矩子《走向窒息死亡的日本经济》(角川新书, 2018)
- 垣内亮《“安倍增税”将摧毁日本——不依赖消费税的道路就在这里》(新日本出版社, 2019)
- 竹信三惠子《“企业优先”化的日本——质问虚妄的“工作方式改革”》(岩波书店, 2019)

有关泡沫、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图书

- 山口义行《金融再生为了谁——不良债权处置的荒谬》(筑摩新书, 2002)
- 建部正义《为什么说“超常规货币宽松”是失策》(新日本出版社, 2016)
- 白川方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家亲历的 39 年》(东洋经济新报社, 2018)

纪实报道、纪实作品等(海外相关)

- 吉尔·A·弗雷泽《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工作所迫的美国人》(森冈孝二监译, 岩波书店, 2003)
- 波莉·汤因比《艰苦劳动——以低工资工作意味着什么》(棕田直子译, 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5)
- 芭芭拉·埃伦赖克《镍币与角币——美国底层社会的现实》(曾田和子译, 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6)
- 戴维·K·希普勒《穷忙族——美国的下层社会》(森冈孝二等译, 岩波书店, 2007)

堤未果《纪实 贫困大国美国》(岩波新书, 2008)

纪实报道、纪实作品等(日本相关)

藤田和惠《名为民营化的劳动破坏——现场正在发生什么》(大月书店, 2006)

布施哲也《官造穷忙族——地方政府的非正规就业与民间委托》(七森书馆, 2008)

竹信三惠子《纪实 雇佣劣化萧条》(岩波新书, 2009)

轻部谦介《官僚们的安倍经济学——畸形的经济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岩波新书, 2018)

政府方面或政府相关人士等的著作

内阁府《经济白皮书》(2001年起为《经济财政白皮书》)各年版
面向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前川报告”)》
(1986)

经济企划厅《生活大国五年计划》(1992)

内阁府《面向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1995)

财政制度审议会《思考财政结构性改革——把光明的未来留给孩子们》(1996)

经济战略会议(咨询报告)《日本经济再生战略》(1999)

竹中平藏《明天的经济学——改革必将让日本再生》(幻冬舍, 2003)

滨田宏一《美国知道日本经济的复苏》(讲谈社, 2013)

自著

山家悠纪夫《虚假的危机 真正的危机》(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7)

《日本经济 令人忧虑的未来》(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8)

《“结构性改革”这一幻想——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岩波书店, 2001)

《景气究竟是什么》(岩波新书, 2005)

《思考“小政府”——以〈经济财政白皮书·第二章〉批判为中心》(公务公共服务工会协议会, 2006)

《“阵痛”已经受够了! ——告别“结构性改革”宣言》(鸭川出版, 2007)

《日本经济 被抛弃的我们》(青灯社, 2008)

《心系生活的经济学——思考景气与生活的兼顾》(新日本出版社, 2008)

《生活视角的经济学——为了经济、财政与生活的重建》(新日本出版社, 2011)

《安倍经济学与生活的去向》(岩波小册子, 2014)

其他

傅高义(Ezra F. Vogel)《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广中和歌子、木本彰子译, TBS Britannica, 1979)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年表 第五版》(岩波书店, 2017)

结语

写完《30年史》，坦白地说，比起“总算干完了一件工作”的满足感，“日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不满足感反而更强烈。除此之外，“今后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糟”的不安感也很强烈。

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泡沫破裂、景气低迷的时候，我也没有过这样的心情。“沉醉于泡沫”的异常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日本经济应该会朝着稍微像样些的时代迈步出发，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眼前的萧条在所难免。当时我带着几分从容，眺望着时代。可结果又如何呢？

日本经济整体如何姑且不论，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三十年间确确实实变糟了。而且眼下还在变得更糟。照此下去，两年后、三年后还会变得更糟。看不到出路。



大概，一味地慨叹是不行的吧。对于这一路写来的现实，其实应当更加愤怒、更加愤慨才对，我想。

我更是想起了斯特凡·埃塞尔——反纳粹抵抗运动的活动家、后来的法国外交官，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据说，在与纳粹斗争的紧要关头，埃塞尔与抵抗运动的同伴们一起，构想了“解放后”社会应有的模样，并制定了应当实现的纲领。其内容从“在经济、社会中实现真正的民主”“让所有孩子都能不受任何歧视地接受最好的教育”“让年迈的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

度过余生的养老金”等日常生活的层面,直到“出版与报道的自由及其受到的尊重,以及相对于国家、金钱权力和外部压力的独立”等精神自由的领域。

这份纲领的大部分内容,在“解放后”的法国得到了实现。

埃塞尔写道:而如今(这里所说的如今,指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已过去十年左右的法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移民被当作非法入境者对待、被强制遣返、遭到排斥的社会,一个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不断缩水的社会,一个媒体落入富人之手的社会——若是抵抗运动真正的后继者……绝不可能容忍”的社会。这是他在九十三岁时的著作中写下的(斯特凡·埃塞尔《愤怒吧! 愤慨吧!》)。

他还写道:“有人厚颜无耻地说,国家已经没有钱用来帮助市民了。可是,与欧洲被摧毁殆尽、法国获得解放的那个年代相比,如今已经创造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为什么到了今天,维持社会基础的钱反而不够用了呢?”

这简直就像是今天的日本。

◇ ◇ ◇

面对这样的现实,九十三岁的埃塞尔并没有慨叹,也没有发牢骚。埃塞尔只是一味地愤怒、愤慨。并且,他面向世人,尤其是面向年轻人,劝勉他们“愤怒吧,愤慨吧”。

再次引用埃塞尔的话。

“愤怒是宝贵的。就像曾经对纳粹主义感到愤怒的我一样,拥有愤怒对象的人会成为奋力前行的战士,汇入历史的洪流。历史那绵延不绝的奔流,正是依靠每一个人的力量延续下去的。这奔流的去向,是更多的正义、更多的自由。……任何人都有追求正义与自由的权利。若是发现有未能享有这一权利的人,就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为他们夺取这一权利助上一臂之力。”

他接着写道。

“最糟糕的是冷漠。是那种‘反正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不是自己管得了的事’的态度。如果抱着这样的姿态，就会失去使人成其为人的宝贵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愤怒，以及亲自向愤怒对象发起挑战的意志。”

正是如此。对于写完本书的我（以及读完本书的你）来说，所需要的，大概就是“愤怒”吧。

◇ ◇ ◇

回到经济的话题。看看日本的现实：生活在日本的所有人都能够各自过上像样生活的社会——足以实现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今天的日本已经充分具备了。正如我在第九章结尾（尽管写得并不充分）所写的那样。

从前，马克思曾为我们描绘过一个乌托邦，认为在生产获得极大发展的未来，它是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能够实现它的社会之中。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今的政治权力，完全没有让这种可以实现的社会成为现实的意愿。

理想的社会，已作为一种可以实现的社会摆在眼前。若有必要，实现这一社会的纲领也可以写出来公之于众，事实上，也有在野党已经写出并公布了。然而，如今的政治权力丝毫没有实现这种社会的意愿。毋宁说恰恰相反。它正朝着与那种社会截然相反的社会（也就是让现今的社会变得更加令人难以生存），企图进一步推进“改革”。

让我、让我们必须愤怒、必须愤慨的，正是这样的现实吧。

◇ ◇ ◇

结果，写成了一篇不像“结语”的“结语”。

本书是应岩波书店新书编辑部伊藤耕太郎的建议执笔写成的。

接到邀约是去年的事，最初预定在今年5月連休过后不久完稿。然而，查找资料等工作占去了时间，完稿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给伊藤添了不少麻烦。在此期间，伊藤始终耐心等待书稿完成，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另外，有一点让我稍感挂心：本书的叙述、图表等，有一部分与我过去出版的著作相重复。注意到这一点的读者，想必也能谅解，毕竟这是同一位作者就同一个时代所写的书，实在在所难免，还望海涵。

2019 年 9 月
山家悠纪夫

版本说明

山家悠纪夫（山家悠紀夫，Yanbe Yukio），1940 年生于爱媛县。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毕业。1964 年进入第一银行；1991 年任第一劝业银行调查部长，1994 年任第一劝银综合研究所专务理事，2001 年任神户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现主持“生活与经济研究室”。另著有《虚假的危机 真正的危机》（东洋经济新报社）、《“结构改革”这一幻想——如何走出经济危机》（岩波书店）、《何谓景气》（岩波新书）、《安倍经济学与生活的去向》（岩波小册子）等多种。

本书原题《日本經濟 30 年史——バブルからアベノミクスまで》，岩波新书（新赤版）第 1799 种，岩波书店刊行：2019 年 10 月 30 日第 1 刷，2024 年 1 月 15 日第 6 刷。ISBN 978-4-00-431799-9。本译底本即该版。

书中脚注均系译者所加，注末署“——译注”。原书正文的年份多作省略世纪的汉数字（如“九〇年”），中译一律补全为四位阿拉伯数字（1990 年）；图表内照排原书写法，不作补全。

[编辑：負典編譯]



山家悠紀夫
日本経済30年史 バブルからアベノミクスまで

